



世界文學名著

女記者日記

考 磐 著
韓起羅西譯

LIFE IN A
SOVIET FACTORY

BY
LILI KÖRBER

TRANSLATED BY
HARN CHII & LUO SHI

世界文學名著

女記者日記

敬獻給

蒲提洛府的女工們

「你想像得到麼？我們勞作，不是爲的麵包，不是爲的食慾。
不——不，我的朋友，」這是爲了人生，爲要人生流入正確
的道途。

卡拉瓦葉華：
森林中的工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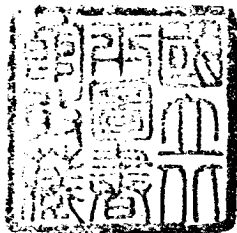
女記者日記

一九三一年七月一日

原來蘇聯的工廠就像是這樣的呵！

穿過工廠的玻璃屋頂，燈光四射着；工人們的頭上纏着的頭巾就像燈籠一樣的發紅。那些漂亮的頭巾的裝飾是爲過節戴的麼？是的，牠們是爲過節用的！那反映着燈光的發閃光的機器也在爲這個節日奏樂；在奏樂的時候，牠們彼此相互競賽着。在這兒，有比沙皇所有的還更雄壯的歌唱班；舞客們就是細長的鋼條，牠們在電光的速度上旋轉着，敲擊着生鐵，金屬的火星飛迸着，當牠們從滑車和槓杆上大膽地脫下外面棕色的衣服，而露出牠們的發光的銀色的身體的時候。

製造耕種機的男女工人小心翼翼地玩着這戲法，他們口裏銜着紙煙，因爲只要沒有放着爆炸藥的室內，是准許抽煙的。有些男工戴着平常的布帽子，有些纏着高加索的頭巾……女工們全



都繫着黑色的或灰色的圍裙……領班這裏那裏跑着，檢驗金屬的零件，隨筆記下來。

快點，同志們，快點呀！

這兒懸着紅牌子，牠有一邊是列寧的遺像，在另一邊就是數目字，表示在五年計劃之下的最近的產額。今年，蒲提洛府的工人們要供給集合農場三萬二千架耕種機。門口懸着紅底白字寫的標語：製造耕種機的普羅列塔利亞，反富農的鬭爭是操在你們的手中。爲每一架耕種機，爲一架耕種機的零件，勇敢地鬭爭呵！

「嗚——嗚——嗚——」機器的回答聲。

近中午的時候，拍子似乎更加快了，就像許多的駿馬當牠們知道快近馬房時而加速牠們的腳步一樣。一個女孩子駕着她的小車到機器旁邊，把完工的件頭搬走。這是一架輕便電車；她站在前面，用把手駕駛着她宛若在迂迴曲折的路上兜圈子似的。可不是嗎？這是一個狂歡節，我曾經說過，這兒連彩色紙花都不缺乏——你能够看見牠從工人坐的樣子下面像閃光的雨點似的飛起來。這是一個狂歡節，真正的勞動狂歡節。

只有我木頭似的坐在這兒。因為最後的三小時內，總有兩個人站在那派給我管的機器旁邊談話着。這兩個人不常常是同樣的兩個人；他們繼續不斷地調換的。他們時常瞎弄一下機器，解脫側邊的鏈索或者扯緊着皮帶。可是，什麼事也沒有發生，如果我走到工頭面前——或許照着他們在這兒喊他做團長的稱呼——問他什麼時候我能够開始做工，他就用着一雙忍耐的，聽從的，狗似的眼睛，革命前的普羅列塔利亞的眼睛，透過他戴的眼鏡瞧着我，說道：「休息一會兒。」他這話是什麼意思呢？

對了，我是在休息着。我正坐在那滿裝着金屬的圓筒的打包箱的邊緣上；太陽曬着我的頸項，胸部和背脊。我向維拉借了一件綠色的乾淨的衣裳，可是她比我矮些胖些，這件衣裳穿在我肩上不甚熨貼，而且只遮到我的膝頭。我想在十八世紀初這衣裳也許是十分時髦的吧，這樣來安慰自己。

在對面桌上做工的一個領班，突然走來我的面前。她有一張美麗的圓臉，和溫和的藍眼睛。束髮帶的下面，金黃色的頭髮披散着。一種典型的俄羅斯的美。她笑時現出兩個酒窩。

「如果告訴你些話，同志，你不會生氣吧？」

「不，我不會生氣的。」

「真的不會麼？」

「真的不會！」

「唉，你瞧，在這兒是看不慣的……穿着這樣漂亮的衣裳上工。我剛纔看見年青的傢伙都在暗地裏笑，於是我就想了：「對了，你應該去告訴她呀。」」

「是的，不過我有什麼辦法呢？我不能找到一條圍裙。你們的工頭——不管是那一位負責的人——告訴我，這兒一條都沒有剩的。」

「明天換一件長袖子的罩衫吧。至於今天——等一下吧；我同波立亞說一說，她過了中午就走開的。也許她可以把她的圍裙借給你。」

波立亞答應了，於是就在打包箱子的背後，我把衣服換了。

「對了，這樣好多了，」我的新朋友說。「跟着我來；我得看看那些汽筒究竟是怎麼回事。你叫

什麼名字。我是瓦利亞·提摩費葉瓦。你不是在蘇聯生長的吧？」

爲避免人們對我引起不當的注意，我準備了整篇的故事。我假裝着是伏爾加的德國僑民，由馬克思塔特工廠派到這兒來實習的。可是我不能使瓦利亞忍住笑。

「那麼，你是一個外國人啫？」她的笑窩發光。「我非常歡喜外國人。我和一個外國人，法國人，生過一個孩子。你怎樣在我們的地方設法找到工作的呢？」

我知道一定會有這問題的。在家裏，我以爲對這問題的回答是很容易，而且一說就明白的。是的，我到蒲提洛府一半是因爲想住在那兒；一部分是因爲我的朋友，美國的工程師，在那兒找到了一個位置。可是，我決不能把這樣的理由告訴瓦利亞或她的朋友們；如果我告訴了，她們一定會認爲我永遠不可救藥。所以，我說明一個實際的理由，這在第二點或第三點上是真實的：「我到這裏來，是想要知道蘇維埃工人們的生活。」

瓦利亞微笑着：「你真妙極了，對了，我感到的確妙極了。等一會；我一定要立刻告訴娜泰芽；她一定是很高興的。她是屬於突擊隊。突擊隊員包括着我們中的最優秀的份子，做每個工人的模範。

呵，你是知道的；你在蘇聯獸過些時。娜泰芽，這兒有一個外國人，她願意和我們在一塊兒工作，而且藉此想了解我們的生活。」

娜泰芽已不年青了。因為她沒有和我握手，她微笑着表示歉意。「儘管問你想要知道的一切事情好了，」她告訴我；「你所要求的報告，我們全都給你，不過你一定要照例把國外的同志們的消息告訴我們。這不是交換條件嗎？好極了。」

「明天，你最好叫韃靼女人送飯給你。」瓦利亞指着一個婦人，她進來的時候，攜着一個裝着幾份薄片肉，黑麵包，青魚和蕃薯和叫做「醋醬」的涼拌紅蘿蔔的籃子。「可是，今天我得領你到小吃店去。等一刻吧；我應該介紹你認識蘇賓斯基。他也是一個外國人——波蘭人。我們是用一個天主教的牧師把他換來的。」

「用三個牧師呢。」那人大笑。他是高個子，富於男性美，雖然不很年青，而且他的容貌是口為他口中的許多牙齒的脫落而破壞了。「是的，」他繼續說道，「爲了我，他們要犧牲三個牧師；康民主義者的身價很高呀。」

隨後我認識了其他的工人們——瓦倫亭·新珂，工人通信隊隊長，有一雙極其深凹的，嚴肅的眼睛和堅決地熱情地握手的婦人。還有加泰雅，她是青年團員，除了經常的工作以外，還須準備高級學校的功課。肥胖的馬霞和費瑪，她是鼻子上搽粉的，有金黃色頭髮的女店主。最後，她介紹我認識那額上有繡紋的，上年紀的猶太婦人，她是司理角上的茶爐子的職務。我又認識那駕駛輕便電車的女孩，芬麗加。

他們是在中午休息時間介紹我認識的。當時，我們坐在耕種機工廠和鍛冶場之間的院子中的木棧上，嗅着我們的午餐，喝茶，聽救濟部的演講。瓦利亞爲我找了一個好座位，而且用工廠名義對我道歉，因不能爲我備一條圍裙。她告訴我，我們的工廠成立並不久；許多新工人已經參加這工廠，而還不能特別地照顧他們。「你看過舊工廠嗎？」她問。於是她忽然凝視着我，笑了。

「你是我們中間的一個，我是多麼高興呵。」她這樣承認。「當我初次看見你的時候，我自己就這樣想到：「那是一個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舊式的太太。」」

瓦利亞的忠實的友情，使我感到羞愧。我懷疑，爲掩飾我進工廠的實情所行的欺騙，是否我能

得到她的友誼。

娜泰芽宣告會議結束。於是她走到我旁邊，問我是否聽這演說感到興趣。又問我對於今年裝有新洗濯器具的廁所，有什麼感想。在訪問娜泰芽，瓦利亞和別人的時候，我繼續保有這種印象，因為她們似乎很像主婦，對她們的客人，很熱心地指着她們所有的新的傢具陳設。

隨後我們回到工廠。別人趕忙跑到他們的機器邊去，可是我又走到我的打包箱，坐下。瓦利亞說，像這樣無事可做，我不必煩惱；過急反遲，這句格言是很可以應用到我的機器上面，我花費的時間，還是一樣領工資的，她說。整個的下午快消逝了，有一個穿皮外套的男子出現，向娜泰芽問了些事情。我看見他朝我這面點頭，隨即來到我的面前。他是一個高個子，消瘦的人，面上顯得敏捷的神情，看他的眼睛，好像在證明一種充滿着艱苦工作和自我訓練的生活。

「午安，」他問候我。「我聽說你是一個外國人。在我們的工廠裏面，什麼使你最感興趣呢？」
「我敢說，一切的東西。」

這男子把一根紙煙啣在口中，他用兩手遮着擦亮了的火柴。從他的姿態看來，可容易知道，他

是慣於在戶外抽煙的。火柴的亮光把他的棕色的臉照成紅磚色。

「你歡喜看同志加里寧做工的工作檯嗎？」他問。

我們走到舊日的耕種機製造廠，每個工人到我們的工廠上工的時候都得經過這條路。這是一間大房子，又黑暗又污濁；裏面的機器各個密接地堆着。革命以前，這是鋼鐵鑄造廠，因為往日，蒲提洛府工廠多半從事軍備的製造。在一八九八年，加里寧同志，因為拒絕繳納「伊里基」教堂的建築基金被開革。現在，那教堂已改充我們的工廠的電影院了。

這男子告訴我，二十世紀初，蒲提洛府工廠差不多是處於真正的教長式的指揮之下。工人們全是虔敬的人，口中喃喃禱告，遇見管理員的時候，就吻他們的手。可是，在一九〇五年，自他們所派的向沙皇請願的代表團在奈夫斯基門被屠殺了以後，禱告者和吻手者就都完結。突然，整個的工廠變成革命的了；在歐洲大戰的期間舉行不斷的罷工，蒲提洛府的工人們，在十月革命中，出過不少的力量。

當他告別的時候，這男子問我，在明天的中午休息期間，是否我願意到鍛冶廠演講資本主義

國家中的工人階級的地位。我的回答是用流利的俄國話演說一篇道理，於我是非常困難的。

「這並不成多大的問題，」他回答。「如果你不曉得一個字，就用德文說牠，那麼我就把牠翻譯出來。」

「那麼你懂德文啫？」我急切地問。

「我正在學德文。那麼，明天十一點半在鍛冶廠問索羅維奧夫得了。」他和我握手，可是他沒有脫帽。

今天，我還沒有見着羅爾夫。

七月二日

列寧格勒的如銀色的夜是美麗的——美麗而危險的。隨便什麼時候爬起來，看來都像青天白日一樣，即使那兒是沒有太陽。因為全屋子只有一架鬧鐘，起來是有點成問題的。女孩子們答應叫醒我，可是她們要比我起得遲，因為到她們做工的史珂洛霍特皮鞋工廠去是很近的，相反地，

我到蒲提洛府工廠卻要坐三刻鐘的電車，隨後由廠門口到耕種機工場，又得步行十五分鐘。因為要經過三站和「三角」橡皮鞋工廠的原故，所以電車常常是載滿了人。我恐怕太遲，因而倒起身過早到廠的時候。夜班的人還在工作。我坐在領班的桌子邊，開始寫一封家信。

忽然間我瞧見那位穿皮外套的男子梭魯惠阿夫當他正在工廠中巡視的時候，他向我點點頭。我說不出如何急切地希望他走近我的身邊，關於到鍛冶廠演說的事提醒我一點。可是他一心從我的面前走過，不再理會我。

這其間，敲過八點鐘。工人們揩拭他們的機器。隨後，他們用油洗手，再用肥皂水清一次。在整個工場中的唯一的一口鐘，是掛在那放工具的貯藏室裏面，可是每個人似乎都曉得時間似的，所以一到八點鐘，工人們就在紅便箋上寫日子，他們的名字，號碼和包工的件數，隨後就丟進信箱裏面。有些人到洗濯室換衣服，又有些人就在打包箱子當中的食廚背後，匆忙地換衣服。

日班上工了。青年團員，加泰雅，那個年青拿着油罐走我面前衝過去。娜泰芽和一個戴一頂繡花帽的少年談話——他是文化的組織者，即在工廠負文化工作責任的工人。健壯的馬霞和一個

男工談水桶的事；這裏只有幾個水桶沒有漏洞的，假使誰要得着一隻好水桶，他自然不願把它放手，縱使他只一天兩次用牠裝肥皂水沖機器。昨天我遇見的，有一雙革命以前的眼睛的老人，當他走過我的面前，假裝沒有瞧見我。所以我趕快到娜泰芽那邊，問她這團長是不是故意工的「破壞者」，可是她搖頭。

「不，所有的破壞者全都燻出去了，」她告訴我。「塞明奧羅夫是一個好人，縱使他還沒有階級意識。」

我回到打包箱子旁邊的時候，感到有幾分不安，於是開始起草我到鍛冶場演說的大綱。我覺得機器均勻的隆隆聲在幫助我；思想和概念來得明白確切，表現的字句也很恰當——德文字句，我隨後再把牠譯成俄文。

蘇賓斯基，這波蘭人，到我面前來，笑着。他常愛笑愛說話，所以恰和沈默而嚴肅的俄羅斯人成一對照。他要我為真理報寫一篇論電車服務的文章。他告訴我這裏車輛太少，而且大多數的車輛是循着一條非普羅列塔利亞的路線駛行，尤其是二十九路車輛，穿過許多大路，繞行許多歧路，而

不照工人所需要的直接的路線行駛。

「你說的口氣要強硬一點，」他說。「如果電車路政的理事不能勝任，就應該撤換。終究我們蒲提洛府的工人有三萬二千人，那麼電車是供我們的需要，而不是我們供電車的方便。」

正十一點半，我們進鍛冶場的食堂。「明年，我們就有我們自己的食堂了，」娜泰芽向我保證的說。明年……誰知道我明年在那裏呢？

索羅維奧夫站在工作檯邊；他對我點頭的時候，他的嘴漲滿了，在趕忙把他吃的東西嚥下去。隨後，他拍着手，叫大家靜些，把我介紹一下，並說了幾句關於工人階級國際團結的話。像所有的俄國人一樣，他是一位漂亮的演說家；即使他的不合文法的句子裏面，也充滿着這樣為的真正的熱情，所以我覺得不由自主地對他懷着愛慕。

於是輪到我講話了。我說到失業的魔鬼常常在每個無產階級做工的工作檯邊出現，即令他是屬於那些坐自己的車進工廠上工的，工錢很多的，而且人們常引為反社會主義的證據的美國工人，亦有這種現象。隨後我論到那要挽救破產的資本主義之最後的迷夢的法西主義和無產階

級所企圖的解放的戰爭。

我講完了以後，各方面對我提出許多問題，因為這些工人們要求多多曉得外國的同志們的情形。我覺得我有如置身密友的包圍似的愉快，可是還感到缺少了什麼東西似的。等到我在門口遇見了索羅維奧夫，而且看到他點頭稱讚的時候，我纔感到真正的愉快。

我告訴他，我的機器還不能應用，我這樣告訴他，不過是藉此親近他片刻，我並沒有希望他可以幫助我。他答應，我應該立刻把這件事報告到辦公室，並把我領到辦公室門口。我請求坐在寫字檯邊的男子把我調到別一班，或把我僱用到別個工廠去，因為我現在做工的地方，並沒有事做。

「什麼，沒有事做麼？」他憤慨地答道。「那裏要做的事情多着呢！」

他立刻叫一個圓臉的人告訴工頭。我的機器撤裝過，很快地修理完畢，這樣畢竟在一點半鐘光景，我就能夠動工。

我的機器大概要在槓桿上鑿孔，還要把牠鏗平，擦亮。我覺得，要把槓桿搬到固定的位置，於是太吃力了；每次，那老人都跑過來，為我做這件事。我覺得十分厭煩。

「是呀，我親愛的孩子，」他安慰着我，「手工的勞動不會這樣容易呢。」

恰在此刻，我看見羅爾夫進來，背後跟着一個年長的，面貌乖張的婦人，她就是他的翻譯。口裏啣着煙斗，手插在褲袋裏，漂亮的綠色的襯衫的袖子捲到肘子上面，他巡視着工場。現在，他停在一部機器前面，在那兒他監視那做工的男子一會兒；於是他突然把那人推開，把工作檯推開，而且開始在槓桿上弄了幾下。最後他走到工作檯的下面，在那兒用英國話喊着命令，他的翻譯就口譯出來。這工人按着電鈕，使機器轉動起來。「停一下！」幾秒鐘之後，羅爾夫這樣叫着，可是這工人仍讓它開動，因此羅爾夫又再回來，拂着褲子上的灰，很快地對他解釋了一下，使他的翻譯很難保持同樣的速度。於是他走前去，靠我很近地走過，可是我不能夠說，是否他真沒看見我，或只是假裝着這樣的。

當日送他走了的時候，那老人嘆了一口氣。「是的，如果沙皇曾讓我們學習一點東西，」他說，「我們現在一定不需要用美國人的。」

他是對的。外國的專家費用了蘇聯大宗的款項。他們不只是領得很高的薪水（多半是照着

他們本國的洋價支薪的，和最闊氣的住宅設備，而且當局甚至開設特別的商店，在那兒，他們能便宜地購買一切的東西。羅爾夫住在一家旅館裏面，在那裏的房金是照外國的洋價付的，在那裏，除開俄國話，那一國話都聽得到。

瓦利亞走到我這兒來。「你看見那個美國人嗎？」她低聲地說。「多麼漂亮的男子呀！他穿的衣服多麼精緻呀！你爲什麼笑呢？」

「因爲你以爲他漂亮，我感到有趣。」

羅爾夫往往能吸引女子。他的動作和姿態是男性的；他是和藹可親，而且常常爽快地做人們托付的事。在街上，他望着所有過路的女性，可是根本上說，他不是一個女性追求者。他對於他的食物，還有更大的興味。

瓦利亞說，工人們都怕把機器給我。「你會明白的，」她說，「他們以爲你又會到外國去，把損毀了的機器留給我們。」

我不曉得，我怎樣能够損壞機器的。在機器中間，扭緊着鋼鑽，把槓桿放在固定的位置上，接着

電扭，於是機器自動地做着牠的工作。我所曉得的唯一的危險，就是因為把槓桿安放得不準確而耗費材料，且使眼孔沒有鑽在準確的正中，或是讓鑽子用得過久，因而把眼孔鑽得過大。所以，你必須細心地注意到有公釐的秤。起初，不懂得機器和牠的工作的節拍的生手，就像木頭似的站在那兒，生怕一刻沒有注意到秤或是接觸到槓桿；這種做錯事情的懼怯，是比工作的本身還更疲倦的。其實工作本身是並不很費力的。

在四點鐘，當我從板子上取下我的號碼牌子的時候，我仍感到極度的疲倦，雖然我還沒有做到兩小時的工作。

瓦利亞告訴我，到工廠外面的罷工街的蒲提洛府飯店的路。她自己並不光顧這家飯店，因為她要燒飯給她的男孩子吃——法國人的兒子。孩子的父親常來看她，雖然他現在是和別的女人結了婚。瓦利亞賭咒，說是她把他誘入結婚的陷阱中的。

「好了，現在他能走出她的陷阱了，」我答道，「正如在我們的國內一樣，因為離婚是並不怎樣困難的事情。」

「那是他的私事，」瓦利亞埋怨着，重又沈默起來了。除了她的法國男子以外，她還有一個意大利的水手。她諂媚她，叫她做「太太。」她認為「太太」這二字發音很好聽，但是不久的以前，她要他穿國外男子的衣服，因此他就退避了。

在飯店裏面，錢櫃的前面有一排人，當工作完畢的時候老是那樣，可是很快就輪到我了。我付了四十個戈比，就在一張桌子邊坐下，我也是八人一組中得到許可的一個，我們在門口領了刀，叉和調羹；這個女侍者，那頭髮上插着綠色的梳子的肥大的女郎，把湯盆和盤碟分給我們。我們的菜單裏面包括有黃瓜的肉湯，肉片，稀爛的蕃薯，咖啡和點心。這一切味道都很好，只有咖啡，牠的味道就像弄甜了的洗盤子的水似的。

坐在我旁邊的是一個農民，新到蒲提洛府工場來的。他高聲讚美一切的食物，要求別人把盤子裏面的所有剩下的食給他吃。我立即注意到，沒有一個人在他自己身上畫十字，有如俄國人在飯前飯後所常做的那樣。我不禁想起了索羅維奧夫的話。他是一個有趣的人；我一定要使瓦利亞把他的事更多地告訴我。

七月三日

砰——拍——拉！當我大概要把機輪拉下來的時候，那我剛鑽了十二個洞的機輪滑脫了，朝後一轉落在我的指頭上。一剎那間，我似乎陷在深淵中間似的；我不能看見什麼東西，只聽到機器聲，在我的耳邊隆隆的作響。隨後有一隻手摸着我的肩膀，似乎瓦利亞的聲音在說：『你傷了你的手麼？』她領我到第一救急部那是和工場隔開的一間房子，坐落在茶爐子的後面。這兒的醫生是一個猶太女人，爲我切了脈，而且用日耳曼話和我談話，因爲瓦利亞曾經告訴她，我是外國人。看護用碘酒——這是俄國人愛用的療法——擦着我的流血的手。我的手開始腫了起來，慢慢就不痛了。

『不要緊，』醫生用她的日耳曼話說。『兩天就會好的，而且明天無論怎樣是你的休息日。』因爲她是屬於我們一班，所以她知道。

她把證明書交給我，牠是一定要經過監督簽字；否則我休息的時間就不算工錢。所以我爬上

他的辦公室，那只是鄰近我的機器的一座講臺。如果這位團長代表戰前被蹂躪的無產階級，那麼監工就可歸到在資本主義國家常見的所謂「貴族工人」一類。他仍然保留這類人的特徵；雖然他已有六十三歲他是康民黨員的候補者（爲了這，他現在正受着必要時期的試驗）是一個熱誠的康民主義者，但他還是不能消除他的高傲和他的漫罵他的部下的習慣。青年團員要給他養老費使他退職，因爲他使工人們不安。可是事情決不是這樣簡單，因爲他忠於他的職守，而且他積有了三十年的經驗，不過可以拿來攻擊他的只有一件事，就是說他愛吹牛。此外娜泰芽還告訴過我，當他大聲叫喊她的時候，她只是更大聲地回答他。隨後他就平了氣，說道：「唉，我這樣說並沒有什麼惡意呀。」

在上工的時候，沿着蒲提洛府的雄偉的都市兜圈子，會有一種奇異的感覺。從平臺上，耕種機曳下來，舉行初次開行的試驗；如果牠們試驗成功，就用油布蓋好，準備在鐵路上運去，油布上書有F. P.兩字，即福特·蒲提洛府的縮寫，因爲這種機器是福特的圖樣仿造的。

於是一聲警笛引起我的注意——機器的遊行。恰巧這時候，電車，那全身嶄新油漆的光耀奪

目的電車，還沒有開車。因此我仍繼續觀光工場——轟——轟——轟，機器唱着，同時由鍛冶場的深處，火花爆裂着。

現在，我的手幾乎完全不痛了。我搭着二十九路的一輛空車，牠的路線是非普羅列塔利亞的，開往「隱慮」。首先，我們經過罷工街，這是我們的工場底真正重要的部份。高聳的新建築與低矮的舊建築毗連。其實這些舊建築究竟不算怎樣舊，因為五十年前，富庶的市民在這兒的葱鬱的草木園中興築了他們的別墅。可是，我們現在經過的時候，我讀着上面的招牌：「合作的理髮店」，「競技場」，「金屬工人俱樂部」，「害胃病人的飯店」，「正月九日花園」。不待說，後者的名稱起源於著名的「血的禮拜日」事件，即紀念向沙皇請願的和平代表團被屠殺的意思。

奈夫斯基門是蒲提洛府的咽喉，這裏，有兩個巨大建築物包圍着。其一是最新式的百貨公司，裏面附設有一家賞心悅目的飯店。在蘇聯，大多數的飯店附屬在各個組織裏面，而且只限於會員就食；商店和公司也是應用着這同樣的原則。

百貨商店的對過是文化院，裏面設有大的戲場。文化院建在乾涸的達拉干拉夫加河的河牀

上，在以前這條河流常在沿河佈散毒惡的傳染病。幾年前，鐵道未通以前，愛爾多拉多旅館位臨江邊，牠供給來彼得河府遊歷的要人們的方便。當時，罷工街也叫彼得河府路，而蒲提洛府兵工廠的工人都是不識字的農奴。

在普羅列塔利亞的列寧格勒城中的各處，還可以看到舊時聖彼得堡的遺跡。更進到城裏一點，建築更是富麗。奈夫斯基街——現改名為十月二十五日街——堪與歐洲各大都市的大街媲美，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這兒沒有時裝婦女招搖過市，每個人都穿着工服；至於年青的男女，簡直不能分辨出孰為手工的工人孰為知識份子。在蘇聯正開始消滅了階級的界限。

當「隱廬」的外套室的佣人為我取下罩衫，讓我現出瓦利亞借給我的那件綠色的衣裙，我真覺得不安。得了，這有什麼關係呢？反正這兒沒人認得我。

沒人麼？當我在兩個陌生臉中間看見一個熟識的臉時，我的腳差不多已踏進那第一間房子。當那臉認出是我進來的時候，那臉羞紅着，這時我真想鑽進地下去，於是第二張臉朝我這方面瞅着，於是美麗的哈林太太用她的美國的重音叫着，「哈囉」和一些我不能聽懂的話。

哈林太太即使在紐約，已是够美麗的了；這兒，在這種像斯巴達人似的樸質之中，她的容貌的確是迷人的。她的黑草帽，她的照着最新時樣剪裁的服飾，和她的特有的寬皮帶，其漂亮確難言盡。她和他的丈夫是在德國消磨假期，到昨天才回來的；他們馬上就得趕回烏拉爾，哈林先生就是在那兒的工廠任工程師的職務。他懂得一點德文，但是不會說過一句德國話；通常他只是笨呆地不做聲地吸着煙斗。

當哈林太太批評我的不諳世故的表現，是含着親切之意的，雖說羅爾夫的臉是最先從紅的轉到本來的顏色，但是我感到，羅爾夫簡直沒有留心到我的服飾上面；他甚至似乎全沒注意到我的綁了綳帶的手。

當我在沈默的哈林先生旁邊走着，看賞他身邊的希臘和希伯來的圖畫的時候，羅爾夫和哈林太太正談得起勁。我問哈林先生，德國有什麼事情發生，從世界失業恐慌來看，那兒的情形是怎樣的。

「呵，一切都好，」他答。

於是，像我以前做的一樣，我問他在工廠中的工作，可是這是不很容易的，因為他決不了解我真要他告訴我的事情。如果我問及那裏的實際成果的情形，他就首先告訴我，俄國人是如何的不實際；當屋頂上漏水的時候，他們從沒有想到要擺一隻水桶接漏的。這就是他對於五年計劃全部所發表的議論。

美國人有一副不能構成康民主義概念的頭腦；這就是他們為什麼這樣忠心於蘇聯事業的原因。如果例外地，他們提住了牠的本質，他會像羅爾夫的朋友愛迪一樣，一定要害怕起來，羅爾夫不同；他喜歡小題大做，所以在蘇聯他十分覺得舒服，因為美國人在這兒特別受優容。他很喜歡俄國人，所以他饒恕他們的主義。

從前屬於沙皇和皇后的光輝奪目的盜器，使我想起我們的工廠，當陽光穿過玻璃屋頂，光輝地浴照着一切的時候。從前的公主和富翁底著名藝術的寶物，在這保存的東西裏面，也可以找到——那他們在過復活節用來送人的，最精緻的俄國的飾着彩色的彩蛋也包括在內。美國人點頭稱讚不置，而且說道「的確不錯。」

於是我們往現改爲反宗教博物院的聖以撒禮拜堂參觀，並且看見足以證明教會和沙皇政府勾結的證據。例如，有一塊膠板，上面畫着基督祝福皇族的像。

我預備明天和羅爾夫，到塞斯托涅茨克遊玩。因爲我是在五日星期制的第二天上工的，在同日我們全班休息，明天我沒有工作。

七月四日

無聊的人常想用吵鬧的，強悍的態度攝取他人的注意。和這一樣，芬蘭灣也想自命爲大西洋；牠吐着浪花，黑濤飛騰，高入天空，一般地做出賣大力的樣子。今天的海水是這麼的洶湧，那班做了沙皇時代上流社會的顧客的休假工人們，寧願在他們的休養院內下棋消遣。海濱的唯一的佔有者是少數的兵士，和他們的愛人在這兒遊玩。

羅爾夫在瀏覽他帶來的美國的雜誌。此刻，他全神貫注在一篇論福特的文章上面。那論文載有每年爲清潔福特的工廠所必需的掃帚和拖把及肥皂，蘇打和沙礫的數目字的統計。

「而這班俄國人還以為他們能搞詐美國呢。」他以一種謙遜的笑這樣說道。「好吧，我惟願他們的運氣好，因為他們是有同情心的傢伙，不過他們還得多多學習纔對。」

他的兩眼沿着渺茫的水面，遊視着遠方發着藍色閃光的芬蘭海岸。我以為他仍在想着美國和蘇聯，可是他忽然叫了起來：

「既然我到了此地，我得洗個澡。」

「然而這兒是這樣的冷，羅爾夫。」

「沒有關係；這是有風的天氣。也許風會把水括熱了。我正要浸在這水裏。」

他敲掉他的煙灰。在一閃眼的功夫，他就已經脫掉他的外衣，襯衫，鞋子和褲子，現在就得脫去他的汗褲了。

「你不把你的汗褲穿上嗎，羅爾夫這兒有女人坐着呢。」

「喂，我怎樣處置我的濕的汗褲呢？我不能把牠放在我的口袋裏呀。」

他完全赤身露體地跑到水裏面，開始泅泳着，濺潑着，時常把他的印象高聲地說給我聽。幸好，

俄國人從不使自己介懷人家的事情，所以這位在洗澡的「專家」（蘇聯人民多以「*Spas*」即 *Specialist* 的簡寫，稱呼專家——譯者）並沒有激起特殊的注意。最後，他上岸來了，簡直就像海豹一類的東西，水滴在他的身上溜下來，他的頭髮在的前額全部黏貼着。

「我現在餓得就像一隻狼似的，」當他擦去身上的沙泥的時候，他說道。「去問那個兵士，到什麼地方可以找到適當的食物。他或者不知道；俄國人從不能給你任何肯定的報告。」

我們走進城內，找一家館子吃飯。塞斯托涅茨克屬於蘇聯的俄斯坦德，可是大部份的幽美的別墅，已經改建為療養院和休養院了。在兩者之間，我們可望見叫做「*datchis*」的幾座規模不甚宏大的木造的房子。舊時，那是中產階級的家庭的避暑地，可是現在已經成為分租成許多小房子的公寓式的屋子了。廟宇及其公園和資本家海邊避暑的環境大致相同，唯一不同的地方只在遊歷的人們。凡遊逛塞斯托涅茨克的人，都是穿着樸質的人，他們留給我們的印象，是說明他們的閑散不是習慣而是一種休養。以前的貴族的無聊的氣質已經消滅了；遊客享受他們的假期的時間，愉快地呼吸海濱的新鮮空氣，為的是盡量利用昨日勞動和明日勞動之間的時間。

我們吃過飯以後，就動身回家。在車站上，發生一件小事，因為羅爾夫指給我看進口的牌示：「此車僅限於士兵或攜有小孩之婦人乘坐。」

「呀！你往那兒去，市民？」那突然攔阻着入口的職員叫着。

「我是美國人，要走這條路經過。」羅爾夫用整脚的俄國話解釋道。

所以我們終於趕上了這班剛要開走的火車，這種手段對於那班遵照規矩進站的好人是不能利用的。我知道，當我和羅爾夫一道的時候，無論到什麼地方，我常能用這種姿勢首先通行無阻；我只要讓他領着我跑，以稚氣的信心深信他的領導就得了。我也相信在他的伴侶中我所得着的這種不擔心事的從容態度，似乎是一種連索，使他不能離棄我。可是，我為什麼要說「不能離棄」呢？在我們中間的關係，難道就完了麼？

在火車裏面，他又開始讀他的雜誌。是的，在最後的幾星期中，我們終於沒有找到談話的資料，我覺得，在我到蒲提洛府做工的短短的幾天當中，這方面的事情弄得很糟。事情怎樣弄到這樣的地步呢？我不能不想到，我們在黑海岸邊的亞蒲哈追亞的休養院消磨的十八天。在五月初頭只

有少數休假工人，所以空的地方就租給能够出錢住的外面人。

革命以前，休養院原是一所大僧院。一年到頭虔誠的香客絡繹不絕地來到這所神奇的童貞女的庵堂，從極窮苦的農民一直到那欣賞自然美景的，同和尚勾搭的富商的艷麗的太太，各色人等，應有盡有。亞歷山大三世建立這座僧院的本意，是利用牠做俄國化和國內人民最後馴服的一種手段。亞蒲哈追亞的兒童被強迫入修道院學校，該校是把他們教成敬畏上帝的沙皇的官吏，但是許多年以後的情形爲之一變，孩子們利用他們從和尚那兒得來的知識作爲反對他們及他們所遭受的沙皇政治的束縛。那班孩子們中的一個是拉河達，他是革命者，以後曾任爲亞蒲哈追亞蘇維埃委員會的主席。

我們不會看見這位奇妙的童貞女，因爲當修道院封閉的時候，和尚把她帶跑了。由於她，他們奪回了他們最珍愛的東西——實際是因爲她值得十萬盧布。可是除此而外，從外形上看，一切似乎都無改變；每到一刻鐘，在教堂院子裏面的鐘照舊敲着；食堂的牆壁仍然裝飾着老幼聖徒的壯麗的壁畫。講道壇上仍然有一個說教者，然而他已不是對那班捐贈修道院以適當禮物的人們，宣

揚罪惡的超度，他表示只是文化的組織者，通告到撒克汗遊歷的事情。

高聳的，光亮的修道室裏面放着休假工人的牀；修道院的農場已改成那供給牛奶，牛油和雞蛋到休養院的蘇維埃的建設物。不幸得很，這廚師吃了缺乏想像力的虧，使他完全不能掉換我們的每天四頓的飯菜，以後我聽見無神論的工人的報紙編輯說，他有故意弄壞他燒的食物的嫌疑。

羅爾夫和設計新療養院的一位俄國建築工程師友善。這人在美國住過幾年；他由他留下的雜誌知道羅爾夫在此，於是他叫管理浴室的婦人指導我們。他領我們參觀他的建設的規模，因為他是自滿於他的工作。這建築物是照着最新式的美國的方法構造的；很美觀，很舒適，而且一切已做到節儉的地步。浴室剛竣工；浴室的光亮的潔淨的粉飾煥然奪目。

我們在海邊上曬太陽，散步，有時只是我們自己，有時和別的休假工人做伴，他們多半是書記或是小職員（工人、藝術家和學者——後一字的含義包括很廣的領域——都有他們自己的休養院，）可是他們的水準和興趣遠比那班我們自己的小資產階級要高得多。

我要常常紀念着那幾次的散步。旅行過很多地方的羅爾夫認為，不論里維耶拉或南歐的地

方，都不足與亞蒲哈追亞媲美。這地方最奇怪的特徵，就是在距離不遠的地方草木有特殊的景象；在面着海的陰濕的半山腰上，氣候是十分熱的，可是在更遠的山峯上，冷風由積雪的山峯無阻地吹過來，卻有中歐的氣候，長有柳樹，樺樹，甚至還有樅樹。是的，那是多麼令人留戀的時日呵！我們幾乎一刻都沒有分離過，而且我們之間從沒有互相齟齬過呵。

七月五日

今天我沒有去上工，我不知道這是否是我的過失，或是環境的關係。兩點鐘，我到作家會食堂，這地方要比我們工廠的食堂貴兩三倍，不過飯菜卻不錯。這裏沒有規定的菜單，食物單上的菜可以聽人隨意選擇。小餐桌上蒙着乾淨的檯布，所有的女侍者都穿着白衣服。這會食堂的主顧不只是著作家，也有藝術家和他們的家人。到了四點鐘，在這兩個房間內幾乎不能找到一個座位；你要站在別人的椅子背後等位子坐。但是在兩點鐘光景，地位還完全是空着的，因為俄國人吃中飯的時間很遲。

壁上掛着這樣的標語。例如『不和我們站在一塊兒，就是反對我們，』和『不要受和平的欺騙；階級的敵人從不會酣睡的。』但是，這班食客決不是如標語上所說的百分之百的普羅列塔利亞特，因為他們中間包括有許多舊時代的典型的代表。例如，和我認識的一位老紳士，從前就是在皇家聽差學校當教員。他告訴我，他的上司對他的廉潔怎樣敬重；即使大伯爵的兒子，他也不准在午夜以後請假外出。他實在地把他做過他以前的學生的許多高級官吏寫給他的推薦書，呈交蘇維埃政府，結果他們並沒有替他找到什麼位置，所以現在他在一家影戲院彈鋼琴。

他深深地嘆了一口氣，告訴我他沒有家室。當他的母親還在世的時候，他從沒有感到討老婆的需要；加之，當他想對任何女子打主意的時候，她是常常要發脾氣的。她死後，當他一遇着危險脅迫的時候，他就常常對他的母親祈禱。例如，不久的以前，有人站在他不是一個創作的藝術家的論據上，提議不准他到會食堂進膳。他爲『國際歌』所製的變調受到委員會嚴格的反對，他們告訴他這應該是一種簡單的，無須潤飾的調子。解除他的困難，只有一條出路；他到墳山上去，跪在他的母親的墓塋之側，祈求死者的陰靈保佑。當他回家的時候，他看到一封委員會的來信，告訴他，他仍

可在作家會食堂繼續用膳。

我能充分明白，這死者以她的一切權力在幽冥中保佑她的兒子在我們的會食堂吃飯的權利，因為沒有幾處餐所能供給這樣精美的飯菜。每天，菜單上載有大魚，蔬菜，雞蛋或肉的數量，有時還有子雞和肥鵝。

在蘇聯，當藝術家是布爾雪維克主義的擁護者的時候，他們是屬於特權階級。當大眾興味的焦點已經從個人的命運轉變到集體的企業，再建設的工作和蘇維埃日常生活的緊急的問題的時候，住在閣樓中間的詩人和終日在咖啡店打混的文人現在都成爲被忘卻的人了。作家和新聞記者密切地和大衆生活在一塊兒，在工廠中勞動，並組織「作家突擊隊」以研究巨大的政府的工作和集體的建設。「由下面來的」文學受着特殊的鼓勵，大衆喜歡聽工人談到他們自己的生活和作品。最新的口號是「召集文學的突擊隊」根據學生雜誌的編輯提摩清的意見，文學部除了設立批評學和新聞學講座以外，應該立即成立創作講座。他曾要我寫一篇論及外國女學生的現狀的文章。我想對他證明，沒有人能够坐在大學教授講座來教育或訓練詩人的，但我這句話終

於爲他的譏笑的面龐打住了，可是，最後，他請我在最近的將來，有時間去看他和學校裏的幾位朋友。這種邀請，是我樂意接受的。

今天，我的這位有伊諦普斯的情意綜的老紳士沒有到會食堂裏來，可是我遇見了肥胖的娜泰芽和她的瘦丈夫。她的丈夫看來就像初級小學的學生畫的漫畫似的——頭上只畫一個圈和底下兩根細線。她們站在一塊令我聯想到青魚和蕃薯的印象；他們奇妙地彼此補充着，可是她是很不滿意於他的。首先，他把白天和大部份晚上的休息時間花在到涅瓦河釣魚，雖然不能時常，但只要一釣着了一條魚，他就把它送給看管飯廳的人的老婆，因爲他們都是在作家會食堂一塊兒吃飯。可是她主要不平的原因是爲他的粗野；他絕不想到家裏不方便的地方，常是把房門鑰匙帶出去，當她問他大概到什麼時候回家的時候，他就抱怨着，說些不能把他綁住的話。當他出去取糖果碟（糖果是要到食堂領取的）的時候，她對我說：「你看見過像這樣的畜生麼？得了，我不能再和他糾纏了！」

這瘦男人是她的第四個或第五個丈夫。令人討厭的，神經衰弱的男子常常對她感到誘惑，她

覺得要擺脫他們是很難的。她並不美麗，可是她有一種溫沈的，多情的氣質。她老是叫別人——對男子女子一律如此——做：『我的好寶貝，』對任何人都發揮着母性。一次又一次地，她只是願意扮做吃醋的老婆，可是扮演時間一到，她又不能找出爲她的憤激的言辭所製的調子，結果她什麼都不說。

她用深沉的，男性的聲音說話，並寫兒童故事，但是現在她被任命寫一些討論集體化的文章，並着手搜集材料。

她的瘦男人帶着糖果回來了，並問我關於奧大利釣魚的風俗。隨後，我們在愉快的談話中消磨時間，當我看鐘的時候已經是三點鐘了。我趕快和要請我到她的母親寓所去的娜泰芽告別，趕忙着搭電車，希望並祈求會發生什麼事情，因爲我感覺不舒服，並且擔心着我的紛紜的工作停頓多時了。

够多麼奇怪，蘇維埃神竟答應了我的祈求，因爲我們還在離蒲提洛府很遠的地方，電流就已經不通了，電車在站線上仍停了三刻鐘，或者更久些——有多久我不知道，因爲我回家去了。維那

見我的時候很吃驚，問我爲什麼不上工。我答道，我去時太遲，一定不得進去，但是她認爲，如果電車業損壞，別的人也會遲到，因此不會不准進廠的。

「唉，現在對了，」我答。我躺在我的沙發上，努力想到羅爾夫，可是忽然間，記起他是怎樣說的，「我是美國人，要走這條路經過。」讓他通過的那位職員究竟怎樣作想呢？俄國人還是尊敬或是藐視外國人呢，我老弄不明白。

七月六日

我還沒有鑽到五個槓桿，瓦利亞就來了。

「昨天你爲什麼沒上工呢？」她問。

「我病了。」

「你有醫生的證明書麼？」我回說我沒有。「那麼你應該弄一個，否則不作請假計算。誰都能說我病了。」她仍是沈默了一會兒，隨後她加上一句：「索羅維奧夫昨天來找你。」

我感到忸怩不安。「那一個索羅維奧夫」我恍然地問。

「維克多·米哈洛維支。」

「他找我幹什麼？」

「我不知道。」

「那麼……你告訴了他我出去了嗎？」

「是的，我告訴了他，你今天不會來。」

「他找我，是在什麼時候呢？」

「我記不得了。」

她沒有費力絞着她的腦汁。她沒有告訴我她的戀愛的事情，如她通常所做的那樣，卻一直回到她的地方做工去了。得了，隨她吧！索羅維奧夫要來的時候，我自己須要把事情解釋給他聽。

可是，我要和他解釋什麼事情呢？告訴他，在我的休息日我和朋友出去，結果第二天感到疲倦麼？工場要管這些事情幹什麼呢？我想到這，是因為我們做的是包工，而不是領固定的工錢，如果我

……是沒關係的——不，這不是我所要想到的。

在我的眼前，浮起愛森斯坦的名片「前線」的映畫。我看見沒有馬耕田的貧農婦人，和她們的牛和別人的牛配合的農婦。我看見白髮老農夫前額上的汗珠，他穿着一雙新鞋疲倦地走過一條條的田畦。我看見阿美尼亞的田野上排着一列耕種機。

當我們在挨里溫的時候，我們乘着一個工程師的車子到鄉間去。那工程師曾在美國讀書，和羅爾夫熟識。車夫把我們送到集合農場的田野，在那兒，當耕種機爬上爬下駛着的時候，就像大昆蟲似的嗡嗡叫着。忽然間，我們工程師的朋友開始用亞美尼亞話咒罵着；他從車上跳下來，他阻止耕種機的駕駛者，因為機器的嚮聲告訴他的耳朵，車子大概是出了什麼毛病。不久以前，那在他的「工服」上掛着黨徽的農民，特意跑下來，試驗他的大昆蟲。

隨後我們繼續前進，越過無涯際的田畦，快到薄暮的時候，耕種機燃着了碳化燈，我們經過的路上，長條似的銀色的光芒四射着。當我們進城的時候，有月亮照在開花的果樹上和亞拉拉達山的積雪的山巔。

當我走進舊時耕種機的機器房取肥皂水的時候我突然注意到黑板下面用大寫字母寫的佈告……

我有這樣的印象，好像每個人都用瓦利亞所用的同樣奇怪的態度凝視着我。

索羅維奧夫還沒有看見。

七月七日

今天我醒來的時候，感到我受到某種很悲哀的經驗，立刻記起我沒有看見索羅維奧夫，同時記起他是在蔑視我。我感到憤慨；他有什麼權利用這樣的態度對待我呢？

他不知道我爲什麼沒上工；我要死了他也不是管的！對於我今日是否來上工，他簡直不關心。他是一個無情的男子，只是黨官吧了。究竟，我決不是一部機器呀；假如我就是一部機器，那麼我的情形更加好些，因爲當機器的掣帶斷了的時候，像它間或發生的情形一樣，在修理牠的期間，至少牠也應該休息一下。

我感覺對我這種心情需要某種同情，所以靜靜地溜出臥室以免驚醒維那。赤着腳，只穿着睡衣，我走到我們的工作室去，那兒裝有電話。大概是八點半鐘，我知道我一定可以找到羅爾夫，這時他在家裏。我毋須通我的名字，因為，儘管他的朋友廣多，他常常立即能辨出我的聲音。當他叫出「哈囉」的時候，我覺得十分高興，但我決心要發洩我的氣憤。

「聽着，羅爾夫；前天我感到不舒服，所以沒有回去上工。我這樣做是不是很錯誤呢？」

「你做得十分對呀。惱着什麼呢？」

「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有一天沒做工，你不覺得我可恥麼？」

「可恥嗎？」我聽見他在那邊的電話筒裏放聲大笑。「你簡直毋須回去做工，如果你不覺得喜歡做工的話。爲那幾個小錢，你爲什麼要自尋煩惱呢？」

羅爾夫的理由並沒有使我滿足，可是他顯然認爲這件事解決了，因爲他已開始談到別的事
情。

「喂，我找到了一家中國館子。當然趕不上有紐約的館子那樣好，不過我昨天在那裏吃得

差不多。有一盤例外的菜，我覺得……」

在此刻，朝着這女子的房間的門開了，杜西亞披着睡衣，帶着一副生氣的，惺忪的臉容走出來。『你打電話立刻就打完麼，同志？我們剛上夜班回來，需要睡覺。』

『羅爾夫，我現在要掛起聽筒了。我到什麼時候來看你呢？今天你在工場麼？』立刻，他的聲音轉成嚴重的口氣。『不，我不能够在工廠裏和你談話。那一定不能令人相信，每個人都在把眼睛釘着我。』

『什麼不能令人相信？當然，我們私人談話是可以的。喏，如果我們不要相互談話，你爲什麼竭力想要我進工廠——進你做事情的耕種機工廠呢？』

『是我竭力要求的嗎？喂，對了！』他大笑，爲那笑聲我真想殺他。『是你要進來的，而我對自己說，做一點手工的勞動對於像隱士樣的你這女子是無害的。』

『什麼？我——隱士麼？』

『得了，你不要以爲是受侮辱。這名詞對於女人倒是怪嬌媚的，不過牠對於男人卻是很壞的。』

意思。」

「爲什麼男人和女人之間有什麼不同呢？」

他又笑了——一種笨重的、假慇懃的笑。「喂，我不能在電話裏面解釋。等你來看我的時候說吧。」

「傻子！」我本要大聲喊出來，可是我把自己壓抑住，只說了一聲：「再會！」

杜西亞在門口守着我。「同志，我對你的行爲，要代表全房提出有力的抗議。我們請你停止，可是你又繼續談了半點鐘的話。」

「呵，不要管我！」我情緒猛烈地叫着。「不要管我——你們這班傢伙！」
遲至下午，他來看我了。

那一定是六點半鐘的光景。他站在我的後面有一會兒；雖然我沒有轉過頭去，我已能意識到他的到來。當我鑽完槓桿的孔，把機器關了的時候，他走到前面來。「你怎樣過的呢？」他問。

我是這樣的侷促不安，竟使我不能把第二根槓桿放到原位上。索羅維奧夫站在那兒，看着我；

我的兩手是這樣利害的發抖，把槓桿放到原位上於我是一件苦事——常常於我是一件難事。最後我擡起視線；我們的視線接觸了，我覺得他是了解我的。

沒有講一句話，他轉身走了。我還是沒有把槓桿放好。我離開我的工作，跑到盥洗室去。我的心靈是受着這樣狂亂的打擊，使我想要衝出去，沿着罷工街不停地一直跑到奈夫斯基門去。

七月八日

今天，那領着我們的夜班的隊長，對我畫了一個特別的記號。十二點差十分的時候，我正預備從機器的孔口內把鐵屑掃出來的時候，忽然我聽見我後面的聲音：

「哈，終於我捉到你了！」

我回頭一看，望見一個在「盧巴希加」（*rubashka*，俄國的工人罩衫）上罩着藍褂子的少年；從他帶着的鉛筆和記事簿看來，我斷定他是監工或是工頭之類的人。

「有人常常說你的閒話，」他繼續說。「你不認真地揩乾淨你的機器。你從不揩拭牠。你沒有

看出機器生鏽了麼？」

他很憤怒的樣子。我猜想他是當局付給他職權的青年團員，因此告訴他，我不是職工而只是一個「實習員」（即，由外圍團體送來學習做工的人），因為沒有人教我怎樣把機器揩乾淨，所以我只能盡力模倣着別人。所以新手就遷怒到我們的監工；後者，因為不能如願地回罵他，只是找出氣，而本來要叫他來解釋的隊長，只是默在那兒，像鵝鼓着翅膀似的裝着沒有看見。最後，這個青年團拿了一塊氈子，認真地在揩拭着機器。於是，他告訴我把油注進去，隨後他平了一點氣，纔准許我回去。

當我到家的時候，我發現維那還是醒着的。我們團體的會員舉行過一次會議，她還只是剛上牀睡。她請我去參加明天在屋子舉行的演奏——作為「青年教育運動」的宣傳。她們演奏“*No. bilise the Base*”。那她們修訂過的動人的歌曲。在近幾天，我聽過這個流行的歌曲，「呵，當我們可以談愛情的時候，我們爲什麼要笑呢？」這曲調是由我們公共住宅的一位音樂家伏洛底亞製譜，而詞句是由維那和兩位青年作的，內容是採取工廠供給的材料。

七月九日

昨天我在外國商店買了一些糕餅賞給我們的廚師，唐麗亞老媽子。她在無論那一家爲公眾所設的店舖都能買到同樣的物品，但是，因爲她以爲這種果品是爲外國人準備的珍饈，所以她更歡喜吃這種食品，並允許我在廚房裏隨便要用什麼東西，以表示她的謝意。所以只要我需要就可以儘量用她的水壺裏的熱水。

老媽媽唐麗亞有點奇怪我的沐浴的習慣。那班還沒有接觸到歐洲文明的俄國人，一禮拜通常只有四天洗手洗臉（也許還洗頸子。）第五天，他們就洗一次澡；以前星期六是沐浴日，可是五日期制底應用，使他們洗澡洗得更勤些。

當我拿着買來的物品走到廚房裏的時候，我發覺唐麗亞老媽媽已經出去了，她的房子讓給我們一對離婚的夫婦看管，他倆正在彼此怒罵着。丁娜很憤怒，因爲她說，共社絕對不顧慮到她的母親的感情，意想把她的孩子送開。珂利亞告訴她，把小孩子送走免得孩子做殘廢，她是應該對同

志們感激的。

當丁娜在工廠做工的時候，她把孩子交給一個女僕看管。那是一個愚蠢的十七歲的女孩，當她應該招呼她的職務的時候，她老是和鄰居在院子裏閒談。在前三天丁娜回家的時候，她發覺這孩子的手受傷很厲害，現在我們的少年同志們已經決定，一定要把這孩子送到托兒所去。丁娜不聽他們的話，當我進廚房的時候，她的兩隻藍眼睛發黑，裏面含着恨意。

「我知道你，丁娜，珂利亞還在那兒說。」你拒絕這建議，只是令我不快。」於是她大哭大罵，責他把她的整個生命毀掉了。

「因為我不和你同居，你只是發脾氣，」他靜聽她說了一會兒話以後，就這樣說。

她的臉馬上漲紅了，她立刻高聲地叫了起來，使我拿起糕餅和洗的衣服就溜跑了。提到我們公共住宅裏結婚了的夫婦，我們總覺得是很不幸的；別的一對彼此過得很和好，可是丈夫是令人不滿的。他的老婆要比他年紀大，而且她的懷妊損壞了她的美。

「你有什麼辦法呢？」有一天，他對我說。「一個是性情易怒，一個是需要朋友。於是，猝然之間

你覺得你自己被束縛住了？」

「你說「縛住了」是什麼意思呢？」我問。「離婚是於你一件很容易的事呀。」

「是的，當然可以啫，不過一個男子不能丟掉那樣的女人的。她們一來就哭，於是你就完結了。」

我告訴他，我們國內的男人不到年紀很大了都不結婚的，在結婚以前，一般地，他們都有過幾段戀愛史。在戀愛和結婚之間的差異，要使他了解是很困難的，因為在蘇聯男女同住就叫做結婚。當雙方的一方受到不能解決生活的，阻礙的時候，離婚贍養費的規定只是唯法庭的判決是聽的。

維那借了我的綠色的長鏈子。她是扮演着小資產階級。她穿上一襲摺縐的黑花邊的衣服，有幾個地方是破了修補過的，可是遠看卻蠻風韻，因為維那是這樣的美麗，她穿什麼衣服都合身。我看見她的時候，令我記起那個叫做“*The Circle Squared*”的戲劇，在那裏面，一個青年團員對他的朋友唱道：「當一個女子是美麗的時候，她就是共社之花。」於是她答道：「如果你是一個有頭腦的少年，切不要和沒有入黨的女子結婚。」

在八點鐘，我們去看戲。當我在觀衆之間坐下的時候，我們的青年同志們到臺上去了。作曲家伏洛底亞和編劇者帕夫魯謝沒有參加表演，不過後者還擔任致開幕辭。舞臺前面寫有一句口號：「我們再造了工廠；工廠也要改造我們。」大廳裏坐有許多新入會的新會員。他們還只是最近考試及格，這是一種不容易的考試，因為「青年工人劇場」(Team)的會員資格必須有巨大的藝術的多方面的才藝。牠的演員必須能夠唱歌、跳舞，乃至於表演。那晚上的來賓中間，有一位「特拉姆」劇團的第夫利司分會的會員出席，他受着熱烈的歡迎。

帕夫魯謝立起來。他的演說主要地是針對着新會員。他告訴他們，「特拉姆」不只是「青年工人劇場」的意思，而且還有「青年工人運動」的意思。他說，當十月革命的時候，康索姆（註）的首創團體也就是在這同一的會場上開會的。他叫我們記起，這同盟有一種積極性和戰鬥性的優秀的傳統；「特拉姆」裏面的青年工人的任務，是用戲劇的形式表現這種傳統。

隨後，開始表演。這是一篇論及文化革命的戲劇，思想的根據是認為每個人必須在生活，尤

（註）Kons mol，即青年同盟——譯者。

其是在他們的日常工作上面革命化。阿利奧謝，帶着灰鬍子，飾着一個工廠經理的角色，那經理兼營他自己的私家工廠。伊劉謝飾他的兒子樊耶，令人不滿的丈夫，演一個受這經理收買的青年團員；他代表一類卑劣的人物，他設法逃避團體派給他的工作，當他應該盡職務的時候，他就裝病，等等。他手上拿着一瓶伏特加酒，一面跳着舞，一面唱着這樣的歌：『曼耶，不要和別的漢子跑呀，因為我是一顆華麗的青春的火星。』這齣戲的結束，青年團員們進來了，把所有的怠工者從皮鞋工廠全都趕出去。我們的同志們表演得很好，唱工也到家。當表演完畢的時候，椅子全搬開，因為豫備接着跳舞，可是我不能等到這個游藝節目，因為我要寫信回家。

七月十日

今天又是我的休假日，因為夜班到十二點鐘還沒有開工。在作家會食堂，我遇見娜泰芽。她領我去看她的母親，那是一個不整潔的，溫和的老女人，她的襪子垂在她穿的拖鞋上面，她的蓬鬆的髮堆一團團地散落在她的臉上。她和她的丈夫租了一個大房間，用帷幔隔成兩間，後房充當他們

的另一個女兒的臥室。這女兒是一個藝術史家。他們的第三個女兒睡在飯廳裏面，在這兒，他們把書架和碗櫃子隔開，爲她闢了一間臥室。這是一間够小的房子，可是還有一個窗，就在這兒做醫生的路得美娜·麗柯拉芙娜住着。

全家都圍在這張茶桌上，桌上擺着黑的白的麵包，果醬和各種的糖果，這些在俄國人吃飯時候是常常看見的。除了我注意到的女人以外，還有一個有着蒼白的藍眼睛和有丘疹的臉的少年。娜泰芽的母親，馬利亞·彼得羅夫娜是用一種對待不喜歡的女婿所表示的傲慢的慫恿樣子來看待那少年。以後，娜泰芽告訴我，他已經得到或是想要取得這種身份，但是馬利亞·彼得羅夫娜卻反對這個配偶，因爲珂斯提亞雖只有二十二歲，卻已經是一副「老氣橫秋」的樣子。

珂斯提亞是一個畫家，他的主要題材是狗與月景。「現在，這種作品已沒有人感到興味，」娜泰芽對我解釋道，「不過他仍然迷戀這種我們早已結束了的，笨拙的舊未來主義。他這樣怎能找到職業呢！我的妹妹里由巴也是一個畫家兼音樂家，不過她卻是做翻譯的工作。像這類的事他是不願意俯就的，他寧願像波希米亞人似的碌碌工作——是呀，他在我們這裏是最不受敬重的人

物，我的寶貝。」

她自己這樣說了以後，她斜視着我，看她給我有什麼印象，看我是否會作出於蘇聯不利的結論。爲要打趣她，我假裝着一副感覺遲鈍的，冷淡的，不關心的面孔，致使她帶着氣忿的開始說明，珂斯提亞的作品是無趣味的，無獨創性的，「不然的話，他會成功的；的確他會成功的，我的寶貝。」

我以爲這最後的一席話是出之於新蘇維埃的愛國心，這種愛國心是爲工人和知識分子所共有的。的確，後者是非常強烈地浸潤着這種愛國精神，就在當天下午，我看見牠活動的步驟的片面。

在茶桌上，談話轉到第二個女兒（藝術史家）經歷「清除」（*Tsistka*）的事；當她回她的房裏的時候，別的人告訴我，這就是她所以如此沈默和神經衰弱的原因。我覺得她是一個很可愛的女郎，我請求解釋這種不可思議的進程序。他們告訴我，每隔兩年，就把工人調查團送到公共辦公室去審核官吏的工作，他們設法考查他們的經歷及是否忠於職守。如果他們懷疑某人，他們就把他或她的名字送交公衆清除委員會，在那兒誰都能提出彈劾。在真像既明以後，於是就宣

告判決，或是宣佈「被清除者」爲無罪，警告遣退，或是開除。在特別嚴重的事件之下，可以禁止「被清除者」在一定的時期內擔任其他一切的職務。儘管他或她沒有做錯什麼事，每個官吏一想到（清除）就會不寒而慄。

馬利亞·彼得羅夫娜認爲「黨的清除」是一種還更嚴厲的試驗，因爲即使黨員和生活的最無關輕重的瑣事，牠也要調查明白。當舉行清除的時候，聽說有許多婦人像有一種神經病似的大哭大鬧。

這種清除的觀念，我感到絕對地憎惡，我覺得也許我的臉上流露這種不滿的表情吧，因爲娜泰芽，馬利亞·彼得羅夫娜和那醫生用她們的解釋來壓服我。他們以爲，作爲暴露官僚化腐化的官吏的一種手段，清除是必要的。

那醫生說了一件她自己經歷的一件事。和她的朋友結婚的一個喬治亞人，是具有非常善姑的性情的人；當他的老婆回家太遲的時候他就吵罵，而她解釋她是開黨的會議弄晚了的，這樣說他仍是不信任她。當舉行清除的時候，她指這（醫生）攻擊這男人，雖然他是她的同事，而且她和

他的家庭友善。他受着嚴厲的譴責，感到開除黨籍的恐惘。不論他發覺自己的錯誤，或是他害怕下次又會發生什麼事情，事實上他已經中止干涉他的老婆了。

「康民黨員沒有私生活，」這醫生說，「的確，蘇聯的公民們是沒有私生活的。每一個個人首先是屬於團體，牠有權利知道他是那一種人。我們認為每個人必須認清這一事實，非但不應該膽怯，發神經病似的，而且要幫助調查團執行他們的工作。」她投了一瞥非難的眼光在馬利亞·彼得羅夫娜的身上。這時馬利亞正想用她的梳子把蓬鬆的頭髮挽上去。

馬利亞點頭。「這話是真的。在這樣的場合，工人的舉止絕對不同。他們只是這樣說：「我是某某，同志，我做錯了那幾件事，」事情就這樣完結。可是一個知識份子卻以為被偵查，盤問，像小學生似的叫來責罵，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因為他們認為這是對個人的侮辱，」這醫生說。「每個知識分子都自以為是宇宙的中心和一種獨立的小真神；於是忽然地，他覺得他的神力成問題並受駁斥。是受誰駁斥呢？是不能講漂亮的俄國話的，幾年以前還是目不識丁的工人的駁斥。當然，他覺得他自己受侮辱，於是神經

病就發起來。」

「但是，這幾種手續怎能那麼迅速地辨明是誹謗和謊言呢？」我插進來問一句。

「如果受清除的人起初並不用他們的懼怯和敵對的態度，使得調查團懷疑的話，誹謗和謊言是很快地就可以辨明的。」

「如果唐麗亞發生了什麼事情，她能夠常常向工農監察委員會（R. K. I.）控告，她不能麼？」
馬利亞·彼得羅夫疑惑地問。

「當然可以，不過要是她舉動圓活，而不變得固執，她是不能發生什麼事情的。」

我想到如果羅爾夫和他的朋友們受「清除」的時候會發生什麼事情呢，這一個念頭使我笑起來。

當我起身回家，換上夜班的時候，已經是十點鐘了。黃昏的暮色在街上掠過，一小時內，夜色籠罩着全城。時令已經是快要日短夜長了。

七月十一日

「月光照耀着：在這樣的一個晚上

當和風煦煦地吻着樹葉

牠們不作一絲聲息，在這樣的晚上……」

無數次地，詩人歌詠了夜之強烈的美感，暗黑世界的脈搏，情人的細語，夜鶯的嬌媚，旅人在孤獨的路上的腳音，不幸的人們的嘆息，酒杯的叮噹聲，那撫慰俘虜們艱辛命運的夢境，受害者臨死的咆哮和暴風的怒吼。但是，還沒有詩人頌讚那在電光下閃爍的機器的吼聲，鋼的狂舞，或是那緩緩地射進工場的玻璃屋頂的，北方的爽朗的晨曦，在工人身上注射着一種健康的倦意，等到最後燈光熄滅了的時候，於是朝陽的第一道光芒在紅色的標語上閃耀着：「……！」

隨後工廠全掃乾淨了，那戴帽子的有金黃色的女孩就走來檢查你的工作，並接受或拒絕各色做成了的件數。有一個新從晚上休息所出來的女工，跑來問道：「你做了幾多件呀？什麼！只有一

「百件嗎？喂，昨天我比你多做三分之一呢？」

現在完全浴在早晨的陽光中了。在電車上，你開始打瞌睡，不過時常被擠在你前面的人家的膝頭撞醒。你擠下車；一到家，你就往近便的牀上或沙發上躺下來，無夢地，沈酣地，痛快地走入睡鄉了……

實際上，還是不能完全像那樣簡單的。在公共住宅裏，有十七歲到二十四歲之間的二十五個青年彼此互相密切地生活着，到了這時候，這地方就像蟻穴似的沸騰着。在下頭，離婚的一對在吵鬧着；還遠一點，我聽見丁娜的小孩的唧唧聲。那孩子有一個不能發音的名字，是以下幾個名字的頭一個字母拼成的：「Vladimir Ilyitch Lenin Dictatorship of the Workmen and Peasants」。這其間，那廚子，唐麗亞老媽子大聲在報怨着她用來準備開公共住宅的中飯的東西質料不好啫，分送得太慢啫。她帶便還說，屋子裏的主婦太多了，她們腦子裏裝着別的事情，而不特別做她們職分上的事情。

正在這時候，伏洛底亞也一定要在他的鋼琴上彈他的新歌調：「……」。隨後拉芽進來拿一

本書，自後，我再不能忍受加在我身上的負擔了，因為在我的窗下我聽見二弦琴的琴聲青年團員培特芽用奇異的姿勢唱夜的情歌給我聽：

「我們不要爭鬪，

設使你想有人在罵你，

隨他去！」

的確有人在罵你！對了！當我跳起來——所有的被蓋全從作爲我的牀的沙發的美國布套上掉下去了——衝到窗口的時候，最熱烈地從我的靈魂裏，我嚮應着他的歌句……

「怎麼啦！你睡不着嗎，同志？」我的同房維那關切地問。「不要緊的。到四點鐘，他們全要上班去的；那時你就能够休息了。」要到四點鐘呢！天呀！

七月十二日

我們那位患頭病的掌櫃在他的假日出去了。當我今天到廠裏去的時候，他的位子上坐着一

個頭髮蓬鬆的少年。但是什麼都知道的瓦利亞認為他實際不像他的臉容那麼年輕，他已經參加過歐戰和革命，一九一四年即已入黨。不管怎樣，我們全都高興他在這兒；他決不會像那老人似的高傲的，我們有什麼困難之處就可以問他的。確他是要求我們這樣做，當我不能在廠裏找到一把銼刀的時候，他會跑來幫我找一把。那老人決不會做這件事；可惜的是他的代理人仍只是代理人而已！在上午三點鐘，我們照例有休息的時間，屆時似乎常要舉行會議。最後一次會議，馬利殊金在大家欣喜的嘈雜聲中間宣佈，在最近的數日之內，我們就要完成我們的第二萬五千架耕種機——這意思就是說，我們已經達到計劃所規定的結果。他繼續報告一段最富刺激的消息，即從亨利·福特那裏收到一封信，他在數月以前曾買了我們的兩架耕種機，對牠們極表稱許。不用說，對於他的讚賞我們自是感到無限地高興；有人提議我們應該舉杯慶祝這封信，立刻這提案就在大聲歡呼中通過。不待說，馬利殊金馬上抓着這個機會把這樣的慶祝斥為只是想飲酒的口實。於是他作了一篇論到文化革命的演說……可是不久他的話聲轉得微弱了，到最後我僅捉到聲音的語調……話聲漸漸消失了……我伏在耕種機的堅硬的構成部分上睡着，有如躺在貴婦人的柔

軟的牀上似的濃蜜。

有一隻手拍着我的肩膀。「恕我把你吵醒了，同志，我是想問你願意加入我們一道到「第五日休息所」去麼？」

當我睡着的時候，會議上討論到表示對福特的祝意應該做些什麼事，這樣就決定組織一個到「台特斯可葉·塞羅」(註)去的旅行團，該地是以前沙皇的皇宮，從前叫做「沙可葉·塞羅」。那皇宮專門準備爲那班想在台特斯可葉消磨他們的第五日(蘇聯現改爲五日星期制，此即指星期日而言——譯者)的團體之用——所以綽號叫做「第五日休息所」。我們就決定在這皇宮過夜。

那個青年康民團員和我們的文化組織者珂利亞，叫我們放心，一晚的宿費和四頓飯，參觀博物院門票費也包括在內，通共不過二盧布八十戈貝克。火車票(來回票合八十個戈貝克)除外。

(註)即「兒童村」——譯者。

娜泰芽決定參加這次旅行，不過瓦利亞自然是拒絕的，因為十五號就是她的法國愛人的休息日。我請求她們兩個准我早晨放工以後到她們的家裏去，使我能够睡足覺，可是瓦利亞說明，假如我到她的家裏，我一定不能好睡，因為她的母親剛從鄉下來看望她。但是，娜泰芽卻給我一種誠意的邀請，可是當我在上午八點鐘叫她的時候，她告訴我，我得等一個多鐘頭，因為她還要赴一個黨的委員會會議。我不能理解，在做完夜班以後，她怎會有精力來召集執行委員會。

可是別人也好像不忙着回家睡覺似的。加泰雅手裏拿着鉛筆和簿子，正在挨次問着女工們，登記要做青年康民團員制服的名字，因為還有幾打衣服要用來分配的；裙子，罩衫，皮帶和皮肩帶，每一全套費洋十四盧布。我告訴她我不定做一套，因為哈噤色不適合我，不過無論什麼場合，當我回到維也納的時候，這樣的一套制服在附近的警察局可以當作免票用。

娜泰芽把我叫回來。「假如你沒有錢，我能借給你一點。」她很和愛；她對我很好，不過像索羅維奧夫一樣是表面的。我很願意邀他加入到「休息所」去旅行，但卻沒有勇氣到委員辦公室去找他。只在我離開那兒的時候，我纔發覺應該托娜泰芽帶一封信去。

我最後希望馬利亞·彼得羅夫娜的家裏是我的安身之所。找羅爾夫是不可能的！我做他的伴侶是太髒不夠資格。我定做了一套黑顏色料子的衣服和帷裙，牠做好了的時候我感到很高興，因為下工以後我能夠穿牠。可是我的愉快並沒有延長很久，每當暖爐的水濺在衣服上的時候，牠就留下脫色的印跡。黑水已經在我的精光的大腿上溜下去，在我的紅色短襪上留下斑點，而且滲透我的皮鞋。這雙皮鞋老是吃死了蒲提洛府路上的爛泥的虧。當我用手摸我的臉的時候，我覺得從我的襪子上把顏料帶到臉上來了。我不懂當別人做完工的時候怎樣會弄得那樣乾淨走出來；例如，加泰雅的美麗的彎曲的金黃色的頭髮和雪白的面孔，看來像是一個理髮店裏的助手，而不像一個金屬工廠的工人。我們的工作實際上並無損於健康，不過細密的金屬灰會滲透到皮膚裏面，塞住毛孔。你得全身用機器油塗擦。

當馬利亞·彼得羅夫娜看見我的時候，她把兩手捉住。「我親愛的孩子，」她叫道，「你上這兒來幹嗎的呢？」於是她介紹我認識她的丈夫，他是蒲提洛府的工人。

「你是十分容易認識的，」他說，「因為在你的臉上，五年計劃的艱苦的足跡已經印上去了。」

他在起草他的新家庭計劃。他是一位建築家，發明家，技術家，畫家還做許多別種事情；作爲一個高級資格的專家，他派得一間房子，裏面還辟了一間做他的研究室。

我告訴馬利亞·彼得羅天娜，我來此的眞意。她點頭。「是的，知識份子是这样不注意睡覺的，她說：『你不能像你的同房的人同時上晚班嗎？』隨後她拿一牀毯子和墊子給我。

『恕我問你，你怎樣弄得一身這樣髒呢？』這位建築師問，同時把刷子浸在水裏。「洗濯的設備每個工廠全有；我不懂你怎會身上弄得這樣髒。」

『讓她睡吧；你沒有看見這孩子已經疲倦得要命嗎？』馬利亞·彼得羅夫娜說。「到餐室裏面來吧，我親愛的；這裏沒有人，你可以痛快地睡一下。你要喝茶麼？」

電話的叮叮聲吵醒了我。不多一會兒，我聽見馬利亞·彼得羅夫娜在講話，即使我仍是半睡着的，我不能不注意到她那平日很和愛的聲音，竟成爲不客氣的，斥罵的口氣。「她不在家，」她尖聲地說。「我不知道她什麼時候回家。她下工以後，她有一個執行委員會，今晚她要在鐵路工人俱樂部表演。明天她也是很忙，後天也是一樣。再會。」

現在，我完全醒了；我坐起來，看見她滿臉氣得通紅的站在我的前面。「我真不知道，我親愛的，」她說，「我是一個老女人，不過像這樣一個人，反正一樣，在我是太不感到興味了。」我猜到她是在說珂斯提亞；也許她是以為娜泰芽把這件事情告訴了我。

「當然，這是她自己的私事，」她繼續着說，「可是，當我回想到我的年青的時代……當我在里由巴的年紀……喂，當時我還在監獄裏面……」

「你坐過牢嗎，馬利亞·彼得羅失娜？請你把那裏面的情形告訴我吧。」

「這也沒有特別值得說的。每個小康之人都下獄，那時我們坐牢自是當然的事，我們學生視監獄為我們的真正的大學；當我們自由的時候，我們決沒有時間讀書，因為常有很多的別種事情要做。在牢裏，我們有安靜讀書的閒暇。」

「政府知道這情形，企圖做些使政治犯不舒服的事情。他們在窗子上還加上一層百葉窗，這樣就使得我們的房間太暗，使我們不能看書。我們抗議無效；最後我們開始絕食。」

「當時，我還只十九歲。每天晚上管獄的人帶一杯牛奶到我的牢房裏來，想勸我喝了它。」假

如因為我在這兒，你怕羞喝它，馬利亞·彼得羅夫娜，「他老是這樣說，「那麼我就出去；也許你可以放心喝一點。」他是一個善良的人，可是他一點都不理解革命運動。可是你是能想像得到的，我親愛的，我明明知道整晚一碗牛奶放在我的旁邊，是如何痛苦的一件事呵。我不敢把牠撥掉，因為怕他以爲我把牠喝了。」

「可是，只有絕食的頭幾天是這樣痛苦。以後我覺得十分輕鬆和發軟，宛若我沒有肉體似的，可是我軟弱到一點都不能動。我整天躺在墊子上，大多數時間是睡覺。餓到第十二天，他們來強迫喂我們。他們有一個說道：「瞧，她的兩頰還十分紅呢；我敢必定她吃過東西。」於是他們想把牛奶灌進我的喉嚨裏面；當我聽見似乎在很遠說話的聲音的時候，我幾乎沒有力氣把我的頭轉過來：「得了；我們把百葉窗的取下來吧；我們有命令把牠們換掉。」他們這樣做是因為有幾個「大亨」(big noise)的兒子也在牢裏面，和我們一道罷飯。」

她停了一忽兒，看來像在搜索她的記憶似的。隨後，她繼續說道：「雖說受了這般的苦楚，我敢說，我在獄中是幸運的。別的人有更痛苦的經驗。很久以前，有一次，一個女政治犯受了看守的職員

的侮辱；她搗他的耳光，爲這事他們就鞭打她，作爲反對這種暴行的一種抗議，她吃毒藥，所有她的同監房的人也和她一樣。事情的結局常是把我們送到西伯利亞去，虐待是極其平常的事，可是同樣沒人屈服；這樣的事情只是刺激我們繼續鬭爭……是的，是的，現在的青年人全不知道當時的情形。不消說，他們仍然是在鬭爭，不過他們打的是一種必勝之仗。」

「馬利亞·彼得羅夫娜，我說，『你能對我說明，爲什麼一有人把一張傳單塞在他手中，俄國的知識份子就準備獻身革命，而我們其餘研究過馬克思和列寧的人，爲什麼始終是鄙俗的人呢？』」

「這很難說。」馬利亞·彼得羅夫娜聳着她的肩膀。「這一定有一種歷史的理由，因爲我不相信俄國人資質優秀的話。此外，你對你本國的人民是不公平的；現在有多少真正的革命者在法西斯蒂的監獄裏憔悴呢？爲什麼你只是看見小資產階級的崇拜者，而忽視那班想強迫世界進步的無名的英雄呢？」

「也許因爲自己沒有和他們接觸，或者是因爲我是一個悲觀主義者。」

「革命者決不會是一個悲觀主義者。不要讓這些東西挫傷你的勇氣，孩子；固定着你所參加的戰線。」

「瑪露西亞，」那位建築師從隔壁房間叫着，「到這兒來。我要拿點東西給你看。」

馬利亞·彼·羅夫娜到她的丈夫房間去了。我仍然留在那裏獨自沈思着。

七月十二日

當瓦利亞在八點半到此的時候，她筆直來到我的面前（在中午休息時以前，她照例是沒有好多事情做的），我們彼此告訴自昨天一別以後的十六小時中間的我們所遭遇的事情。

今天，她帶着非常抑鬱的心情來到我面前，說道：

「想想吧！我的法國人打了他的老婆！」

我把機器弄停了，把做好的槓桿搬開，沒有答話地，開始安置第二根。我不能忍受這個傢伙；我深信他是一個討厭的人。她繼續說：

「他跌倒了，碰傷了頭。他們把他送到醫院。當然，他有點喝醉了。」

原來就是如此。我又開動機器，報怨地說：

「把醉漢趕出去。愛那意大利人吧；他要好些，而且很愛你。」

「是的，你知道，」她低聲說，「他會吻遍我的全身。你能找到愛情更大的證明麼？」

我聳着我的肩膀。「這表明和法國人脫離關係了。」

「一個男子在愛着你的時候，你怎能知道呢？」瓦利亞問道。得了，你怎樣曉得這些事情呢？這些事情靠着虛榮心，安慰和性的饑餓是這樣的多。在沈思到戀愛問題的當中，我忘了守着天秤盤，其結果，鑽子刻有幾公釐的深度，就因為想到那個蠢法國人，使工廠蒙受到幾個盧布的損失。恰巧索羅維奧夫選着這時間跑來。現在，他有沒有注意到我，把弄壞了的槓桿拋到一邊去呢？當他一直來到我的機器前面的時候，總覺得他的精神很煥發似的。「你們這班女孩子的情形怎樣？」他問。「看這兒吧，」瓦利亞說，「現在是你對合作社開始稍微注意的時候。她們在這兒把事情可怕地弄糟了。」

「我們——爲什麼要我們呢？指派你們中幾個女子去照顧這些事務就得了。」

「能够做事情的人全都專任了社會的工作——全沒空。」

「你自己怎樣呢，提摩費葉瓦？據我所知道的，你自己特別不盡力。」

「呵，你——」瓦利亞用手呵他肋骨的癢。「走罷。」

她轉去招呼她的汽筒，索羅維奧夫在我旁邊默了一忽兒。我鼓起了勇氣。

「維克多·米哈羅維琪，」我盡力把我的語氣弄得自然些，「明天我們要去參觀兒童村。你高興加入我們的旅行團麼？我一定是很快樂的。」我忽然詫異到，爲什麼我要說「快樂的」二字。「我多末笨呀，」我這樣想。

索羅維奧夫笑了。這是第一次，我看見他笑。他的臉顯得十分爽朗和年青；他深深地吸引着我。「抱歉呵，我不能夠去，」他答道。「明天我很忙。」於是（也許他看見我臉變色吧；是的，一定是這道理）他接上說：「的確我很抱歉；我是很高興去的。」他還說了別的事情；講些什麼，我不能記得了，不過那些事情似乎是不必要的。究竟還用得着說別的話嗎？我聽得夠了。如果他真想來，他

會找機會的。至少這是我在相似的場合常做的事，別的人也會這樣做的。他走了的時候，我是十分高興的。

『你有什麼事？』當她沿着那用我們的早餐的茶爐子走來的時候，瓦利亞問道。『你的臉十分蒼白。你和索羅維奧夫有過口舌嗎？如果他有點打趣你，你切不要介意；他不會有什麼惡意的。他是一個好人。你知道他的妻子嗎？她參加過國內戰爭；當我們人民進擊佛蘭吉爾的時候，他們纔聚會在一塊。』

原來就是這個理由。對了，我應該對這事想到的。這樣結識的人們當然會成爲終身配偶的。

從他那兒，我要求什麼呢？我不能了解我自己。我有了羅爾夫，可是他和我走着不同的路。而索羅維奧夫卻會走着他自己的安全的道路。

我躑躅在一條鄉間的路上，在那兒我聽見電線的隱約的營營聲。我不知道我沿着這條路走向何處去；我就像那兒從那兒來的古老的破碎的西歐似的，混亂和無助。我僅僅在工場裏面找到我的真我，因爲在那兒，一切都有意義。我在那兒做工是爲的解決我的生活麼？是的，的確的，不過這

還不是主要的目的，在這兒，他們正在實現童年時代的夢想，正在建設一個不支持在鬆雪或散沙的基礎上的真實的世界……

七月十五日，夜。

這是多麼可愛的日子呵！昨天我們在早上八點鐘放工，並通知大家在下午六點鐘到車站集合。雖然隔半點鐘就有一班車，而且只有五分之一的工人休假，火車上還是擠滿着人。可是在蘇聯是司空見慣的；隨便在生活的那一方面有如便利的住宅，事務所，電影院和便利的交通，都還是擁擠着的。這個國家還沒有達到滿足新顧客，大眾的地位；幾世紀來不敢表示一點願望的像雪崩一樣的人類，現在都塞滿在博物院和影戲場裏面，熱心地讀着報紙，雜誌和書籍。一百萬本書籍一剎時就不見了。

這表明求知的渴望是多麼迫切呵！當坐着或站着的乘客閱讀科學的或經濟的教科書，或是用英文或德文背誦着，『你看見同志施密德嗎？不，我沒有看見他，不過我的妹妹看見他的伯父。』

的時候，在車廂裏嘈雜的聲音老是這樣不停的。

現在我們動身到尼古拉二世的皇宮去。我們的少年們把尼古拉二世綽號做尼古拉夏。在享受現在的時候，我們要知道近的和遠的過去的歷史。

二十五分鐘的火車——我們就到了。所以現在我們必得趕快。別一個團體要搶先上公共汽車。

「我們是蒲提洛府的！」

「我們是三角徽章的！」

最後我們同意以下的規定。三角徽章的工人從後面上車，蒲提洛府的從前面上車。當他們在中間碰着的時候，於是他們又能繼續鬭爭了。

女店主費瑪不肯從我這邊移動；她望着我穿的維也納皮鞋出神。加泰雅竭力在寬解那眼淚汪汪的馬霞；今天除了娜泰芽以外，所有的女孩子們全都穿着新的青年團員的制服，罩衫上繡着「K I M」的徽章。「你不是團員，你爲什麼要掛我們的徽章？」馬利殊金質問崛強的馬霞，她用

如雨似的哭喊來答覆。難道我沒有資格掛組織的徽章嗎？馬霞繼續不斷地反問着，不過馬利殊金顯然因他的話所發生的效力嚇倒了，不做聲地溜開了。

「第五日休息所」坐臨亞力山大皇宮之側，在沒有流放以前，這班皇族都住在這兒。我們的寢室，四圍牆壁都粉飾一新，放着十七張無斑痕的乾淨的牀，乾淨的被單和新絨毯，每人有一條手巾。有一邊牆掛着一架穿衣鏡，天花板上懸着金色的枝形燈架，因為我們是下榻在沙皇的公主們的房間裏面，但是我們卻開始咒罵她們，原來我們發現到洗盥間設在地下室，而另一間比較必要的房間卻臨近迂遠的樓梯後面。這間房的我們的前住者之一，在「休息所」的「壁報」上對這件事情表示他的不滿，這是我們來此纔發現的。他這首詩的題目是工人突擊員的休假日：

「我要用全力詛咒你們；

我敢把日班和夜班起誓

我考究你們的地方，毫無用處。

無論什麼地方都不方便。」

可是這種敘述須要視爲詩歌的誇大的話。

在我們的晚餐的期間——有幾個別的工廠和辦公室的代表也出席——各個旅行團的首領宣佈爲我們的二十四小時的逗留所規劃的節目。早操的利益引起我們的注意，在早餐以前要舉行這一個課目，我們的旅行卡片背後有備考說明，載在禁止在「休息所」內吸煙，或對同住的休假工人或同事用野蠻舉動的通告的下面。這樣我們纔知道，我們來這兒是學習怎樣最適當地利用一日的閑暇，尤其是要用視察皇宮及其他的國有產業，用組織遊戲及和同伴在湖上盪槳的集體的姿態，來滿足我們的文化需要。我們接到通告，說俱樂部以至牠的鋼琴和圖書室可完全歸我們隨意用，不過在翌日下午五點鐘以前，我們必須退出，讓給下組的休假工人來借用。

原來這屋內還有一架鋼琴呵！我們趕快穿過公主娘娘的紗籠，終於我在大公爵夫人一度練過琴的，美麗的花梨木的大鋼琴旁坐下，奏着一曲維也納的華爾茲舞，唱着無趣的愛國的詞藻，「呵，維也納，孤獨的你！」隨後我放大喉嚨唱着：

「王知道什麼最美滿——

六天做工，第七天才休歇。」

蒲提洛府的女孩兒們就跟着我唱的跳，假如娜泰芽和馬利殊金懂得原文的意思，她們會使我注意到，事實上蘇聯比任何資本主義菩薩更懂得多些，因為牠會規定只要做四土工就有一天休息。我能回答什麼呢？可是我們的青年團員卻無心想了解字句的意思；他們只管跳舞，當我停奏的時候，又有再奏一曲「外國華爾茲」的熱烈的請求。

當我們睡覺的時候，我注意到所有的女孩子們都脫了她們經常穿的有顏色的衣裙，換上極其乾淨的白布的汗衣。因為這兒廣東縐綢和人造絲都是很稀貴的衣料，有些人穿了毛織的衣服，不過費瑪的襯衣上的皮帶卻鑲着一排念珠。

一早，男人們把我們叫醒，叫我們在健身房集合。我注意到，我們的早餐菜單恰恰是和高加索的休息所的一樣，即茶，麵包，牛油，兩個雞蛋和 Kasha（即稀飯，俄國國產的一種食物。）這顯然地是各個休息所的傳統的早餐菜單。

隨後，我們走過皇宮。卡則林宮（Catherine Palace）的樣式與十八世紀建築物的構造差不多沒有兩樣，不過要比雪伯龍（Schönbrunn）更宏大，更堂皇。可是亞力山大皇宮卻是悲劇的出沒之所，因為在牠的宮城中卻演過和革命啣接的，最後的沙皇的歷史。

這是有宗教觀點而智力標準很低和心地惡毒的，土地的領主底官邸——否則爲什麼掛着許多肖像呢？在他的寢室中，掛在牆上的畫像不下有七百張，尤其是有許多兒童和德國、英國的老頭子老太婆的照片。在沙后的寢宮，有許多御告的畫像——這是皇帝和娘娘望着生兒子和嗣子望了長時期的證明。馬利亞·安唐勒特和她的孩子們的圖畫——法國大使獻給沙后的禮物——造成一種悲劇的印象。「在法國可能的事情，在俄國卻不可能。」當她從他獻給她的幾張畫裏揀了這張畫的時候，她這樣自信地想着。

我們看見在美麗的錦繡的屏風後面站着奧克蘭娜（註）的用人們，宛若皇宮最完備地周密地警衛着似的。時時刻刻地恐怖襲擊着宮中的皇族；他們已經意識到大禍臨頭，試想用神祕主義，

（註）Okhrana，即沙皇時代的俄國政治警察局。

用拉斯蒲丁和尚的教法，用警察所實行的恐怖化的制度來逃避大難。

可是，我們沒有一個人能夠爲他們感到真正的悲哀。在寫字檯上放着許多已經簽過字的死刑執行令；這兒掛着「黑色百人團」貢獻給沙皇和太子的盾牌和旗幟；這兒有沙皇發給「黑色百人團」在國會中的代表們和教會的各個巨頭的囑託書，指示殺戮猶太人及其他反動的活動。那兒還有——他的毒辣的是愚策是驚人的——沙皇在「血的禮拜日」以後對工人代表團的訓話，在這篇演說中，他皇恩浩蕩地赦免了參加革命的「他的寵愛的子民」並允許考慮他們的「實際需要」，而同時警告他們對於他的臣子和土地領主要帖然就範。

當沙皇命奧克蘭娜組織代表團來聽他的演說的時候，他們覺得扮演這幕可厭的喜劇的工人是太少了，於是他們不得不拉扯他們自己的警察來填補代表的缺額。在一個老年的工人寫給警察的信足以明晰那班愚昧的去應沙皇邀請的人們底命運。那老人寫道：「發給我一張新護照讓我走開，因爲我不能繼續在這兒住了。在工廠的各處，我只看見黑的臉孔和忿恨之色繞着我。」

在大廳裏面，有一張沙皇對於一九〇二年來俄作客的盧貝總統（註）所致的歡迎詞，和那一

大國宴的菜單成列在一起。下面卻掛着法國社會主義者的宣言說他們決不以法國政府借給沙皇的幾百萬借款負累在俄國人民身上。

我們置身於美麗的公園中，那兒有老樹和靜美的池塘。我們緩步走過到音樂堂去的大路。女孩子們決定在中飯以前划船，而費瑪提議，我們一定要在台特斯可葉消磨晚上，理由是即令我們從我們的「休息所」搬出，我們都能在公園過夜的。可是加泰雅今天晚上要上學，而娜泰芽正在期待着她的男人從克倫斯塔特到來。

「呵，費瑪在她的肩膀上友愛地輕輕一拍，「你還是愛着你的光頭的老傢伙嗎？」

「我並不否認，我對他仍然保持很好的友誼，」這是娜泰芽溫厚的答覆。

現在，所有的女孩子們都開始話她們的家常了。她們的父母早年時代就是做工的。她們全都讀完七年級學校或工廠學校，只有娜泰芽是例外，她是在革命前生長的。

當別的人在盪槳的時候，娜泰芽把她的歷史告訴我。雖然她只有三十四歲，她過去就做過二

（註）Emile Loubet 法國總統（一八九九——一九〇六）

十三年的工，因為在十一歲的時候，她就做了裁縫店的女差遣。以後竟擢升到次於掌櫃的職位，在那兒從早到半夜，她常是忙個不歇的做事，整天都是微笑的快活的臉孔。她沒有別的衣服穿，只有一條襤褸的裙子和一件補過的罩衫。這件罩衫，她常是在晚上洗好，掛在窗子後面晾乾。

這就是她的生活，那時我們還在學堂裏鬼混。當娜泰芽拿着一個裝着紙樣的箱子，在雨雪紛飛中跋涉，跑到時髦的太太們的家裏去的時候，其時我們正在讀羅馬辯論家西洛的演說。如今，時髦的太太們在這個世界上消滅了，拉丁文從我們的課程上取消了，可是加泰雅，這做工的少女，跑到高級學校去念書，還有知識分子們到工廠來向工人們學習。

我在娜泰芽的瘦膀子上輕輕地拍了一下。「你們俄國人做事的確不錯。對你們，不勝欽佩之至！」

她的答話是可以預料得到的。「那麼跟我們學樣呀！」於是她加快她的脚步，儼然像給我帶路的樣子。

七月十六日

除我自己以外，我們的工廠的所有的工人今天都領了工錢。我聽說，新進來的工人不做完四個禮拜的工是不能領工錢的；通常他們是向工廠補助基金項下借點錢，或是找他們的同事想法子。爲要使工人不容易改換職業，所以纔厲行這種手段；有過一個時期，有許多工人繼續不斷地從這個工廠換到那個工廠。一個人學會一門職業，馬上就跳到別的地方去，因此花費了他的以前的僱主的許多時間和金錢。

當女孩子們看見我的不快的臉色的時候，她們全都把錢給我。我受到極度的感觸，不過我情願到周遊世界 (Vokrug Svieta) 的編輯部，問他把我那篇論文的稿費預支給我。

當中午的休息期間，我們聽說少年先鋒隊就要來看我們，不久，我們的工場被一羣十歲以上的十三歲以下的男孩子和女孩子們侵入了。他們都是學童，爲了雙方的利益放在我們的保護之下的兒童；我們應該把我們的工作教給他們，幫助他們的組織活動，爲報答我們，他們給以文化的幫

助，並在鬭爭當中幫助我們，和我們合作壁報和「無神論小組」的事務，指揮政治的運動（例如，爲選舉，我們所報告的百分之百的人名單，他們都要一一過目的，）發起反對酒宴後的酒精中毒和缺席不到。

法里雅·新科告訴我，有一個女學生怎樣向一個以淘酒出名的，鑄造廠的老工人，要求社會主義的競賽。當那孩子對那老頭子說的時候，她已經來了：「我們要訂一個合同。我要把我的功課學好來，而你也一天都不休息。」

那工人同意了，不過有一個條件。「我不能答應你戒酒，」他說，「不過我決不會停止工作。」迄今——已有二十八天——他履行了他的約言。

這班孩子們被各個工人分配做宣傳的工作。他們彼此互相競賽，誰能把最進步的階級意識貫輸到他們的被保護者的腦筋裏面，並把他們教育成爲最優秀的最堅實的工人。

一個打着紅領結的十二歲的男孩子招呼我。「我聽說你是一個外國人，」他說。「你高興到先鋒隊俱樂部，爲我們演講資本主義國家的普羅列塔利亞兒童的近況嗎？」我同意他的請求。「好

呀。後天我把先鋒隊全體集合攆來，因為明天召集演講會怕來不及。爲你安全起見，後天我來工廠請你，免得你走錯路。等一下；我應該記下你的名字。我是約瑟夫·芬克爾斯坦，猶太人——這就是說，我是一個弱小民族。我的父親是一個傷兵，是靠養老金供給生活。我送我的母親上學；在我們的學校裏面，我們組織了爲要學一門手藝的婦人的課程。我的母親將來要做一個金屬工人。因爲現在我們非常缺乏工人，所以要每個人都能學會一門手藝，這是很重要的。你工作的成績怎樣呢？你糟踏了許多零件嗎？」

「不，並不多的。請告訴我，芬克爾斯坦同志，你喜歡一把削筆刀嗎？我有多餘的一把放在家裏，我可以把牠轉送給你。」

那男孩子的眼睛發光。「真是一把有鋼口的削筆刀嗎？」他問道。

「是的，的確地。真是一把有三道鋼口的削筆。」

約瑟夫雙手插在口袋裏。「很不錯，」他加上一句。「到四點鐘我來叫你。你同意嗎？」

他準備要走。於是他忽然發生一個新思想。「你不要以爲，我全靠你的削筆刀呢，」他說。「當

我們完成五年計劃的時候，我們將來就有好多把比外國孩子的還更好的刀呢。我們現在缺乏這種商品，只是因爲目前需要發展我們的重大的工業吧了。」

「我知道這個，約瑟夫。我送這把刀給你，只是作爲同情和團結的一種標誌。」

「好呀。站在這種立場上，我纔能接受。」約瑟夫點頭。「唉，再會，照應你的機器吧。牠是從美國來的，牠是用金洋買來的呢。」他和我告別。

「對於我們的新興的一代，你怎樣想呢？」瓦利亞問我。「我自己的孩子恰巧是這樣的一個。現在他長大了；他快有十五歲。」

「十五歲嗎！然而你纔不過有三十歲呀，瓦利亞！」

「我結婚很早。」她覺得她自己是一個已婚的婦人。「私生子」的觀念在蘇聯是不存在的，而且認爲教會婚禮是私人的奢侈品，離婚是絕對地自由，像這樣的結婚已喪失牠的社會的意義了。

在飯店裏面，我認識一個顏色憔悴的女伶，她定了一份肉帶回家喂她的貓——「唯一的」

仍然「對她忠實的人們」她看見我在蘇聯覺得很舒服，她覺得很奇怪，而且不能了解爲什麼一個人要離開像奧大利這樣的國家，那兒華麗的布匹是那樣的便宜。我對她解說，我們國內有許多女伶失業，她們沒有購買一點鮮美布帛的能力，然而她只是疑惑地搖頭。隨後，娜泰芽和她的粗野的男人一道走來了。當他在碗櫥上拿他的有冷鱈魚的例外菜的時候，她把一封信我看，是另外一個男人從西伯利亞寫給她的。我看見開頭幾句：「納達利亞·亞力西芙娜！我們鬧這個問題鬧得够久了！現在是嚴肅的論到這問題的成熟的機會了！」

這封信下面怎樣說，我不能知道，因爲恰在此刻她的丈夫端着冷鱈魚回來了，於是她趕緊把信藏在口袋裏。在用膳以後，當他到外套室去拿她的外套的時候，她告訴我，第一和他沒關係，第二她還沒有愛那另一人的決心，因爲她沒有特別要到外省住的願望。

「此外，他又是另一種害憂鬱病的人，」她說。「因爲到外省去，唉——可還不是「脫小難而陷於大難」嗎！」

隨後，她的丈夫拿着外套回來了。每每談話開始談得頂起勁的時候，他老是闖回來了。我怕馬

利亞·彼得羅夫娜和她的女婿弄得不好。

娜泰芽又問我，到二十號，在一個青年畫家的鄉居裏宴會，我是否願意去。二十號是我的假日，我可以睡到第二天，所以那時間於我很適當。我問娜泰芽，她所指的宴會是什麼意思。

「呵，普通的事情，」她答道。那可以有許多意思，得了，我們將來再看吧。

今晚羅爾夫的電話叫醒了我。他請我明天關照他，並沒有談到詳細的事實。

七月十七日

我們這兒來了一個新女工——從巴庫來的東土耳其人。她引起了工場的全體工人的注意，是因為大家看見她用作帽子和外套及遮臉之用的面紗。像對所有的外國人一樣，她立即被包圍了，受着接二連三的詢問。

她老是默在那兒笑。當她用滑稽的蹙腳的俄國話答問的時候，她的雪白的牙齒在她的棕色的臉上發亮。娜泰芽跑來，請她一定要在中午休息期間演講。這個東土耳其女孩兒——她的名字

是特琪·嘉塞爾——同意了的時候，別人纔回到他們的機器上做工。我看見瓦利亞在追着她，和她作無聊的糾纏，我心裏覺得討厭。也許她和我的友誼從此要冷淡了。一個東土耳其人當然要比歐洲中部人更有趣多了。

「我們現在境遇很好，特琪·嘉塞爾頭一句就這樣講。『在去年十月以前，我們常和俄國人及阿美尼亞人打仗，可是現在已經停止了。政府幫助我們，因為我們以前是一個被壓迫民族。當一個東土耳其人和一個俄國人同時謀同樣的職業，東土耳其人總是先成功的。」

「那兒的婦女怎樣呢？請告訴我們一點你們國家的婦女的狀況吧！」女工們喊着。

「所有我們的年青的女子都把面網撕去了；我們讀書，或是在工廠做工。現在我們已經學得一種拉丁字母。不過……」忽然她的臉色變得嚴肅起來，「你們一定不要以為，學習牠於我們是很容易呢。我們比你們所處的時代艱苦多了，因為反對婦女的成見在東方的根底很深。我長大是沒有受過管束的，不過當我的大姊姊不蒙住她的臉時，我的父親，大哥是和她大吵大鬧過的。那兒要使男子習慣男女平等的觀念，是很困難的。不消說，我們同時代的人是十分不同的，不過老年人

卻極其頑固。他們快要沒落了。』

關於激烈的手段補述了一番之後，特琪·嘉塞爾更進一步對我們談及在巴庫的阿麗·拜拉摩婦女俱樂部所發生的恐怖的慘殺，因為該部的主席拒絕放棄她的康民黨員的活動，卒遭她的丈夫砍殺。她的無頭的屍身卒在血池中發現。

所有聽衆的臉色都陡然嚴肅起來。在和平中間所繼續的國內戰爭，想起來是可怕的。娜泰芽問別人可願意對這位東土耳其同志有什麼答話，可是當沒有人願意起來說話的時候，她忽然叫到我的名字，請我說一點在資本主義國家裏面女工的情形。她的請求完全使我感到驚異，可是不願拒絕她的請求，因為我受到特琪·嘉塞爾講的故事狠深地感動。

『抱歉得很，我不能告訴你們撕面網的事情，像剛纔特琪·嘉塞爾所說到的那樣，』我開頭就這樣說。『我們的婦女的面紗雖在外表看不見，然而實際是存在的。這種面網是用足以窒息婦女生命的不平等的法律，男女工人工錢等級的差別，及用使妻爲夫奴役的婚姻權利組織而成的。有許多場合，婦女的戀愛和結婚的權利甚至都被剝奪；例如，在德國，結過婚的女教師都被開革，不

過尤爲不幸的是在所謂「自由戀愛」中放縱的女子。她被玷辱爲「青年中害羣之馬」，在着手下屈緊縮計劃的當中，她便名列於被革退的名單上。失業者之次第的增長逼着許多婦女賣淫，可是作爲「嫖客」的男子卻不治以應得之罪，如在俄國男子所受到的一樣；相反地，罪名倒落在婦女身上，她被社會視爲擯棄者，被警察蹂躪，被國家苛稅。」婦女們聽我講的時候老是搖頭。

當我講完的時候，恰巧中午休息時間告一結束。那個聽的時候眼睛不斷閃避着的（或者他自視爲沒落着的舊時代的一員吧）隊長，把特琪·嘉塞爾護送到她的機器邊。不用說，她已經把她的面紗脫下來了，因爲面紗是很容易被機器絆住的。

現在，瓦利亞出面了。在中午休息期間，仍然沒看見她的影子。

「我聽說你演說了，」她說。「可惜，我那時不在那兒。我那時在裝配室，我有一個韃靼朋友在那兒你是知道的。」

「瓦利亞，我不懂，你能在那個眼睛一條縫的，小個子黃種人身上感到什麼興味。」

「這沒關係。他是一個弱小民族。我甚至能愛上一個黑人。」

『你不怕生一個小黑子麼？』

瓦利亞搖頭。『不。我們一定要洗白那班黑人。他們被塗得太黑了。』

我一定要把這話告訴羅爾夫。他要比愛迪等人百分之百地富有自由精神，甚至於容許在美國交接黑人爲友，不過當我問他身上是否摻有一點黑人的血液的時候，他仍然會氣憤的。只有在這一次，我纔看見他真正生氣。

今晚，羅爾夫和我受到王·衛琪門先生的邀請。王君從前在鄰近里加和聖彼得堡的地方領有大批田產；以後我聽說，他保護這些財產，曾手中拿着武器反對布爾雪維克黨人。羅爾夫以前在紐約認得他的哥哥，就是他的哥哥叫羅爾夫來找這位俄國人衛琪門。他今晚就是赴這個約會，並邀我一道做他的翻譯。

我的服務是不必要的。除了能說流利的法國話和波羅的海男爵說的德國話以外，王·衛琪門先生還能操很漂亮的英語。我不能說，他是否懂得俄國話，不過沙發那旁卻有一張告白：『此處禁講俄語。』

他的太太還顯得十分年青，頭髮是朝後梳的，而且在腦後挽了一個結。她對我解釋，這張禁條是爲他們的兩個女孩子而設的，寫牠的意思是使她們能够學習外國語。年幼的一個女孩十四歲，她的年長的姊姊是十六歲，雖然她倆至少比我高過一個頭，但都和我屈膝爲禮。

我聽說，因爲她們的父親已經教過她們，所以兩人都從沒進過公立學校。大的一個現在就私人學習外國語，訓練做一個德文的教師。這私家學校允許在她考試及格的時候，給她一個職務（所以她的生活將來仍局限於私家的範圍。她對這個布爾雪維克的顛倒的世界只有最小限度的注意。）不過小的一個現在是進學校了，而且將來是要吸收所有的政治訓練的，而這種政治訓練，顯然她的父親是不會把牠編排在她以前的課程表內的。

羅爾夫問這老人生活如何維持，他的答覆是全靠養老金維持。雖然這筆養老金不算高，但至少不會比分給別的蘇聯人民的費用低。他還領得到口糧單。

他的太太教私家的課，薪水很低。當我問及她願不願意找點別的事情——以她的語言的知識，找好點的事情並不困難——的時候，她答道，她的丈夫已經太老了，讓他一人留在家裏過久是

不放心的。事實上，他一天到晚老是騎在靠椅上。

他們的房子看來似乎樸素，陳設得很壞，不過卻很寬敞，女兒的寢室是用碗櫃隔成的。

「喂，自你習慣了新的事情以後，你的近況怎樣呢？」感到有趣的羅爾夫這樣問，不過這老人帶着一種顯得圓滑和慎重的神氣把話扯到別的題目上去了。

「因為當過軍官，他坐了很久的牢，」在我們回家的路上，羅爾夫這樣告訴我。「所以他纔這樣膽怯。」

「膽怯！我奇怪，他們不把這個反動的老朽分子槍斃，反倒發給他養老金。碰了鬼，你把我帶去看這樣的人！」

「他是屬於被征服者。我總是站在弱者的一邊的。在美國，我是在本地的唯一的……」

「然而你是一個極不可靠的同盟者；一當事業毫無成功的時候，你就逃跑了。單就我來說，我是絲毫也不同情那班爲造成一種局勢，而戰爭的人們在那種局勢中小女孩子們從早到晚都背着重的箱子在街上逃跑。」

『什麼箱子呀？自從你在蒲提洛府做工以後，你就變成這樣偏激的了。真奇怪！』

羅爾夫用着心平氣和的、友情的口氣講了以上的話。他決不在事情的原理上爭執，因為他認為這種原理全然無足輕重。羅爾夫穿着一套藏青色的西服，穿這種服飾令人看來覺得他的臉瘦削，這種顏色和他的曬黑了的皮膚是調和的。他的見解也許可以引起爭執的，不過由他的外貌上看是不能有兩種意見的，因為他恰像一個被十五歲女孩子鍾情的電影明星似的。

在我的心眼裏，我能够看出他的這種影戲。郊外的清晨：一個美麗的少女打開百葉窗，在窗臺上灌花。在對面的窗口，有一個青年工人向她笑。這個工人就是羅爾夫，不過不久他卻娶了一個伯爵夫人，或者，他頂好是拒絕這個伯爵夫人，而和那個窮苦而忠實的少女結婚吧。呀，我既不是伯爵夫人又不是少女，我簡直不能想像得，我怎會和羅爾夫弄得關係如此密切。實際上，我還是等着瞧這張影片是怎樣的結局。

當我們分手的時候，羅爾夫告訴我，他有後天看戲的入場券。『二十號是你的假期；那天你可以在外面睡。』想告訴他我後天赴宴會的話，已經溜到口邊上了，然而我自己終於忍住了。

「這不關他的事，」娜塔沙說。

七月十八日

今天那個隊員出外休息——費瑪也是一樣。她臨走的時候，告訴我她新買了一雙羚羊皮的皮鞋；我自己的鞋子顯然是使她不安的原因。當她告訴我價錢的時候，竟使我吃驚得差點把別一根槓桿弄壞了；這樣一雙鞋子當屬於奢侈品一類，所以在蘇聯買價錢是挺貴的，雖然買這種鞋子的就不一定算作上流社會一類的人，人們確沒有買牠們的必要。可是，瓦利亞告訴我，費瑪的母親也正是愛打扮自己；她的父親在我們的工場做了三十二年的工，現在是領得一筆十分可觀的養老金，其中的大部分都用作他的妻女做衣服穿。

爲替代我們的老人，我們這兒來了一位叫做巴拉洛夫的工頭，他有一頭淡黃色的頭髮，他的無表情的藍眼睛和單調的聲音令我想起一位鄉下的牧師的樣子。他走路緩慢，拖着步子似的，決不像我們的老頭子那樣和藹，慇懃。當老頭兒來察看機器的時候，雖然他自以爲有優先權似的，他

卻還和我談談天。

例如；他告訴我，我一定要時常擦光腳下槓桿的內部，並叫我看別部機器的樣子。這事情不容易做呀；你得用左手緊握着槓桿，同時你要用右手繼續在旋迴的擦光機下面推動機構。假如戴帽子的有美麗的頭髮的那人沒有跑來，而且叫道『你在那兒幹嗎？那不是女人能做的工作！』我仍然是繼續做的。所以，我忽然覺得簡直疲倦透了。

『太疲倦了呀，同志；這不是女人做得來的工作！』當巴拉洛夫又走來的時候，我對他這樣說，因此他噤哩古魯了什麼，很快就見了，如是使我了解，我感到疲倦的時候，我可以休息一下。不用說，他太懶，不來修理我的機器——在這方面，是恰像那老頭兒一樣的壞。

弄這部機器，事情可真麻煩。牠的工作，包括有三個單獨的構成部分：只要鑽的手槓桿；一定要鑽，排列和擦油的腳槓桿，和圓柱。這三個單獨的部份都需要牠自身的機構；在以前用過的一個機構一拿下來了的時候，在工作檯上別架準備工作的機構就得馬上用螺旋扭進去。

這是極其精疲力竭的工作，所以那老頭兒總想把東西都弄得熨貼，致使輪到下次的時候不

至弄壞機件。巴拉洛夫的確不愧爲他的繼任者，我奇怪，對於這種進行手續，是否我應該寫點意見投到壁報上去。這樣做不過是怠工而已，縱使犯罪者自身並沒覺察到。不過我常常對那老頭兒發生憐惜之感，尤其是我不能斷定，娜泰芽和別人是否注意到他這種困難。

我結論以爲最好是對那班在革命以前的工廠爲幾十年苦役弄得精疲力竭的，老頭兒容忍些。事實上也是沒有足夠的新手替代他們；此外，無論怎樣，突擊隊員所取的步調畢竟是會加速度的趕上那班慢吞吞的工人的，優秀的工作是我們一件光榮的事。

正四點，一分都不差，約瑟夫·芬克爾斯坦來了。我們動身到少年先鋒隊俱樂部。

戴紅領結的少男少女在大廳內，講臺上坐着。約瑟夫引我上臺，並在會議上介紹我。孩子們開始拍手鼓掌；我站在那兒，不曉得怎麼好。我應不應該對我的聽衆鞠躬呢？

恰巧這時主席，一個十二歲上下，穿着一件不透風的短衫的女孩子，宣讀開會的議事日程：

(2) 工作報告。

(3) 外國同志講演資本主義國家內的兒童革命運動。

在主席警告一個叫麗娜的不要講話以後，就開始第一項的討論。那個書記對我低聲說道，「我希望你不要生我們的氣，同志，爲了把你的演說放在最後一項。可是大多數的兒童只是爲聽你的演說來的，假如我們讓你首先演說，我們怕他們聽完就走了。」

一個小女孩子起立發言。「我認爲，我們的母親底階級意識，必須加以嚴重的討論。上次，我們到一個集合農場去幫助翻掘園地的時候，就極其明顯地表現了這種缺點。每個人的母親都怕她的兒女會傷風的確，她們對男孩子們，不曾表示她們的懼怕……」

坐在前排的男孩子得意洋洋地跳了起來。「因爲我們不注意到這點！」
從女孩子們那邊發出一片抗議聲：「不對！胡說這是中產階級的偏見！沒有人把任何事情信託在我們手裏！」

『不要說話！』主席搖鈴。

那發言人又繼續說下去：『里拉的母親哭了，她說，里拉的身體太弱，不適宜參加農業的工作。』

『我的母親也哭了，』後面的一個男孩子叫着，『可是我的父親嚴厲對付她。在我們的工場中，我的父親是一個最強壯的人。』你這粗笨的母鵝，』他對她說，『今日的兒童應該過着一種不同的生活，這話我該向你說過多久呢？』全堂哄然大笑。

『靜一點！』主席開始擊着桌子。『誰要發言，都得徵求我的許可。』莎夏，你講完了嗎？現在請同志 莫依諾華發言。』

同志 莎莫依諾華是一個十七歲的青年團員，她是少年先鋒隊的領導者；孩子們看待她就像看待一個斑白老者似的。今天，她告訴他們，每個願受感化的人一定要在他自己的人格上做工夫。然而，先鋒隊的行爲是怎樣的呢？在上次慶祝會的時候，米霞從臺上跑到臺下的嚷着：『喂，你們還等着什麼熄燈呀！』這簡直缺乏紀律！對父母是這樣壞的榜樣！

議事日程的第二項仍然辯論得很起勁。少年先鋒隊在幼稚園的教導工作一致認爲失敗。同

志莎莫依諾華報告一件最近傳到她的耳朵裏面的事情。許多兒童曾公認他們自己爲突擊隊員，這意思就是說，像所有其他的突擊隊員一樣，他們想做大家的好榜樣。他們時常在飯前洗手，飯後睡覺，不做聲地睡覺。可是別的孩子們對他們說：『如果你是突擊隊隊員，我們一定要給你一下突擊！』被別個孩子打傷的兩個男孩子，於是要脫離突擊隊。這是誰的錯呢？不消說，這是司管理之責的先鋒隊的過錯，因爲他忽視了，在「突擊隊」真正的字義上，充分地教導兒童。

最後輪到「另一件工作」，卽，我自己的。在舉行討論之後，我覺得，我自己對兒童說的話是失色而無生氣的，不過在俄國對外國的事情的興味竟是這樣濃厚，只要能講點邊境的生活情形，常是的確受到熱烈的歡迎。兒童和成人一樣，都想要曉得那同樣的事情……

當我講完的時候，孩子們問了我許多問題，有些是我所不能回答的。在會議結束以後，孩子們送我一條領結和一分他們的新聞紙先鋒真理 (Pionierskaya Pravda)。在電車上，我把這張報紙打開，讀到烏拉的拍爾姆造船所和第九學校訂立一種協定，兩工廠協同如下：

究室。

(1) 募集一萬三千盧布在學校設立木匠和鎖匠的工場，另募一萬盧布建造實驗室和研

(2) 供給學校教師。

(3) 由高級班選出八十個學生至造船所實習，並派定其他學生到工廠學校讀書。

(4) 准許五個兒童至海濱休息。

在合同下面寫着：『我們要百分之百地實行我們的契約。造船所代表人，伊凡諾夫簽字。』

七月十九日

今天晚上，我準備和羅爾夫一道去看戲。我想洗一個痛快的澡，和有梳洗打扮的機會，致使我能特別享受布爾喬亞生活的愉快，不過我覺得，如果我因此而不做工，良心上卻說不過去。我的潛在意識的自己使我起身太遲而打消了那種想頭；當我今天下廚房的時候，我知道已經是八點過

一刻。

我的臉上顯得驚惶，不過內心卻暗暗歡喜。唯一使我不安的事情，就是瓦利亞，娜泰芽和別人的煩惱的臉色。

我跑到洗澡間。這兒有各種的浴盆，不過大多數的人情願在大房間沐浴（自然，男女是分開的，）那兒都裝有冷熱水管。這兒也有一個熱水雨淋浴間，不過常爲一羣兒童包圍着。

有一個裸體女人坐在長椅上，喂小孩子的奶；看來她恰像某種動物的母親。我注意到，除了女人以外，沒有人在頸上戴着那爲正教會信徒所必須的十字。反宗教宣傳已經在人民心目中深深地植根了。

我在理髮店裏等了很久，但在蘇聯你必得要習慣這種等候。列寧格勒和莫斯科的理髮店的設備有如維也納和柏林一樣的多，理髮師從上午八點到下午九點分做兩班輪流不歇地工作，但還是供不應求。爲我理髮的女子告訴我，她是有規定的工錢，因此每天她得剪一定數目的頭；要超過額定的數目她就可以得到額外的工錢，是以每月可以賺得一筆十分可觀的數目。當她剪定我

的頭髮的時候，我把小帳塞在她的白罩衫的袋子裏，這樣誰知即刻就被罵了她跟我進外套室，把我的錢送還我。

『下次確不要再做這樁事！』她以母親似的嚴厲對我責罵着說。

在蘇聯是禁止給小帳的，不過火車站的脚夫，雖有警告旅客禁給小帳的通告，他們決不守着他們的固定運費的規章。我記得，在巴庫車站的我們的美尼亞的脚夫的辱罵，當羅爾夫拒絕給他小帳的時候。『什麼！你還虧自己自命是一個外國人！』他叫了起來。『多麼可恥！』

當我回到我們的公共住宅來的時候，維那鬱悶地搖着頭，催我趕快到工廠去，因為遲到者在中午休息期間可以准許入內。因為以前我曾有一次缺席，沒有請假，她怕我會發生麻煩。

可是我洗了澡以後再跑去做工——是不可能的！此外，明天是我的假期，而且因為要到後天下午四時我們纔開始做工的原故，到那時他們會把我缺席的事情忘了的。所以我穿上我的絲織的衣服，面着女子穿衣鏡前，欣賞我的豐度的一會兒。

隨後，我到週遊世界的編輯部去，在那兒我聽說，我的小說王林琪將軍的光臨已經付印了。我

已預支了稿費一百盧布，因為這篇小說有二十面長，所以還有七十五盧布可拿。這一筆稿費總數相等於最熟練的突擊隊隊員的一個月的工錢，自然還不能和領班的工錢相比。

這篇小說是取耶拿做背景，牠的主題是表明，當學生們聽說卡蒲事件（Kapp Putsch，有名的德政府屠殺工人羣衆的事件——譯者）的英雄，王林琪將軍預備參觀他們的大學的時候，在學生中間所造成的印象。納茲的學生們要對這位將軍舉行盛大的歡迎會，然而康民利司特的學生們卻和蔡斯玻璃工廠的青年工人們聯合起來組織一種反對的示威運動，而社會主義者們卻輕視這一事件，要求每個人保持鎮靜。可是，一般的空氣變得有如戰時似的緊張，可是在最後一刻，這位將軍終於打消了他的來意。

編輯者認為，使這位將軍忽然取消此舉，這是我的聰明的手法，不過他卻認為我這樣結束是可惜的，因為他情願這故事用鬭爭做結束。他問及我會否寫過取失業做題材的東西，因此從我的短篇小說集抽出一篇給他，以一個失業工人自殺為結束的一篇小說。他不歡喜那篇，問我是否我能够把結局修改，好使那工人變做一個革命者。我的答覆是，這與人物的個性不能完全符合一致。

的。不過他卻提議，我能不能把他改頭換面地描寫一下，因為俄國的讀者高興讀那關於敘述那班不承認失敗，並在各種中產階級的人們的人格上加以玷辱的普羅列塔利亞的小說。我答應了爲蘇聯的消費，來加強我的主人公的精神和人格。

我到羅爾夫的旅館太早了。因爲他未回，我在他的門下扔進一張紙條，就到音樂室來。這家旅館只有能照他們本國的行情付款的外國人光顧。當我到這兒的時候，我常有置身於蘇聯國內的一個資本家的小島上的感覺。門廳，門廳的侍者和公共的房間，看來的確像在西歐的設備一樣；旅客也是一樣的，不過他們覺得多帶一點疑問和狐疑的神情，因爲他們已經來到一個國家，照在他們本國所流行的故事說來，在這個國家裏面，俄國亦匪常在街上跑來跑去，衣服華麗的人們難免要受害的。羅爾夫對我說，有一個美國的太太帶她的女兒從斯德哥爾摩跑到俄國來，她隨身帶了爲寄居八日之用的罐頭食物，並親自關起房門燒飯，因爲她害怕布爾雪維克黨人會毒害她。

這旅館的樓下一間房子，有一家「陀爾吉新」(Torgsin) 托辣斯的支店，一律用金元的價碼售賣以前俄皇的各色的珍貴物品，諸如已故俄皇的刺有大「N」和「A」二字的錦褥，及飾

有俄皇簽字的天鵝絨的銀色的墨盒，以至各色大法師大主教的金色刺繡的宗教上的法衣。這些東西可真還有人買——最多的是美國人。

穿着短褲子的兩個青年人進來了。有一個在鋼琴邊坐下在奏卡勒斯登曲，另一個在鄰近的大鋼琴上打着節拍，吐露黑人喧鬧急奏樂隊中所發的聲音——啞嗒聲和馬嘶似的聲音參合着。他們奏演的這種蠻性的無拘束的力量簡直要壓服一切似的。

於是羅爾夫進來了。他的那種得意洋洋的態度，簡直不能使我要他坐下來聽音樂。帶着愉快的臉色，他告訴我，他已經從赫星法斯買了一架烤麵包的電氣機。

我們走進他的房子，在那兒他把燒咖啡的水燉上去，並把麵包切成薄片。他今天把綠色的襯衫換了，穿上一件淡紫色的；當他俯視他的新機器的時候，電火的紅光映照在他的臉上。

當麵包烤好的時候，他就把牛油拿出來，我們就享受這種味美的熱烘烘的薄片麵包。在我們喝着咖啡的時候，他告訴我他在世界各國各次所享受的各色美菜的故事。在世界大戰當天爆發的日子，他在馬得里所吃的一個牛排，至今都保留到最親切的回憶——「本來就用不着塗色的

一塊牛排，』他這樣形容牠。在這種回憶裏，有一種極其憂鬱的語氣。

八點鐘開始表演。這劇本名叫懼怕，作者阿芬羅格洛夫，是一位青年的康民利斯特的戲劇家——這是一篇極富興趣的劇本，在這季排演過的劇本中公認牠是最出色的一本。演出的脚色多半是知識分子，他們在人類行為研究學院做工作的（這差不多是目下蘇維埃舞臺的慣例。）

鮑羅庭教授是該院的院長，他認為一切人類行為的主要的動機是懼怕。反對這種理論的是老布爾雪維克克拉拉，她能從自由運動和反革命派運動兩方面所表現的當中，引證許多不懼怕的例證。不久以前，在我們的壁報上，有人反面地批判克拉拉這種意見，認為她還不是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因為人類既不是因為懼怕又不是因為勇敢，而是因為經濟的顧慮而起來活動的。不過當她敘述一張在十月革命以後在沙皇后奧克蘭娜的公文袋中她所發現的帳單的時候，這確是很動人的一幕。

這帳單上開着把沙皇后的太子執死刑的費用。在莫斯科的革命博物館乃至在「前政治犯安息所」中，我曾看過這張同樣的帳單。

帶着顫抖的聲音，她一項一項的讀出：馬車費——兩個盧布，麻繩一條——五十個戈貝克，麻布袋一條——一個盧布。隨後她說道：『他們所以要把麻布袋子罩着他的頭，是因為劊子手怕看他的眼睛的原故。我們敢於正面对着我們的敵人的臉，因為我們正在爲着新世界而鬪爭！』

觀衆開始掌鼓。這位頭髮灰白的老婦人看來真像極了，簡直不能辨出她是一個女伶；事實上，她可說是蘇聯許多藝術家中最出色的一個，當你在這個國家裏面考慮演劇的高度標準的時候。還有一個出色的演員叫做娜達加，是少年先鋒，她令我想起了約瑟夫·芬克爾斯坦；當有一位教授不准她和別的兒童在他的研究院舉行人體解剖實驗的時候，她曾在她們的報紙上警告那教授。其他的脚色都是逐漸轉變爲布爾雪維克的動搖的知識份子，還有些是在最後的一幕露出真面目的惡棍和投機份子（這樣的人物幾乎在每個蘇維埃劇本中都可發見），還有讀死書的「高才生」和兩個女人，其一是一個美麗的玩物，而另一個卻是從工人階級產生的新的知識份子。

不過這劇本之主要的興味，卻是爲鮑羅庭教授對於懼怕的動機所提供的各種的例證。這些

例證的要點大概是關於無黨派的知識份子懼怕被人告發——公正或不公正地——爲怠工者，然而最奇怪的是他的表格中並沒有涉及經濟的懼怕，例如對於維持生活不可能的懼怕，明天會發生什麼事情的懼怕，失業的懼怕或對競爭者的懼怕，假如其他國也像蘇聯的演劇一樣，拋棄牠們的肉感主義，用牠們的御用的演劇藝術來討論大衆的日常生活問題的話，那麼以上所說的各種懼怕的例證各國是要首先引用的。

對於這位青年戲劇家可視爲有莫大的功績，因爲在某程度上，他曾釋明了在各種不同的環境之下所發生的懼怕的性質之心理學的問題。當社會主義的黃金時代來臨，而且沒有人會受政治的壓迫或經濟的需要的時候，懼怕的心理會整個兒消滅麼？或是還有一種在我們心中永遠完全不能鏟除的懼怕的形式——死的恐怖呢？不過，因爲我們覺得在臨終的時候，好像這世界還該欠我們許多債似的，而狠不願就離開牠死去吧。

在我們的舊世界中，目下的狀態是怎樣的呢？我們很少有機會儘量地發展我們的才能，我們的愛的力量，仍然是無用的，個人的幸福與創造工作的願望也就消失了。假如我們能够完成在我

們心中所渴望完成的一切事業，也許我們一定能更容易死去吧……我屈着身子。「羅爾夫，」我輕聲說道，「羅爾夫，你怕死嗎？」

他沒有答話。他睡着了。

七月二十日

一個人在他的休假日，老是要痛痛快快地睡一次早覺。所以我去敲裁縫的門的時候已敲過十一點鐘。因為那裁縫，兩星期前就把我的夏季衣服拿去做了。即使十月革命都無法矯正裁縫的習慣和風俗。這一個工作的部門大半還是手工業式的，因為這兒的國家縫衣工廠還是很少。

安娜·莫意塞葉芙娜很細心地把衣服由我頭上套下去，宛若這衣服不是換洗的衣服，而是像綢緞似的。她的鏡子，把我自己照成一種從頭到腳裹在藍白條紋的翅鞘裏面的條蟲似的。我不能掩飾我的驚異，因此她便解說，長衣服現在在外國很時髦，所以她認為外國人的我，應該照時樣打扮纔對。不過加一條寬緊皮帶，衣服就可以縮短的。

她動手把衣服拉勻整，當胸部前後扮成輕氣球似的東西時，這件衣服就顯得不很長。我求她把布帶子放鬆一點，因為束得太緊了，特別妨礙我的呼吸，可是她堅持她的道理，認為她要是照這樣做，這件衣服就不能「顯出上身的豐滿。」

晚上我去找娜達莎，她的丈夫還是老樣：釣魚。我們搭電車，隨後沿火車軌道走了兩站。天氣轉涼了，天空中現出一片爽朗的色澤，那卑溼的北部平原一片荒涼的現在我們的面前。今天我們用古老的傳統的燒酒消解牠的憂鬱；明朝呵，我們就要成爲將牠排水，將牠加肥料的新制度的要素。

這位藝術家的「鄉居」是一座木頭蓋的平房，只有兩個窗子透亮。我們走進一個農民的住宅；靠牆放着長木櫈，有一角放着一個大的農民的火爐，上面裝有能作寢牀之用的壁龕。在一張木桌上，有麵包，蕃薯和蘿蔔菜，出名的「甜醬」，凍肉羔，（麥酒用麵包調製的俄國飲料，）和伏特加。有幾個青年男女在室內站着或是坐着，他們穿着有寬皮帶的俄國罩衫，在他們中間，我看見了珂斯提亞，那位未成名的畫家。靠他那邊有一個帶着憂鬱的臉色的女郎——里由巴，娜達莎的妹妹。

我們的主婦，一位頭髮勻整而發光的，綠眼睛的太太，把我向別人介紹，其中有幾位我是知道

他們的名字和從前一樣，我受到熱烈的歡迎，足有五分鐘，我是被他們打聽着。從前，這種逼視會使我侷促不安的，可是現在，我纔了解，這種注意並不是專對着我個人，而是把我看成一個蘇聯之友的西歐人的代表之一。所以，我也用同樣一種非個人的態度接受他們的同情的表示。

一個短髮的美少年，獻給我們各一盤生菜和一杯伏特加。「讓我們大家全乾一杯吧，外國的女作家呀，」他說，「讓我們大家全乾一杯吧！」

「對的，不過我喝不來燒酒，」我抗議道。

「什麼！像這樣一小杯可真不算一回事！讓我們舉杯慶祝各國工人階級的團結吧。」

這樣一說我倒不好拒絕了。這種拒絕，簡直成爲對於俄國青年和各國工人階級兩方面絕不關心的表示。我們碰杯了。

伏特加在我心裏燒得很厲害。我就好像吞了火液似的。可是不久的以後，一種爽快的溫暖貫穿我的全身，牠的重量像是完全消失了似的。

有一個青年彈弄着二絃琴，一邊唱着；別的人也和着唱。這是我在各處都聽見一個無趣的歌，

事實上和歐洲的流行的小調的分別，只是牠的主題不是性愛主義而講的是家庭經濟。不過這種調子卻是一種愉快的，也許是從提雅爾傳來的吧。

這個美少年開始跳舞了。他像跳蚤似的在地板上舞蹈，以一種驚人的速度沿着他自己的圈子旋轉。隨後，娜達莎和他同舞；和許多胖女人一樣，她是一個溫雅的舞者；當別人打着拍子的時候，她用端方的寸步移向那少年的前面。隨後另外有一個黑色的阿美尼亞人，加進來，於是這種三部曲展開一種跳舞，在舞的時候，那新來者想從第一個舞者那裏把她帶出去；這三個人的舞術的完美，看來他們以前就像習過似的。於是，忽然音樂中止；娜達莎回到我這邊來，要一杯像肥皂色的檸檬水。

『那個阿美尼亞人正和國家出版託辣斯辦交涉，』她低聲對我說。『他訂了翻譯一本德文書的合同，可是工作得太懶，他就自己和一個第三者另訂譯書的合同，而那人卻幾乎完全不懂德文，把所有的他不懂得的實在名詞譯成人名。』結果弄成笑話。造船所的工人們談的是某位船

（註）按德文之所有實在名詞開頭一字均書大寫。

主先生，而警察局卻把賊先生引進來。」

有人唱一個新歌——配着愉快的音節，因為昔日憂鬱的空氣正在很快地消失着。第一節是：「我們共同讀馬克思，我的寶貝，可是我們一句也不懂；不要搖頭呀，兄弟！」第二節開始是：「我們戀愛藉無線電，我們結婚藉無線電，我們女兒的產生也藉無線電。」

這其間，珂斯提亞把里由巴拉到一個薄暗的角落裏，在那兒，他很親愛地吻了她的手，如果他的臉上沒有許多丘疹的話，那真的可以使人感動。這個阿美尼亞人坐在我的旁邊，開始講德國話。原來他在海岱培克研究過德國文學。他舉起一杯伏特加，把一隻手捫到他的心上，轉動着他的眼睛，高聲地朗誦道：

「你這出色的，古舊的海岱培克，

你這都會滿是榮光，

在納凱爾和萊茵，

沒有別的和你比得上！」

這樣，我忽然傷感起來。我一般地哀傷我的學生時代的消逝，認為是不會給我什麼的，沒有供給我的生活或職業，然而現在，在北方的昏夜中，在我醉酒以後，牠的圓光現出來了。我已看不見決鬪的學生們的臉上的創痕；我只看見海岱培克，這光榮的都會，在那兒我從沒有念過書。

「你也寫在我的心上了，

像一個訂婚的女郎。」

這個阿美尼亞人高聲歌唱着，這歌聲的魔力逐漸濃烈起來。我陡然懷念起故鄉海岱培克來了；我要離開……離開這些不了解我的人呵。

我把酒杯擲掉，站在一把交椅上，爬到火爐上去。火爐裏面熊熊地發光；一種和愛的溫暖侵襲着我……

「Ich reit ins Neckartal」從下面嚮着這種聲音，可是以下的歌聲我卻聽不清楚了……

「她受審判了，她得救了！」我吃吃地說。是的，現在，那上面的引文是從什麼地方引來的呢？

我自己做的詩嗎？是的，的確一定是我做的，是因爲我沒得救嗎？那是多麼美麗呵……你這出色的，古舊的海岱培克……

那短頭髮的美男子突然緊靠着我。「同志，外國女作家，」他低語道，「請原諒我打擾你，因爲我有一件重大的事問你。能不能請你告訴我，奧大利有些什麼出口貨？」

我坐下來，努力聚精會神的想。「皮貨和編織物，我想是這兩樣，」我終於說了。「是的，的確是編織品——維也納的時樣呵，你該知道那些維也納的時樣是够多麼漂亮呵！卽在海岱培克都不能趕上這些貨物。你只要把皮貨拿起來一摸，牠是多麼柔軟，暖和呵……那是寫在你的心上了——像一個訂婚的女郎……」那美少年帶着一副苦惱的臉色坐在那兒。「呵，這班外國人，」他喃喃地說。「他們到這兒來；我們供養他們，並把我們所得到的最完善的東西給他們看，誰知道他們全是中產階級，是的，中產階級俗物！他們決不能放棄資本主義！」

自從發現這種不快樂的事情以後，他懷喪地爬下來。由下面，我似乎聽見了二絃琴的琴聲和那首快樂的傳之歌：

「起初我說，『你多討厭！』」

可是現在我卻愛這工廠，

一切是爲了我們所燒的磚，

和工廠的愉快的老屋。」

「我愛我的工廠不會長久的，」我想，當我對海岱培克發生懷鄉病的時候，不待說，我同時想起我的蒲提洛府工廠……在納凱爾和萊茵，沒有別的和牠們比得上……我們輸出的不是編織品，而是耕種機……即使福特本人也是我們的一個僱客……不過我沒有把那根槓桿特別安頓好……我恐怕牠會破裂……爲什麼鮑羅庭教授不把弄破一根槓桿的恐懼心開在他的單子上呢……在日耳曼和美利堅，沒有別的和我們的耕種機比得上……我的眼睛流着淚……不只是伏特加的淚滴……於是我恰在這時睡着了。

我醒來的時候，已經是白天了；太陽的光線反映在鏡子裏，照耀着木頭的板壁。我們的主婦和別一個女孩睡在一張寬檯上；阿斯提亞和那個阿美尼亞人睡在地板上，用大衣當作毯子蓋。

那個阿美尼亞人已經醒來了。他過我這邊來。「你完全頭腦不清了，」他說道。「只喝了一杯伏特加就弄得糊裏糊塗了。我們以後還開了留聲機跳舞呢，可是你一點都沒有聽到！」

我懷喪得狠。我本來得到參加俄國祕密節宴會的機會，可是我卻把機會睡掉了。難道他們只是跳舞嗎？那種醉吻，酒瓶，互相碰頭的酒客，刀子和歐洲音樂廳常常用作證明斯拉夫民族的魅力的奏演的副樂器到那兒去了呢？隨後，我纔注意到，娜達莎、里由巴和那美少年都失蹤了。

「娜達莎，她的妹妹和在同一工廠做工的兩個男子，搭最後一班火車走了，」宛若猜透我的思想似的，那個阿美尼亞人這樣的解說。「你要洗澡嗎？穿過左邊門，走進廚房裏就是。」我不能等我的主婦醒來，就惺忪似地向車站走去。

七月二十一日

當我在工廠看見瓦利亞的時候，我不敢做聲。因為前天偷懶沒做工，她會責罵我的吧？可是她自己似乎有心事的樣子；她的臉色現着版版的，不愉快的樣子。臉上的笑窩全都消失了。

「想想吧，我的男人挪用了一點錢！」她說。「這錢一定要趕快還不可。我給他五十盧布，餘下的他還要借！」

五十盧布呢！她半個月的工錢！只要曉得那首舊俄羅斯的歌裏的一句話：「女人常是這樣蠢」的人，就毋須加別的註解了。

近中午的時候，我的槓桿用完了，冶金部又沒有槓桿——也沒有圓柱子送來，現在我沒有什麼工作做。這樣的情形常會發生的；在這樣的場合，你從監工那兒領得一張「暫停」的票子，你就把牠和你做的工作件數的結單一道投到報告箱裏去，那麼就根據你的工作件數和不做工的時間的平均數，領取工錢。

有時，在你「停工」的時間中也會派做別的工作。這次，隊長把我領到一個農女跟前。她正在用小輪子的手銼子工作，那是一個在管理近邊的機器的年長的女工借給她的。我由貯藏室領了一把銼刀，開始工作。

我立即知道瑪爾法是農女。她的臉部帶着感覺魯鈍的表情，爲那班沒有時間思想的參加笨

重的賣氣力的工作的人們所共有的一種表情。唉，不是，我說錯了；瑪爾法能够思想！『不要太快，』她警告我，隨後加以解釋：『這不是記件的工作；我們剛一做完，就有許多事情推到你面前做。』

『然而，我們是爲你們農民製造耕種機的呀，』我說。

『不是爲的我們。』她搖頭。『我們是耕自己的田。』

『你爲什麼不加入集合農場呢？』我追問她。

她把髮帶重結了一下。『我們爲什麼不加入嗎？爲什麼我的馬要替買克·珂斯諾夫耕田呢？』我聽她說，只有耕牛耕馬和農具是集體農場的共有的財產；家禽，母牛和仔牛都歸牠們原來的領主。使她討論這件事是困難的，因爲她只是對目前的事情感興趣。她告訴我，她來這城裏是賺錢，另外沒有什麼發現，於是我所得的印象，只是覺得她和我談話，爲的是擔擱時間。

有一個青年團員從老耕種機器廠一直跑來，徵求瑪爾法參加民衆識字班。

『唉，我並不是說我不願參加，』是她的答話。

『那麼，我馬上記下你的名字了，』他說。

「幹嗎要這樣快？」她抗議。「時間够多着呢。」

「那麼，你爲什麼要拖延呢？」那個青年團員問。「你要讀書寫字越快，你就越多得益處。」

「是的，當然這是一件有益的事情。」瑪爾法冷淡地點頭。「不過幹嗎要這樣快呢？」愉快的
人，他自己就會糊塗的，」聰明人常常這樣告訴我們。「青年團員只得像忍痛似的跑開了。」

「活到三十三歲，我不預備動手學習什麼了，」她告訴我，聳着肩膀。「假如我還沒讀書，那麼
現在來讀也遲了。我的頭腦對讀書的事情已經太不够活潑了。」

她立起來，向盥洗室走去，在我們的和其他的工廠，牠往往是工作偷懶者底逃避處。或者政府
會找出辦法限制我們上廁所的時間吧；那時外國報紙又要大聲疾呼，說蘇聯又恢復資本主義了。

七月二十二日

正對着冬宮，在尼瓦河遠遠的邊沿上，望見沙皇專制主義的堡寨，那聖彼得和聖保羅礮臺，上
面的槍矛放出閃灼的光芒。在河的這一邊，有一條用花岡石鋪的堤防，牠一直接到那上流社會出

沒的皇宮，在昔日，你到這兒可以看見制服，皮裘，花邊，馬車，侍從和飾着華麗的鞍具的純種馬。這堤防是流血之地；這裏，鄰近卡則林運河，一顆炸彈把亞力山大二世埋葬了，那兒內務部長布列爾夫被殺，這兒殺死了伊格納蒂葉夫伯爵。在冬宮前面的廣場上，政府當局曾企圖用牠的士兵們的來福槍在血的禮拜日來壓迫徒手的民衆的不滿，每當認為和郊外斷絕交通並封閉革命的高焰有必要的時候，這條橫跨尼瓦河的黑橋就慢慢地吊起來了。這兒由喀琅斯塔得開來的巡洋艦「與洛拉」號駛到了——就碰的一聲，一顆礮彈宣佈了列寧格勒的誕生！聖彼得和聖保羅的礮臺陷落了；佔領冬宮的叛軍逃跑了；當城門打開的時候，怕人的監獄已一變而為博物館了……一個尋常的公共的博物館……過橋去，向礮臺門的路上，是俄羅斯一切犧牲者的墓地。他們從禁錮的先驅者——死難的先驅者——的百葉窗裏窺視着便與世界永別了。因為據說人一進礮臺，沒有人會生還的。

門口懸着一個紀念牌；這兒，在一千八百二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五個十二月黨人被處絞決，他們都是中產階級革命的先驅者。劊子手很笨，他經手殺的三個人，第一次還不曾絞死。塞琪·華

拉維奧夫的腿截斷了，還能夠說：『可憐的俄羅斯呵！他們甚至不能一氣絞死我們呢！』離此處五十步，軍官杜蒲洛文，因在軍隊裏面宣傳社會主義，被處絞刑。

政府對那班企圖把牠的支柱——軍隊——革命化的人們，往往處以極刑。杜蒲洛文的聯隊被迫去目擊他上絞臺；當他上絞臺的時候，這位悲憤的殉難者，四月來殘酷的監禁已把他的神經撕成碎片了，但他還有力量對士兵們叫道，『我的孩子們，我是爲你們而死的！』於是這一連士兵一齊同時對他們的官長舉槍表示最後的敬意，他的死是被認爲對他們的一種可怕的警告的。

過去幾步路遠，我們走到舊聖彼得堡最真實的遺跡之一——聖彼得和聖保羅大禮拜堂，俄國的統治者就埋葬在那兒。這兒有一個青年侍者看守尼古拉一世的皇后亞力山特娜的棺材，當人民經過和沙后告別的時候，在她生時，他們是決不准行近的，並且不准觀望她的金色的皇冠和鑲着銀鼠皮的紫色的斗篷。這孩子注意到，棺材蓋上的皇冠是木頭和紙片做成的，所謂斗篷不過用的是粗緞子，銀鼠皮不過是白布上面繡松鼠尾巴而已。

這侍役以爲在獄中焦急的男女囚犯距禮拜堂僅數碼之隔，而且奇怪着當大砲向已故的沙

后示最後的敬意的時候，他們的心靈是否會很快地鼓動起來——也許，也許這是革命——自由吧，他們會這樣想。於是他對自己說道，『誰知道有一天我會不會屬於他們呢？』

在一八七四年，這孩子被捕，被送至聖彼得和聖保羅礮臺。他的名字叫做克魯泡特金。

牢門是敞開的。在門口站着紅軍的兵士，不過裏面的一切仍然是和昔日一樣……這間應接室，是當年囚犯受搜查的地方，而且是第一次用第二單人稱稱呼，作為他們喪失一切人權的標幟。這裏是監獄的天井，那裏是洗澡間，在那裏獄警監視着囚犯們，並用微溫的水供給他們，藉以防止他們用滾水戕殺自己以避罪的可能。在這裏，在用鐵窗隔着的探訪者的室中，亞力山大·烏里雅諾夫，列甯的哥哥，在他被害的前夜，和他的母親宣告永別。從前原是沒有鐵欄桿隔着的，囚犯並不和他的親屬隔開的。可是有一天，民粹派塞利古柏的妻子，當她和他行吻別禮的時候，塞了一顆小丸藥到他的口中。這原來是一封信，寫在薄薄的捲煙紙上，並用錫箔包好；當她下次探望她的時候，塞利古柏又有一顆小丸藥帶給她。別的囚犯都仿照他的樣，不過要在警察的監視之下交換小丸藥是不容易的事，於是有一天，這事卒被發覺了。自此以後，鐵欄桿隔開了。

下監房的樓梯，四圍都高張着鐵絲網，以防止囚犯跳樓自盡；他們不准有自盡的痛快，因為他們被注定遭受監獄統治的虐待，和懶散，無聊及沈默的痛苦所實現的徐緩的死刑。當一個囚犯已定罪的時候，就不再准人探望他了，於是警察就從他那裏把他所有的全部東西諸如茶，糖，煙，肥皂，刷子和梳子——尤其是他之書，奪去了。唯一的留給他的關係，不過是他由敲牆的暗號藉以和他的同犯者通通款曲而已。儘管監獄官底嚴厲的看管，使得他的牢房的牆壁封密了，可是用以開窗子的牆外的石頭，卻是最好通電話的處所。

一個囚犯要這樣通話，就得靠着牆，用他的眼睛釘着門縫，手靠在他的背後。如果看守的臉在門洞裏出現的時候，他就向前走幾步，裝着在監房散步的樣子走上走下，因為敲牆是嚴格地禁止的運動的。被剝奪，監房的刑罰和其他的極刑都是偵察出來的結果，可是沒有一個人能防止這班囚犯，他們很敏捷地及時取得聯絡。克魯泡特金就是用這種敏捷的方法，把他論巴黎公社一書的內容傳遞給他的鄰人。當時，認為最不幸的是關在牢房五十五號，雖然那間房是要光亮些，比別間監視要鬆些，可是因為房間的兩邊是貯藏室，所以和同居的人完全是隔離的。維娜·非麗 (Vona

Figuer) 住過這間房有過一些時。

上面這些事實都是我們的指導對我們說的。於是我的思想追溯到那位我曾在莫斯科結識的，矮小的身體纖弱的老婦人。在一九〇六年正月的第二十五週紀念日，我出席電氣工人俱樂部；在演說臺上坐着革命元勳——多半是白髮蒼蒼的老男老女；在他們中間有幾個較年青的，有些是布爾雪維克，其他多半是無黨派的。有一個鬍鬚灰白的人立起來，告訴我們，在一八七八年，他如何謀得一個禁子的職位，為得幫助在獄的同志便於脫逃。一切都似乎有成功的豫兆，然而在最後，月亮——為許多詩人所歌詠的，——出賣了他們。『是的，那晚的月亮，月亮！』那老人用一種單調而沮喪的聲音複述着。

可是，靠近我坐着兩個現代的不浪漫的英雄。他們兩人都判受過八年到十年的「卡托爾加」(註)——是在二十世紀遭受的。其中一個，擔任科學院的職務，別一個(有鬍子的家長)是一個藥劑師。他笑着，問他的同伴這兒是否有酒館，宣說他現在餓死了。於是他不見了；十分鐘以後他酒

(註) Katorga, 徒刑。

氣滿面地走回來，並把一塊夾肉麵包和一個蘋果塞到我的手裏。

這其間，維娜·菲麗起來演說了。一陣熱烈的鼓掌聲歡迎着她。她行屈膝禮——是的，用她的兩手貼在胸前，行着屈膝禮——隨後她舉起一隻手，全堂充滿了死樣的寂靜。用小鳥似的聲音，她說了幾句慶祝和感謝的話；隨後她又說，因為她覺得疲倦，今天不能多說話……也許等到下次有機會。

歡呼和掌聲回答她；她又屈膝為禮，曳起她的裙子，謙遜地有禮地坐在她的椅子上坐下。她頭上圍了一條羊毛圍巾——像一個老農婦。「你歡喜認得她麼？」這藥劑師問我，不等到我答覆，他就急急走到她跟前。

「維娜·尼古拉葉芙娜，這兒有一位德國女作家，要問候你。」

「我很高興呀，」當她的手握着我的手的時候，維娜·菲麗轉着鳥兒似的聲音。

我告訴她，她的作品（註）怎樣受到國外的我們的歡迎。「是呀，」她笑道，她的眼睛閃着一個

（註）按維娜·菲麗曾以她的作品一個革命者的回憶聞名於世。

作家的驕傲的光輝，「我接到過許多從國外來的信。」我們交談了幾句話，重又握着手。

這個藥劑師當他爲我披大衣的時候，瞬着眼睛。「喂，你吻過那個聖骨嗎？」他問。這些英雄們一點淒惻的意識都沒有呢！

想想吧，那班像我們其餘的人一樣地能吃，能笑，能著書的男女，木頭似的坐幾多年的牢，和人間隔絕……坐在恐怖的炸裂神經的沈寂當中，這種靜寂容易構成奇離的幻覺，而使弱薄的犧牲者逼到瘋狂的地步！獄吏採取這許多豫防手段以防止他們自殺，原是不足奇怪的！

獄吏的手段不常能奏效。有一個叫做維特洛華的女學生，把洋燈裏的火油淋溼着她的身子，燒殺她自己在須里塞堡（都是監禁着判決無期徒刑的人們，）有兩個犯人找出別一種方法；他們攔管理員的耳光，其結果送交軍法處審判，執行死刑。

當我進工廠的時候，我的心激動着。這時將近四點鐘；左邊的入口擁擠着手中拿着藍色通行證的工人們，同時右邊的門口湧出剛放第一班工回家的人潮。我朝前走着，走過黨和工廠的執行委員會，走過國家出版託辣斯所設的讀報處，跨過蓬鬆的土堆和鐵軌，最後，我受到熱煤油的火焰

和機器的安靜的機聲的禮讚。我們繼續那班坐在牢房的人們所開發的工作。一部耕種機又一部耕種機，一個槓杆又一個槓杆，我們幫助他們創造新的世界；今天，工作於我的手覺得更容易做，鋼條有節奏地旋轉着，宛如牠在用金屬的聲音唱維娜·菲麗的伴侶，摩洛索夫在他二十五年的監禁時期中所製作的歌：

「儘管獄中的鐵欄堅強，

儘管寂靜的牆壁吐出灰黃，

儘管我在黃昏的幽暗裏，

天天，天天坐着凝望，

儘管長年的羈絆，

摧殘了精神和肉體的力量，

然而，堅拔的自由思想，

仍然使精神倔強。」

七月二十三日

我怎會這樣蠢呢，竟以為別人不會注意我缺席的事情！現在，會有什麼事情發生呢？

昨天我們這兒來了一個新實習生，從西伯利亞來的婦人。今天她來到我前面——實習生老是在中午休息期間在廠裏逛，因為直至我們完工以後他們才開始努力工作——忽然說道：『你不是靠做工吃飯的。』

我憤然地仰視着；她的聲音中含有侮蔑的意味。可是她繼續笑着說：『你知道，我覺得你像誰？就像是金屬工人查利·卓別麟似的。』

我當時只一笑置之。『或者你不是一個正式工人吧。』我說。她搖着頭。『不是，我進工廠，原只是為得到升高級學校的更好的機會。我的父親是一個藥劑師。在我們的國家裏面，工人的子弟有最優先的機會。』

她的聲音裏面含有非難之意，可是我卻漫不介意。我在鐵屑堆裏摸索標準尺；當我用棍子把

鐵屑掃開的時候，我照常奇異着那用以挖剪槓杆的鑽子的銀色的彈簧的美。

「你爲什麼不看管機器，而做實習生呢？」我問。「管機器有趣得多，你得的工錢也多些。」
她聳着肩膀。「太勝了！」

「你要習慣了這種工作是不會勝的。瞧，我們的青年團員加泰雅做起工來還是這樣美麗，乾淨。」我轉頭望加泰雅，於是她走向我面前來。她的眼睛含有懼怯的神情。

「聽呵，」她說，「在三星期中你有兩次沒上工，這事是真的嗎？小組要你的名字列在黑板上。」
列在黑板上呀！上工的每個人在那兒能够在怠工者和「五年計劃的破壞者」的表格上讀到我的名字呀！我不如不幹了，立即滾蛋。「我們告訴同志們，你會補那兩天的工。你豫備那樣做嗎？」

「是的，」我吃吃地說。「這樣做，我的名字就不會公布在黑板上嗎？」

「不會的，不會的。等一下，我和法里雅商量。這兒是沒有無故缺席的，只有腐化工人才會這樣做。」

「我以後決不踏班，不一定不！」

我充滿了同情和一種態度。當一個女工不能守工頭的重要的命令的時候，在別國的情形怎樣呢？如果他能辭退她，她走就是了；如果不辭退呢，她就得受嚴格的責罵。如果她是一個熟練的，不能更換的工人，那工頭就會切齒低聲罵道：「豬獯！」

我還記得，我們須要實行加緊工作的命令。集合農場等着要用耕種機，在蘇聯現在工人的缺乏，使得每個工人更其不能缺少的樣子。認爲自己屬於管理人的加泰雅，法里雅和別的人都覺得，每個個別的工人都負有嚴重的責任。她們從不會想到，「豬獯！」這句話。她們是按照團結的原則看待我。我從沒有這樣意識到一種連索把我們以及工廠聯絡在一起——這是一條要比人與人之間庸俗的聯絡還更堅強，還更幸福的連索，因爲死亡或分離都不足破壞得了牠。

瓦利亞浮着迷人的微笑，走到我面前來。我不知道，她是否已聽到這件事情。忽然她說了半句話就帶住，瞥視着我。

因爲前幾天很熱，所以我這些時大都是脫掉罩衫和裙子，繫一條圍裙做工。瓦利亞已經注意到我露出來的那件水紅色的綢襯衫。「綢的呢，」她低聲地說。

「在工廠裏，你果真是常穿綢緞衫嗎？」

「這都是很便宜的舊衣服，瓦利沙，我這樣解釋。

「我非常歡喜這一件。我說，當你離開此地，假如你把牠轉賣給我，你捨得麼？」

「什麼！賣給你麼？我還不敢當作禮物送給你呢，瓦利亞。這件襯衫有好幾個地方破了，鑲邊全都破了。」

「沒關係！我能把牠縫補好的。水紅色的綢料子！我要在我的男人來探望我的時候，穿上。」

大概，她準告訴了法里雅，因為當我到桌上取文書夾的時候，我看見法里雅斥責瓦利亞時的不豫之色。

「你沒認識你做了什麼事，提摩費葉瓦。」她說。會使她得到一種什麼印象，你想過嗎？你要她把我們看成叫化子嗎？」

「呵，那是不錯的；她是一個同志，」瓦利亞用她的理由辯護。「如果我們不能製造絲織品，這於我們並不是恥辱。」

「如果我們不能製造絲織品，我們就毋須穿綢衣服。我們應該是恥於乞討外國人的綢內衣的。我們必須保持我們的普羅列塔利亞的尊貴，提摩費葉瓦。」

剛在十二點鐘以前——我已經開始拭乾淨了我的機器——法里雅和夜班的青年隊長一道走來。

「我對同志們已經說過了，」她說。「你的機器是空着的；你能留在後面，上夜班做工。」

我倉皇失措起來。我豫備在我的休假日把沒上工的兩次補足，卻不準備接續的補着工——其中還得補一次疲倦的夜班！無論怎樣，七個半鐘頭一班於我是覺得够久了；因為要屈着身子，去檢那青年工人在磨穀機上面擲給我的槓杆，我的背感到酸痛，我需要睡覺。

「呵，我不能一次支持十五個鐘頭的工作；我簡直受不了！」我絕望地叫着。可是法里雅一眼也不霎着我。

「很好；下一次吧，」她讓步了。那隊長走過去，法里雅也離開了我。我要叫她回來——我自己覺得害羞——現在，這班女孩子們怎樣想到我呢？

七月二十四日

他們不很想到我；我不再是屬於他們的了。現在，他們認識到我不是進工廠幫忙的和學習的，只不過是滿足一種幻想而已。在他們的眼中看來，我是那班知識份子之一，把別人以生命、健康從我的工作視爲兒戲，當需要犧牲的時候，立刻就嚇得往後退了。這不是我的錯；生命於我常常是恩惠的。他們全都了解這點，他們對我素無宿怨——的確沒有，可是我真是不屬於他們的。

瓦利亞今天很忙。不待說，這就是她所以不和我消磨時日的理由。我這時是多麼高興，把我的綢襪衫當做一件禮物送給她呀，在中午休息期間，我或者能送給她。

我渴望着她來，可是我仍然是在等待着。當別人離開他們的機器的時候，我還是在弄槓杆。我的茶豫備在桌上，可是瓦利亞不在這兒。或者她是在裝配部看她的韃韃人吧？我等待着；今天在郊外舉行的會，我不打算去。工場裏悶熱得很；或者會有暴風雨。我頭痛，可是沒人問我爲什麼原故。沒人陪我去赴會。

蘇賓斯基走來，嘴裏嚼着夾肉麵包。他用他的慣常的友情的笑關切我。蘇賓斯基同志是非常懇勸的。當我揩拭我的機器，而不能找到一塊布的時候，有時他會拿一塊給我。他常常和我握手，問我的近況。即使今天，他還是很友愛的，雖然從他的開頭一句話，我已注意到，他一切都明白。

「這種工作於你很好吃力，不是麼？」他說。「我想是這樣。在你幼年的時候，你應該習慣體力工作。」

當然。這種工作於我是太吃力。我原來不是工人；他們爲我惋惜。這就是我最後的致命傷。

「我不能說，工作於我是太吃力。」我答道。「不過兩班連續在一起做，於我是太辛苦了。」

「當然，當然，我很了解這點。你受得起這許多磨難，這是很值得欽佩的。」

他從不告訴娜泰芽，她所做的突擊隊員的工作是值得欽佩的。在另一方面，她能誇獎我，因爲我不是屬於他們的。可是他再三推許，因爲他要說點使我振作的話。

「我在壁報上，讀到你的關於法西主義的論文。牠使我發生很大的興趣。你寫作的風格很生動；我敢必定，你極能勝任你自己的職業的。」親愛的老蘇賓斯基呀！他要使我理解，我還有點用處！

「你應該寫點關於法西主義的東西，蘇賓斯基同志，瓦利亞告訴我，你在波蘭受過五年的徒刑。」提起瓦利亞的名字我就腦痛，可是我很快地帶過去了。蘇賓斯基似乎喜歡把我的思想轉換到別的方面。

「是的，」他說，「這是一篇極有趣的故事——關於他們怎樣捕我的情形。他們釘梢我有一月之久，而我卻躲在鄰近的村子裏。隨後我聽說我的小女孩病了；我不能再躲下去，卒至跑回家去。八月的晚上是黑暗的，而且那邊的村子上並沒有許多人——我以為是最佔便宜的事。我沿小路潛行，我只有一次是穿過大路。於是我的蹩腳運到了。恰好在路口轉灣的時候，我劈頭撞見有兩個衛兵和我們一個農民。這晚之前，有人闖進他的農舍；警察查過了以後，他正要準備車馬把他們送回城去。如果他的狗不開始吠叫，那以後本來就不會發生什麼事情的。警察追踪着賊——然而他們卻把我找着了。我是他們真正所欲得之物。他們把我捉到的時候是那樣高興，立刻就打落了我三個牙齒；在巡捕房的傢伙以後又把我的牙齒打落幾個。」

蘇賓斯基笑了，喝了一口茶。我吃驚地注視着他的無牙齒的口。

「是的，以後我聽說，我的小女兒並沒有病，」他繼續說道。「他們散佈這種謠言的目的，是想把我誘入陷阱。我居然中計，真够蠢了。」

「以後怎樣了呢，蘇賓斯基同志？」

「以後麼？呵，他們又把我還押，爲要強迫我供出來，每當他們盤問我的時候，總是打我。審判我以後，發表判決主文——五年徒刑。」

「以後呢？」

「以後——以後來了一段好運氣——得到極度的歡喜，因爲我聽說，要把我交換。他們並不立刻告訴我——首先讓我靜候了兩個月再說。當我們走進新的國家的時候，我們對待遇我們這樣殘酷的故國決別的情形，我是永遠忘記不掉的。我們的護衛兵把我們在波蘭邊境上丟下。當衛兵跳下火車的時候，就好像我們的鎖鍊從我們的身上落下。於是我懼怯——我擔心火車會爲某種理由忽然扣留了。以後火車急動了一下，開走了——我們永遠離開了波蘭的土地——不，不會永遠的——只要等到波蘭工人起來革命的時候。我們還要經過中立地帶。當火車捲過平原的時

候，我們的拳頭緊握着，望着窗外；我們覺得火車就好像幾乎沒有動一步似的，忽然牠走得慢了……我們的心幾乎炸裂着……現在我們在拱形門下經過，門上張有歡迎的標語。在門側——我們看見穿着長大衣的，軍帽上鑲有蘇維埃紅星的兵士。我們像狂人似的尖叫起來；有些人哭了起來，別的人用波蘭話對那些軍士叫着各種的話——祝賀和親睦的話。最後，我們有些人開始唱歌，不久我們全體加入合唱。士兵們站着靜聽，他們圓大的臉朝向我們，舉槍致敬——我們的聲音爲愉快所顫抖着。當我們唱完了第一節，我們就接唱第二節——唱這歌的時候，自始至終感到純粹的愉快，而用不着害怕有警察用他的咀罵和手槍來追逐着我們……當火車開動的時候，我們仍然在唱着——而且在涅哥勒洛依，俄國邊境的車站，有一隊工人用旗子和演說歡迎我們——有一班樂隊奏着歌——人們把我們舉起來，使每個人都可以看得見——這像是一個夢——從牢獄轉到自由！

蘇賓斯基把聲音降低了一點；在工場的什麼地方，有一部機器開始隆隆地響。這裏不只是我們兩人了；男人和女工漸漸圍集着我們，寂靜地站在那兒。在他們中間，我注意到了瓦利亞。人們的

臉全是輝煌的，宛若被火焰照耀着似的；大家全都覺得和蘇賓斯基及他的同志是一致的。

走向瓦利亞前面和她握手這件事，我覺得忽然容易起來了。「瓦利亞，」我說，「對於昨天的事不要生氣呵；我覺得我不能接着下一班做工。」

「你拒絕是沒有多大關係的，」瓦利亞答覆，堅決地，不過她沒有拉開她的手。「我們全都是繼續做兩班工，有時還連着做三班工——起初在我們剛製造耕種機，事情不很順手的時候。我們是要使我們自己適應生產，不是叫生產適應我們，你是知道的。」

她用第二人稱單數稱呼我。這意思就是說，我們重又是朋友了。

「在我腦筋裏面，這一切我全都明白，」我對她保證似的說，「不過一個人要剝掉舊皮，和集體的原則相適合，是很困難的。我們這班知識份子全都是個人主義者。」

「個人主義者是什麼意思呢？」瓦利亞問。

「這是很難於解釋的。他們是爲了一切實際的目的，認爲他們自己是宇宙的中心，對於他們自己的感情和思想有一種很妙的意見。」

「那麼他們能够滾開去了！我們決不能和這種人一同前進，然而你有普羅列塔利亞的感情，所以你決不會蹈他們這班人的覆轍。」

瓦利亞的笑窩又閃現出來了。我們動手做我們所敬重的工作了。這樣生活是愉快的。

七月二十五日

我專用我的休息日到學生會去。

大戰前的俄國學生在歐洲是一種著名的優秀份子，同時因為他的懶惰的習慣和革命的意見，他又成爲諷刺家的笑柄。當時的女學生——那個打破一切女性觀念的動物——那用同等的熱情蔑視馬甲和宗教結婚儀式的女學生，對於決鬪團的，腦筋裏面充滿了beer-horn的愉快和反猶太主義的男學生，也是一種被揶揄的對象。可是，她和她的長頭髮的，半捱餓的關滿在沙皇監獄的牢房中的男同志們，有什麼遭遇呢？

在「學生雜誌」的編輯部，我受到提摩清同志的歡迎。因為他是一個哲學家，他的圓滑和活

潑的氣質，我覺得和他所學的學科是最不適宜的。當他閱讀我的研究格林·巴夫的德國女學生這篇論文的時候，我觀察到他的假熱心的臉色，就決定他不能有形而上學的理解力。他以極度的興味研究德國的女學生和我們的大學的排猶太人的暴行，並且認為每個研究純粹哲學的人能立即找到職業，這是一件不足奇怪的事。據說高級學校和需要頭腦勞動者的機關都是直接發生關係的，當高級學校的學生一經畢業考試之後，立即把他們派送至各機關服務，這話在我聽來不免有若干驚異。這班學生有對職業充分選擇的機會；今年只有九十個候補者競爭三百七十五名職位缺額。這全不像是一個耽於安逸游惰的國家！

提摩清同志提議立刻帶我去參觀學校，牠設在從前是某富商的住宅的，寬敞幽靜的別墅裏面。首先，他領我參觀哲學室三十三號，那兒住有三個人，其一是李君，高麗人，由青年團小組派赴大學的一個初級小學教員，其一是彼得羅夫，他是一對不識字的馬車夫夫婦的兒子，現任這房子的房長，其一是文學科(Litak)的同志奧盧費力耶夫。在我們本國，這三人皆可簡單稱為「哲學學生」，不過在蘇聯卻還更專門化一點，別科的研究生和學生都是寄宿在和他們的公社隔開的單

獨的房子裏面。研究的科目和我們的排法完全不同；理論的原理係用實際的學科替代，俾和學生將來的職業相適合。

例如，文學科，分成三組，批評組、編輯組、創作組，後一組係爲在文學領域中已經工作過的人們而設。在這裏，他們可學到一個蘇聯作家爲使創作與大衆聯絡所必須的基礎知識；在文學科的學生的十五個必修科目中，有六個是屬於政治學和社會學的課程。只有百分之七十的工作是理論的；學生的其餘的時間是用在編輯部的工作，指導工人俱樂部或戲院的文學小組。學生決不是照我們的字義直解的「聽講者」，因爲講死書的事情取消了，代替的是討論和研究的實習。

以上的報告都是我們的文學科的同志，一個穿着俄國的罩衫的紅面頰的青年告訴我的。個個學生都保有一個活潑的，健康的臉孔；在姿容上，他們和青年工人沒有一點區別，這原是毫不足奇的，因爲他們全都是從工人隊伍中出身的。不過他們的房間看來卻很像知識份子的房間；在牆上，除掛有他們本科的出色的學者如黑格爾，笛德羅和費爾巴哈的像以外，還掛有歐洲，亞洲的地圖，和革命家的照片。書，到處都是書——在桌上，在書架上，在房角裏，並堆在地板上。這班學生領有

薪水，這些薪水除掉膳宿費的開銷以外還用不完，因為他們的家事是集體地經營的，而且他們是合作商店的會員，牠能以最低價錢供給他們的食物。衣服與其他的必需品，他們都是整批的購買。所以，他們的薪水多半用在買書和訂購大批報紙雜誌。除有列寧、馬克思和蒲力汗諾夫和哲學家（黑格爾和法蘭西唯物派佔着光榮的位置）的著作以外，我還看見他們搜集許多著作家和戲劇家如普希金、郭果里、托爾斯泰、莎士比亞、安唐、法郎士和哥德的著作——我還見有一本德文文法，因為外國文是文學科的必修科目之一。

他們研究的旨趣並不倚賴着他們的教授的一時的風尚，而是絕對地根據着辯證法唯物論的基礎，牠的正確有如二加二等於四一樣的無可懷疑。任何辨論僅限於分析和應用這種辯證法的唯物論的各種方法。從這立場出發，於是這班學生便着手搜集許多材料——政治經濟，社會學，歷史和哲學。他們不只是學習上述的講授的科目，而且潛心研究到問題的最深處。

第二間房係一對已婚的夫婦住所，因為已婚的學生有單獨住一間房的權利。第二十號房間住有兩個女子，一個醫生和一個生物學家；這個生物學家已經畢業，現充任助教職務。當院長助理

員告訴我她是一個很有希望的科學家的時候，她感到很怕羞似的。她在工廠做過五年的工；隨後由經理部派送工人專科學校，她在那兒預備升高級學校，由此升入大學。

她現在有三十歲。通常，蘇聯的學生的年齡要比我國的大學生年紀要大些，因為他們很少是直接由中學升上來的。有些是在工廠做工以後升學的，像我們的生物學家那樣，而其他的人或是在軍隊中服務或是參加過國內戰爭來的，像哲學科的同房的那些學生那樣。

奧爾加，這位生物學家，用手親熱地握着我，並請我吃晚餐。食物中有儘量吃的夾魚醬麵包，和咖啡，牛奶。這食堂的情形是怪有趣的；今天值班的同志從城裏買了一大袋手套來，不一會兒這些手套就不見了。有一個男學生帶着幾分譏刺的認為，女手套的品質是上等的，因為這個買手套的人是太太們的好朋友。可是，剛纔所說的這位男子，忽然感到沒人理他的痛苦，沈靜地吃着盤子裏的一大堆夾魚醬麵包。

隨後，這院長助理員又把我領回三十三號房間，他在那裏把他們的各種困難告訴我。他的訴苦永遠沒有改變；總是說一切都還不夠。他們沒有充分的高級學校以滿足農村的頭腦勞動者的

需要，並灌輸想要求知的人們的知識。在目前，在蘇聯約有五百所大學，還有二千所高級實業學校，總數大約有一百萬學生。

在俄羅斯，學校有如細菌似的生長，特別是在東方地區如此。例如，在赤塔，一年以前只有一所高級學校；現在卻有七所。從前從沒有設立學校的別的地方，現在卻有三所。『不過我們還只能招到請求入學者的很少的百分數，』我的指導者繼續說道，各個團體和工人學校派送到我們這兒來的，只有很少的部分。我們寧願揀取手工工人和他們的兒童，因為我們需要創造一個我們能信靠的知識階級。你知道，我們的工作受「破壞者」的阻礙是多麼的大……

他從容地停住說話，好讓我對於這點發表意見。他把事實告訴我，並給我作種種解釋，足有兩小時之久；用一個學校教師的耐心，他努力把我說服，使我深信布爾雪維克對於他們的學生正在實行一種正確的政策；他申述將來的前途，並結算已完成和尙未完成的工作。他豫先就駁斥我似乎會提出來的相反的論證。

他懷疑我是否正確地理解這一切的事情，我是否正在做着彭那特·伊斯特拉蒂第二，而忽

視了新世界的誕生，因為我的注意力是太集中於新世界誕生的痛苦了。我是願意誤解或曲解他告訴我的一切事情的人嗎？當我跨過邊境，並對那班居間調停俄國的事情的人們的見解提出反對的有力的論證的時候，我仍然算是朋友嗎？他並不想從我這裏要求廉價的讚揚的表示；他願意我對整個的事業，得到實際的了解。

『你知道嗎，同志，』我對他說，『依我的意見，於我最難了解的是什麼？那就是對於革命的辯證法，要獲得一個明白的概念呀。彭那特·伊斯特拉蒂，你現在正想着的那人——是的，你曾想到他，這點我並不怪你，不的確不——是一個過於仔細然而不能理解大體的人。可是在我們的工廠裏有一個女郎，一個叫做由加的年青的知識份子，她一生主要的願望是想到高級學校讀書，可是由於她的社會的身份，使她和學校絕緣。她覺得她的一生已經毀壞了。雖然我了解，奧爾加可以在這兒讀書而由加不能讀的原因——丟開一切的才能的鑑別不問，奧爾加將來更爲有用，因為她是大眾的女兒。她和大眾密切聯繫着，而且更深地曉得他們的需要。』

這個院長助理員微笑。『對了，我很高興你了解我們的策略，不過你也可以放心，這些個人的

不公平的事情，一當我們有了足夠的高級學校的時候，立刻就會消滅的。我們須要許多的工程師、醫生和教師，但不須要冬烘先生。我們一切的努力已集中到注意使學者不會和大衆脫離關係。從第一個學期開始，學生即着手實際的工作。我們派送文化突擊隊到農村去，當暑假期間，各學科都在各省實習……」

他說至半途停住了。他忽然覺得，我已經誤解了什麼東西。「你一定不要相信，」他接着說，「我們是沒有藝術和文學修養的野蠻人呀。你瞧我們所有的書吧。並告訴在德國的他們吧。」於此，他從桌上拿起一本書來，「你們的浮士德是我們所愛好的書籍之一種。」

浮士德這本書破舊得像是經過了苦讀似的。書頁上的空白寫滿了鉛筆的註解，而這兒那兒的每節詩下面都畫有線條。

「什麼？浮士德是你們愛讀的書嗎？」我叫了起來。「把這事告訴你的祖母吧！浮士德是中產階級的個人主義的英雄，他——因為，任怎樣說第一部的大部份——追求快樂和知識只是爲的滿足他的個人的願望和……」

這個學生笑了起來。「唉，是的，我們正如批判浮士德一樣的，批判我們所讀過的一切的書。可是你是知道列寧所說的話；我們必須攝取足夠爲我們的目的之用的一切舊的文化。馬克思利用舊的黑格爾，同時別派也引用黑格爾，以爲他們的理論辯護。」

「我亟欲知道，你能有用地從我們的浮士德裏面攝取些什麼東西。」他把用紅墨水圈出來的文字給我看：「首先就是事實！」隨後，翻過幾頁之後：

「我的朋友，你立刻就會消失一切的疑慮；

你不能不鎮定，你有生活的藝術！」

當我告別的時候，他們送我一種團體的禮物——列寧的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在這本書上，他們都簽了他們的名字，以爲我這次參觀的紀念。

七月二十六日

在沒上晚班以前，我到我們的工廠的花園散步。這花園並不特別大，不過修飾得還好；那兒有

幾個美麗的花臺，並從冬宮移來了幾個華美的棚架。把一個有遮蓋的走廊佈置成一間讀書室，報紙和雜誌陳列在桌上，又可從圖書館管理員處拿書和圍棋。在這間讀書室內，在這班蒲提洛府工人中間，我注意到兩個穿着長大衣的士兵。

當天黑的時候，我走進工廠，並在鍛冶場訪問我們的鄰人。鍛工都很忙；兩個工人把吊桶浸入鎔爐的金屬的流汁中，並把桶裏的容量倒在做模型的東倒西歪的大桶裏去。忽然，這金屬發噝噝聲，雨般的火星四散地飛迸。有一塊火焰掉在我的腳上，我急忙躲開，同時那穿着特別工服的工人卻發出笑聲。

但是，他們有許多人，戴的遮眼罩，多半不戴在眼睛上，而掛在前額。他們認為他們如雨下的汗珠會模糊眼鏡，而妨礙他們的工作。我記得，在諾斯托府，農業器具製造廠的工人們有同樣的埋怨，只希望莫斯科的工人安全設備學院能介紹一種「不為汗模糊」的眼鏡，來迅速解決這個問題。我奇怪着，鍛工的人們對着鎔爐的強烈的閃光一點兒不感覺難受。

我走進盥洗室，躺在平臺上，這平臺似乎是供給想要在這兒休息的人們的方便，可是因為在

一個角落裏，有三個女人的喋喋聲，使我不能睡覺。有一個在講合作社的女店員的壞話，而另一個卻在埋怨她的婆。

「因此我對他說，「把我的故事講給你的母親聽，你以為是合禮的嗎？」他是黨內的一個優秀份子！」

「隨後我就對她說，「當我知道在你的生日你做了一個為十二個人用的糕餅的時候，你為什麼不想告訴我說牛油全部賣出去了呢！」這是你的官僚習氣！」

「所以我就對他說，「你以為我會阻止你的母親，把我和彼阿特·伊凡立支去看電影的事告訴給別人聽嗎？即使我和他去看了最新的美國電影的話，得了，這又有什麼害處呢？」

「於是我又對她說，「當一個人能把盤子上的牛油洗掉，而另一人只能打着他的空肚子的时候，那什麼事都完了！」一個沒有正義觀念的，為她自己烘糕餅的人，像這樣的一個人，我敢說，不是合式的商店助手。她是不够資格的我說，而且是一個破壞者，假如你要得到明顯的真理！」

「於是我又對他說……」

這差不多是十二點鐘的時候。進盥洗室的女人逐漸多了起來。許多塊肥皂都拿起來了，所有的水龍頭都轉開了。當她們的臉浸在冷水中的時候，這班女工們嘩拉嘩拉笑着，哼着。有許多人洗得很快；住在郊外的，她們要趕晚班火車。可是現在是輪到我們工作的時候；我打呵欠，從平臺走下來。

「喂，你在外面過了夜麼？」一個年青的女郎嘲弄地對我叫着。這樣無恥的小娼婦！我沒有回答她！

當我經過貯藏室的時候，我看見用特大號字張貼的佈告：「亞力西夫！在二十三號，上第三班的時候，你睡了五個鐘頭！用突擊的工作，把那幾個偷懶的鐘點給還國家吧！」在這佈告下面，是一張通告，公佈在二十四號所舉行的同志法庭開審的判決全文，這是一個工人，因反猶太人的言論而遭控告的案件。這種同志法庭是處理公共的事務，裁判長是小組會內的會員，不過同志法庭這名字十分好聽，然而實在不是如此。牠們有權利處罰金，遇有最重大的案情，可迫令經理部開除被告。可是，我是不能想到，在我們中間會有排猶主義，因為在我們廠裏僅有的兩個猶太人是看管茶

爐和我們的工廠新聞的編輯。

第一次夜班，大概是最糟不過的，因為通常一個人在當天以前沒有睡到什麼覺。裝修部的芬麗加駕着她的小車子輾轉來收集我的槓桿，並問珂利亞是否請我加入到「第五日休息所」的彼得荷府旅行。「你一定要同去；我告訴他來看你做的事情，因為你對我是很表同情的。」當她站在那兒，一手抱滿着許多槓桿的時候，她笑了；隨後她坐上她的車子，就像在諾斯·羅邁斯的高貴的太太一樣的走了。

於是，從西伯利亞來的新實習生問我，她是否也能去，於是我求珂利亞把她的名字記下。她是一個十分漂亮的女郎，雖然有幾分做作。她的名字是歐占妮（Eugenie），不過她要我們叫她做由加（Eugie）而不叫貞利亞（Genia）。我深信她認為這個名字很有趣。

在這一班，瓦利亞是最沈默和深思的。在早晨的開頭幾點鐘，她來我面前低聲說道——「實際很可不必要的，因為機器的隆隆聲不能使別人聽到她的聲音：『做完工以後請求你，默幾分鐘。我要寫一封重要的信。』」

當我揩拭我的機器，用火油和肥皂水洗手，並點交我的件數的時候，瓦利亞拉我到打包箱後面，解釋這件困難事情。

「你知道，我的意大利男人不會來看我，因為我說過，他一定要穿外國衣服來會我。我起了一種念頭，想用他本國的話寫一封信給他。這可以給他起一種故國的感情，因為你是一個外國人……」

「對了，可是，瓦利亞，我差不多完全不懂得意大利文，只認得幾隻字！」

「那就很容易辦到。我們可以寫一封很短的信。要我念出來嗎？」我親愛的安唐利奧，你為什麼不來看我呢？在我上次三天休息日的時候，我徒然地等待着。當我說到你的衣服的時候，我不過是要試驗你的愛情……」

「我不能夠寫，瓦利亞。我不曉得「試驗」的意大利文怎樣寫，唉……等一下……我能不能把「試驗」改成「我只是開玩笑的」意思呢？「*Da scherzo*，」好不好？」

「隨你的便吧，「我只是開玩笑而已，並沒想到你會感到侮辱……」」

「感到侮辱」嗎？我覺得這倒雜了一點。改成「你會發氣」好不好？「發氣」是「Furioso」，「好的。」你會發氣吧。愛着你的瓦瓦拉·提摩費葉華。」你知道了嗎？」

「是的。假如你歡喜的話，你可以送他一個吻。我曉得寫意大利文的「接吻。」

「不說愛已經够了。得了，多麼感激你。我信封上寫到外國海員俱樂部。讓我們希望很快就可以得到回信。」

當我到達我們的公共住宅的時候，全房像死似的靜寂，這使我最愉快。嘩拉別的人已經做完工，現在都睡着了。斯珂羅巧特工廠已經開始了「不連續的夜班。」這就是說，每逢十天要補二天夜工。這樣我們的夜班纔能和別班啣接。

一點半以後，我躺下來，享受一種美滿的睡覺。

七月二十七日

在接着緊張的夜班而來的悠閑的日子，我喜歡在那一條把舊時的皇宮和潺潺的流水分隔

的尼瓦河花崗石堤上逡巡。那兒站着彼得，騎在馬背上的銅像，他的手伸直着，宛若保護他建立的城堡似的……彼得大帝，他「從上面」發動了一個把中世紀的俄國轉變為歐洲的國家的革命。在這樣的躑躅中，我身畔常帶着亞珂布·亞珂皮安的詩篇。數月之前，我允許了這個亞美尼亞詩人，把牠譯成德文。

我在第夫利司，時近四月底的一天遇見了他。我永遠不能忘記這次的會面。他的夫人叫我等一會兒，因為她的丈夫正沈酣於午飯之後的中覺，不過即刻就會下來的。不一會兒，他出來了，站在門口，他張開兩手歡迎着我。

我們曾在哈爾珂府的作家大會碰見過，在那兒一切的人和物都收在他的利眼裏。四十年前，他在工廠中的機聲隆隆中已聽到了將來到的革命的暴風雨，他在那兒每天做十四小時的工作，並用文字歌詠那時的生活——那時，除了霍普特曼以外，即使德國都沒有人在貧苦的生活中找到詩的題材，同時阿美尼亞的詩人們只能夠歌詠愛情、玫瑰和夜鶯。可是亞珂皮安卻不是局限他的活動到抒情方面的詩人，像其他的人們所做的那樣，因為他是一個有力的戰士，同時更是一位

偉大的詩人。當十月革命以後，沙皇祕密政治警察的（Okhrana）文件被發覺的時候，他的像片和別的一細照片也被發現了，在他的像片下面批有如下的字：『樣子特別：走路的步調很快。』

即使在悲慘的反動時代中，他的詩——『有如錘擊或雷鳴似的堅強』——表明了他走向光明的前途的迅速進展的表誌，而現在，在他的六十歲中，他整個的人格發散着權力，光明和不能動搖的樂觀主義。

他問及我們關於美國的革命運動，因此羅爾夫（他的慫恿的態度足夠壓制厭惡的心情）告訴他，那兒多數的康民利斯特都不是真正的美國人，而是僑居美國的猶太人。亞珂布·亞珂皮安朝我笑了一笑。『這些猶太人！』他說。『走到那裏，他們都是革命的先鋒隊！』

在他的書房裏，有一張列寧的肖像，上面有這位偉人親筆的簽名。『我是第一個寫過一首關於列寧的詩的人，』亞珂皮安得意地告訴我們。『這首詩發表於一九一八年；這以前從沒有人寫過這樣一首詩。』亞珂皮安的確很快地達到他的目的；遠自一九〇四年以後，他在黨裏面是列寧的同志。他們手攜手地鬪爭過，亞珂皮安從沒有動搖過……

他的夫人端進了一點點心——一些沙門魚和一聽粗粒的魚子醬。「吃呀，吃呀，」他催促我們，「如果我要，我可以再拿。政府把這些東西儘量供給我。」

亞珂布·亞珂皮安每月的養老金有三百盧布這是黨員薪水的最高額（即黨員所得月薪的最高數目），可是他還有一張坐電車火車的免費派司，每年還有一次休養金，這筆數目足供他在療養院住二月之用。他還有一所寬大的房子。

「下次你們到第夫利斯的時候，直接來看我好了，」他告訴我們。

那天晚上，他和我們在爲籌備慶祝五一節而裝潢的街上閒逛。一個賣花女郎來到他面前；他搜索着自己的口袋。「呵，親愛的，呵親愛的，」他喃喃地說，「我忘了把錢袋子帶在身上。你能借給我五個盧布嗎？我要替你買幾枝花。」

他提議同我們到大衛山玩，在那山上，你可以看見整個都市的美景，干河和遠山。這是會引起巴比塞那樣讚美的景色。

「巴比塞是多麼出色的人物呀！」亞珂皮安叫道。「來看我們的德國青年作家也是那樣呀！」

那次大會對於我是多麼歡快！我是這樣愉快，因為我親眼看到我過去所夢想和歌詠的！

當我手中拿着他的詩集，在尼瓦河畔的靠椅上坐下的時候，我想起了亞珂皮安的這些話。這是我在那兒的第三個下午，可是我還沒着手我的翻譯。的確我馬上就要補做夜工，而且我沒有睡足覺……然而亞珂皮安在他的青年時代還要做兩倍之久的的工作，同時還要寫出絕妙的詩歌。我手上拿着的這本詩篇，是紀念喬治·阿塔伯克的祝辭，喬治是參加傑卡並參加國內戰爭的亞美尼亞的飛機師。亞珂皮安把他比做瓦哈金，一個亞美尼亞所傳說的英雄，海上植物所生的人——紅髮的，赤眼的，他來到世界上是向惡魔與不公平鬪爭。這決不是一首傷悼的詩，因為當亞珂皮安哀悼死者的時候，他給了我們一種生命之頌揚。

明天我要到彼得荷府，舊時沙皇的皇宮去。我預備把這本詩一同帶去。也許我可以在那兒譯成。

七月三十一日

在火車站上，我們彼此沒有碰頭。我碰見的僅有的兩個人，其一是由加，還有管理磨光機的同志。後者，我幾乎不認識了，今天他穿了一襲漂亮的西服，打了一條領結和一個白硬領；如果瓦利亞要看見他的話，她一定要高興地看着他的外國的裝束。無論如何，這次旅行沒有我們廠裏的女工加入，因此，儘管這兒反正是遊玩，卻總不如我們遊台特斯可葉·塞羅那時有趣。

我們到遲了，所以未玩之前，還要去領乾淨的睡衣，鋪我們的牀。在台特斯可葉，這一切東西事先就為我們預備了。晚餐之後，這兒舉行一個音樂會，這次奏演了叔伯特的卽興詩和悲多汶的鳴奏曲；未演奏以前，報告者演說了作曲家和他們的時代。他告訴我們，叔伯特是德國人！

假如你稱呼烏克蘭人做「小俄羅斯人」的時候，他立刻就會臉紅，即使你叫蘇聯做俄羅斯，也有人對你抗議，因為他們覺得俄羅斯的音含有帝國主義的意味，他們很注重他們的「小民族」的獨立和文化的發展，甚至不避艱難地為他們的小民族發明不止二十六個字母。他們甚至也會用普通的拉丁字母來代替他們自己固有的斯拉夫字母，不過因為德文和奧文用的是相同的字母和特別統一的語言，所以俄國人很難分別這兩國人民之間的基本的差別。我們燒咖啡的不同，

而且——我敢誇口——比德國人燒得好的事實，在他覺得和五年計劃比較起來是無足輕重的，正如因缺乏真實的事情做，而使我們的生活中心闖入了千百椿瑣事一樣。

在擠滿了男女工人的會場中諦聽着悲多汶獻給一個美妙年青的伯爵夫人的，月夜抒情曲的琴聲，這種經歷是奇妙的。這音調帶着嚴肅的平靜向前波動——那種新磨光的鐵條的銀色的光芒散射在黑暗的海上。在帝國公園外面，銀條似的噴泉如刀光似的掠過，而戴着面網的特琪·嘉塞爾就像天方夜譚所寫的人物似的坐在那兒，在我們的下面，芬蘭灣閃着金屬的光芒——悲多汶的音樂，爲我們呈露着顯明的畫意是不足奇怪的。

「這正像在銀幕上一樣」這是芬麗加表示她的讚美的方式。她今晚對我親切地依戀着，不過她的精神是昂奮的，費了許多時間打趣珂里亞，因爲他即使在彼得荷府，他都不肯脫掉他那頂繡花帽。當我們三個遲到者從車站上到了，在公園內我們忽然遇見的時候，她跑上前來，並吻着我。不過，她決不能代替在我的愛情中的瓦利亞的位置。她是在蘇維埃治下長大的，而且是在那班意識到他們腳下的堅實土地的青年工人們的放任的生活中生長的，因爲她知道她的存在已經安

全了，自我發展的一切路徑敞開在她的面前。

但是，瓦利亞雖沒有青春的姿容，在她背後，卻有一個婦人所能消受的最艱苦的際遇。在她的年齡，她以一個女子跑進城裏來，找工作。那兒，她遇見了她的法國男人。正如瓦利亞拒絕送她的孩子到托兒所的情形一樣；在母親的贍養費缺乏和孤寡的母親們往往只有走入賈淫一途的時代，她仍不顧一切不得不遭受她的犧牲，剝奪和困難，把孩子帶在身邊教養着。她開頭幾年的鬪爭，是多末可怕呵！她從沒有把這些事情告訴我。

是她的孩子的父親招去當兵了嗎？還是他離家了呢？她只簡單地告訴我，革命分開了他們，當他們再遇見的時候，她發現他和別人結婚了。她從沒有告訴我別的事；她對她自己沒有什麼需要；她從沒有時間替她自己想辦法。

在翌日早晨九點半鐘，我們被領去玩賞風景。彼得荷府比台特斯可葉·塞羅更大，景緻也更好。我們看到許多的東西；由彼得大帝的避暑地，看到卡則林二世花園裏面一種學童們巧詐的把戲。當兩個朝臣在這花園坐下商量狡計的時候，噴池的水就會從他們後面射出來，弄得他們從頭

到脚一身淋溼的。這地方各處都裝有這種惡作劇的機關，當農民反叛打破了沙后的愉快的心情時候，這個玩意可以使她高興一下。

可是在十八世紀，帝皇的寶座還是很鞏固的時候，所以卡則林能够容許她自己有和法國的自由思想家，笛德羅和福祿特爾通信的自由。當她加緊俄國農奴的束縛的時候，其時她自認是這班偉人的弟子。

在這方面的涉獵中，尼古拉二世不只是在理論上耽溺於這種自由主義他的亞力山大力亞別墅（用已故的沙后的名字命名的），比台特斯可葉皇宮廣闊地顯露着過去的皇族家庭底低下的知識水平。在整個的房子裏面——這所房子所具備的中產階級的安適並不和堂皇的名字相符——這裏沒有一張有價值的圖畫或藝術品，足供玩賞者讚美領主的高尙的志趣和獨立的精神。這種傢具都是當時的典型的平常的東西，而彩飾和石印的品質都是便宜而劣等的。在石印品中，我看到一個女畫家的肖像，馬丹莎莫基督·沙塔珂夫斯卡亞，她是「黑色百人團」的醫員，在宮廷中會享有盛譽，常在那兒受到熱烈的款待。即使像片，念珠，和在皇帝皇娘和皇子的牀上掛

滿了的復活節的彩色蛋都是不值錢的東西。

可是皇宮的修理費每年卻需二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在一九一六年，僅彼得荷府一處已費去八九六、六〇〇盧布，雖然在整個的夏天，沙皇一次都沒去那兒！

在寫字間，放有彼得大帝的肖像——羅曼洛夫王朝的龍腳的模型——還有尼古拉一世，管理警政的沙皇，和亞力山大三世，他臨死的時候遺囑太子「要保全神聖的不能動搖的貴族政治的原理。」在這同一間房裏，最後一個沙皇簽字允准俄國立憲。這是在一九〇五年秋天宣佈的，可是這種宣佈是想從革命高潮挽救君主專制的一條詭計，人人都對牠不滿意，全國都聽見這一首敘述當時趣聞的著名歌曲：

「沙皇嚇得打顫

所以就寫了一通宣言：

死者可以准許自由，

生者卻會戰鬪，

所以還是把他們捉起來。」

不過，就是那麼一篇宣言尼古拉都覺得太示弱了。在那年十月十七日，他在日記上寫道：『災難的日子。尼古拉謝和史丹尼亞伴我午餐。韋特在那兒。在五點鐘，我在宣言上簽字。自這樣的一天以後，我的頭沉重起來，我的思想混亂起來。上帝，助我；使俄國安靜和平吧！』

爲迅速實現和平化俄國之上帝的任務，他頒佈討伐令到莫斯科和重申嚴密看守囚犯令到各個革命的地方。『上帝和軍隊是我們的護身符！』他寫給他的皇后的信上說。爲維持他和軍隊的密切關係，他用同樣的話語拍送賀電到各聯隊：『我於此表示我最由衷的感謝，』和『我敬祝我勇敢的軍隊的康健。』

御林軍受到特別的恩寵。一九〇六年七月舉行慶祝會有三天之久，對那次鎮壓莫斯科革命中心的紅蒲勒斯亞十二月暴動的屠殺表示慰勞。官吏與人民開張盛宴；那兒有音樂會，遊行和沙皇陛下的慈愛的演講。可是，當沙皇款待他的御林軍茶點的時候，克倫斯塔特的革命爆發了。海潮沖洗那些在沙皇別墅底下的海岸被殺了的海員的屍體……一種恐恫的預告……

在皇家軍隊中騷動立刻開始，更是使當局手忙腳亂了。士兵們送了一封請願書，要求立刻釋

放他們的被捕的同志們，廢除警務，……簽名的人們都被革職調遣到別的聯隊去，可是這一切手段——軟的硬的手段的混合——決不能生效力，因為反動的官吏前仆後繼地成爲那班「卑污的安那其主義者」的炸彈下的犧牲者。

尼古拉是深信了，那整個革命是少數思想錯誤的知識份子的事情，他們「挑動了他所愛的人民。」當他聽取了一個在南俄羅斯的屠殺猶太人的事件的報告的時候，他歡欣地搓着他的雙手說：「哼，到底那些猶太的煽動家，那些工程師，律師和所有其餘那些不值錢的傢伙，已經得到了他們該受的東西了。」但當那位沙后因別一個謀殺案感到了失望的時候，她寫信給他：「哦上帝，只要我們能够到底像普通的小康之家那樣過一種安靜的生活就好了。」

沙皇的對「那些卑污的安那其主義者」的憎惡，甚至在他的小兒子儲君的玩具裏面都找得到表示的，因爲在那沙皇太子的房間裏，我們看見了一個「箱中傑克」的玩具，用倍倍爾的人像造成的，又有一個音樂匣子，在那裏面一個小丑跟着馬賽曲的調子跳舞。

那餐室無疑地是一切皇室的居處中最講究的了。牠配置得像沙皇的心愛的游船「斯坦達

特」號裏的一個船艙一模一樣。尼古拉在厭倦了「披閱文件」（在日記裏面他常用這個詞語來代替國家大事的報告書）的時候，就常常躲避到這隻游船裏來的，因為在那兒他覺得自己很安全，不再被那些大臣們的煩惱的報告和那些刺客們的炸彈所攪擾了。因此他對於「斯坦達特」號的愛好，還可以拿船上拍照的許多片子來證明。這些照片是放在仿造救生帶的樣子的鏡框子裏面。

從餐室的窗子望出去，有一幅芬蘭海灣的風景片，那是被尼古拉愛得那樣利害的。那兒有一個故事，說有一次他坐得很久，如夢地凝視着水面，隨後便用一個深深的嘆息說了：

「呵，只要我能够把所有的革命黨沉下那兒就好了！」

離彼得河府站不遠就是沙皇的專車的最後停車地了，在那兒他簽定了他的退位書的。我們看過了那餐房，和寢睡和更衣等房間；沙后的長而白的衣服，仍然掛在她的衣櫥那裏。由加快活得拍起掌來了。「甚麼一種生活呵！甚麼一種生活呵！」她叫出來了。她開始使我生氣，因為她的聲音分明表示出，那沙皇政治的奢豪已經感染了她的熱望和一種醜羨了。

這些展覽品在芬妮加和其他少年黨員身上所造成的印象就非常不同了。他們停不住笑，在他們看見了拉斯蒲丁的照片和電報，並且讀了菲立潑那些信的時候。後者是一個自命不凡的法國人，要求能够幫助沙后，用他的超自然的法子替她建造一個儲君呢。同時在這兒珂里亞發見了一本書，名字叫做『我們的時代的受苦和不安的祕密』是某一個莫洛珂維茲夫人做的，她曾經因她那本烹調的書，『告青年主婦』造成了她的文名。

我們大家都在公園裏拍過了照片。沙皇的榜樣顯然地是有傳染性的。

在下午，我別了由加，到湖上躑躅。這是一個奇怪的日子；自有早晨的印象以後，我覺得一切都像暴風雨後的平靜。我想到可怕的黑暗正像夢魔似的壓住了俄羅斯爲要消除牠，須要多麼大的力量，勇氣，與最後勝利的信心呵，爲了牠，需要多少犧牲者呵！我想起了蘇賓斯基，那工人，和亞珂皮安，那詩人！我從口袋裏拿出這本殘破的詩鈔不知有多少次了，可是這一次，就像得宛若海浪的聲音在歌唱致敬於死了的戰士；喬治·亞特伯克的頌歌似的。『你死了，然而你並沒有死。新青年將衛護牠的真理，』海浪似乎在說。

「談到偉大的瓦哈金，

就有一個傳說，

他是從海洞的植物中生長；

他在烈火中長大，

他在煙霧中死滅。

你的名字就像他一樣，亞特伯克。」

「你像虎樣的輕捷，

從青草坡上，

你爬到覆雪的山巔。

你像鷹似的翱翔，

高入雲際，這時下界正在猛烈地鼎沸。」

「於是你趕快下降，

走到騷擾的嘈雜中，
投身於鬪爭激烈處；
你的槍炮像一團烽火，
無拘束地開放，
直指着我們勝利的途徑。」

「你死了，你生命的呼吸，
御風疾行，
在奔放中絕望地叫着。
安睡吧，親愛的同志，
被殺害的鷹，安睡吧，
在你的高峯的墓壘。」

八月一日

女記者日記

已經八月了！只有這一個月——隨後我就要回家了。那似乎是不可能的，因為現在我覺得自己已是工廠生活的一部份呵。

但今天我是真氣了。今天是發工錢的日子，我們要在錢桌前面排好隊。我瞧在世界上，沒有一個人，比管理這樣一張桌子的那個女子，更愛權勢的了。那忍耐的人類的長隊走上她面前，而她爲了她生平的憂煩開始要在那些等着自己輪流經過她面前的人身上尋得報復。她隨意塗寫一些單據，又用一付不肯輕輕放過的神氣，作長久的談話，真使你可以發怒而叫嚷，但你是沒權力來提出反對的。

終於輪到我了，那是怎樣一種失望呵！我看見我在一個月裏面，只賺了六十五個盧布——比一個學徒還少。可是在我的工友們的工錢清單上，我看見那些數目是一百二十五，一百五十，甚至一百七十五個盧布！

我深深地被壓抑了，把我的不平告訴瓦利亞，她的意見是這樣，我的工錢所以那麼少，是因為我常常疏忽了填寫我的「空機」格的原故，我回答說，如果沒有拿價值放在工作裏面便領工資，

在又是痛苦的事。

『那表明你不需要錢，』她微笑地說。

在事實上說，我用筆賺的錢，和我在廠裏所得的工資，這中間沒有比較可言的，雖然在這兒我要做苦得多的工作。我認爲這是一件不公平的事，可是瓦利亞卻有另外一個意見。

『寫作是一個需要許多條件的職業，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做的，』她解釋道。法里雅偶然聽見了我們的談話，加上說：

『工作的酬報要跟着工作者的需要而定——我們還沒有生活在社會主義的那個年代。』在目前，對所有的熟練工人，賺錢力量的鼓勵還是一個需要呵。』

工錢清單。

工廠：蒲提洛維茨

月份：八月

名字：克爾伯

工作號碼：二九六九

	鐘點	工資 盧布：戈比	預支 保險費 支出	盧布：戈比
作工	107 $\frac{1}{2}$	47..73	20 :	
空機	12 $\frac{1}{2}$	5 : 55	: 80	
夜工花紅.....	4	1 : 78	44 : 21	
病假工錢.....	6	9 : 36		
前月移來		: 70		
	總計.....65..12		總計.....65..01	

『許多外國人以為，蘇聯的管政方針是國家資本主義。他們拿不同的工資的標準的散工制度來做證明。』

瓦利亞盤起雙手。『國家資本主義這些布爾喬亞泥 (Bourjins) 發明了一些多麼巧妙的字

眼！他們以爲我們爲着些資本家的企業工作麼？」

「你自己可以看得我們是缺乏工人的，」法里雅說。「在這種情形之下，一個資本主義的政府會怎麼辦呢？很簡單地，延長我們的工作時間就是了，可是在這兒他們反把時間改短了。」

「而且我們得到的利潤，是放回進工廠裏面的，那麼我們就得到那益處了，」矮胖的馬霞已經走到我們這兒，加上說。我想不出她從那兒得來這些聰明的話兒。

「我現在是一個少年先鋒隊員，」她說，挺起頭大踏步地向她的機位走去。

一切都很好，不過我得到辦事室找到我的編輯，要求一次預支。特別使我痛苦的是我竟遠落在別人的後面；我擬想這原因是在我的「理解的錯誤。」我花了好幾分鐘去較算我的槓桿，當我記好了那些準尺的時候，我又較算一次恐怕有甚麼誤算。隨後，我就發見到那些已經磨光的洞兒鑽得太小了，於是又得把牠們重新鑽過，然而我那下一班的工友，對準適當的方位鑽洞，並一直鑽穿了。

「你把那個叫做工作麼？」瓦利亞問，苦惱地搖着她的頭。「哼！你簡直在那上面玩耍罷了！」

「呵，不要緊的，」當她看見我臉上的受了刺激的表情時候，她安慰我，「沒關係，沒關係；一個志願工人而有別的期望是不算一回事的。」

我真地有甚麼「有別的期望」？我爲甚麼要跑進工廠裏來爲了我自己的娛樂？要見羅爾夫？我是怎麼一個傻子呵！「瓦利亞，我在工廠裏做着甚麼東西呢？」我問。

瓦利亞立刻曉得。「你要觀察所有的東西，而且告訴你們國家的人，那些東西在我們這兒是甚麼樣子的。」

「你以爲那是很容易的麼？你聽見過柏拉圖，那哲學家沒有？」

「一個外國哲學家沒有，我一向沒聽見過他。」

「他寫過一個有味的故事。他將人和釘鎖在一個洞裏的，拿他們的背脊向着洞口坐着的。一些監犯比較。對那些在外面經過的人和牲口，他們只能看見牆上的那些影子，那麼，他們就以爲那些影子是活的生物了。隨後突然間他們的一個從枷鎖裏放了出來；他走出外面陽光裏，看見甚麼纔真正地是生命。你想，當他告訴其餘那些人，他看見過甚麼東西的時候，他們會瞭解他麼？」

「我曉得了，」瓦利亞說。「那些監犯是在資本主義國家裏面的工人們，而在外面那些人是我們自己。那個走了出去又回去的人，是一個外國工人代表團的一份子。柏拉圖說得很不錯。他是一個康民尼斯特麼？」

八月二日

今天一早，我提着吊桶去盛肥皂水的時候，我腦袋裏回憶起一首吊桶歌的第一節來，那首歌將發表在壁報上面，是警告讀者注意吊桶裏的洞兒的，我突然碰見羅爾夫和他的傳話人。我們彼此都感到不好意思，可是，和他平時的習慣絕不相同，他對我談着話。

「近來沒有得到你一點消息，」他說，他的眼睛瞬着。

「我只有這麼多的時間，羅爾夫，」我回答，而且開始覺得有點嚴重。只有一個沒時間辦戀愛的人纔可以嚴重起來。

「你今晚願意來看我麼？」他問。「我在這幾天以內準備請假。」

我覺得有一條淺淺的暖流浸到我腳上；這顯明是我的吊桶裏面有了一個洞。我要快點回去，或者桶水會流到我的機器上。

『好的，我會來，』我說。

當我又開始工作的時候，我就想到：當羅爾夫請假回去了我就不能到那兒去，這個想頭令我悲傷，雖說在最近這幾天很少看見他，但不至完全同他隔絕。

在中午休息的當兒我仍然停留在我底桌子上，寫那首吊桶歌，在許多漏吊桶上把我因想到和羅爾夫分別而生的悲傷的情緒盡量地發洩出來。那結果做成了一個最有效的哀訴，對於牠，管理部或者工房，不能仍然裝聾了。

我正坐在那兒寫的時候，一個工人走過來。看見我獨自一個兒，他用他的手指指着正在舉行的會議的那邊。

『同志，我有些緊要的東西要寫的，』我說。

『你等一會也會有時間寫的，』是他的意見。

在旅館的走廊裏我聽見羅爾夫的高聲和笑語。他的朋友愛迪和他在一道。他倆在兒童時代曾在一起打過網球；當他們在這裏碰到了，他們結上了很好的交情。愛迪過去曾有一番冒險的事業；他曾經環遊過世界，甚至在非洲最荒蠻的地方做過事，那兒的黑人吃生的象肉，而且詞彙只有三個字：水、食物和老婆。每個月從最鄰近的城鎮，有三十張片子寄給他。片子儘管放在他那兒一個月之久，但他決不邀請那些黑人來看牠們。他令我確信，他在那兒覺到非常的快樂，無論如何比在蘇聯要快樂多了。

亞力舍·波里索維支，馬利亞·彼得羅夫娜的丈夫，我會把這段故事告訴過他，他以為愛迪之所以覺得快樂是很自然的，因為那些黑人以敬禮待他，而在這裏他是不被重視的。亞力舍·波里索維支並斷言，那些黑人的三個字不是「食物、水、老婆」而是「到死路」。可是他這個說法好像跟前者那個是完全相反的。

我們喝了咖啡而且吃了那著名的烤麵包。突然愛迪緊望着我，伸出他的手，把我的下眼皮扯開一點兒。「你是有貧血病的，」他說，「你必得吃些葱。你爲甚麼要在蒲提洛府工廠做工呢？你在

那兒賺到些甚麼？

「大概一百二十個盧布一個月，」我扯說道。

愛迪聳着他的肩膀。「廢物。那是真的，在俄國工廠裏，工作一點不像在美國的那樣緊張。如果每個工人在動手之前，都要和工程師討論他的工作，那些機器的繩鏈怎樣會轉動呢。」

「那是因為他們的心是放在工作裏面的，」我說，「那些美國工人，只顧到他所得的酬報。」
愛迪從他的煙斗裏敲出煙灰。「我對於我的工人們的心情，並不感到興味。我需要那些工人敏捷而且勤力地執行我底吩咐，而不要拿討論來煩惱我。」

他又開始裝滿他的煙斗。他有長而有力的手指，他整個的人格使我想起一個爵士樂隊的一些甚麼來。

「俄國工人很聰明的，」羅爾夫批評道。

「他對於政治太關心了，他的腦袋裏又裝滿了許多思想。美國人做得比較快些。」
想到美國的黑暗開始使我生氣。「美國，美國！」我喊了。「你講到你的國家就好像那簡直是

個烏托邦似地。在蘇聯裏面，沒有像你們的祕密死刑那樣的，文明上的污點呵。」

「你們歐洲人不能瞭解這點。祕密死刑實際是訓練的手段。每一個黑奴只有一個願望，那就是和一個白種婦人睡覺。如果我們讓他們那樣做去，美洲的白色人種，在幾十年裏面就會滅絕的。」

我轉頭望着羅爾夫，可是瞧不見他臉上的表情，因為他正拿着他的咖啡杯，送到他的口裏。「那麼你或者是贊成人屠殺猶太人的吧？」我問愛迪。

「呵，不，猶太人是世界上最優秀的民族。他們產生過三個最偉大的人物。」

「你說基督和馬克思麼？還有誰？」

「基督和馬克思當然不是的。我說牛頓，愛因斯坦和洛森費爾得。」

「但是牛頓並不是一個猶太人。」

「他自然是。我在一個英國的學院裏查問出來的。那個學院專辦追考偉大人物的猶太淵源的事務。一次查問得花七金鎊呢。」

「洛森費爾得是甚麼人呢？」

「洛森費爾得是一個袋子裏帶了一塊錢，便在紐約上岸的人。當他死的時候，他得到每天三十萬塊錢的一種收入。他是一個天才！」

有了幾秒鐘的沉默。那兩個男人吸着他們的煙斗，把腳擱在椅子上坐着。隨後愛迪又轉到我這邊來。

「你長了一對退化的耳朵；那是證明你的祖先沒有一個做過甚麼手工藝的。將來你結婚，你千祈不要養小孩子。」

我起身要走了。羅爾夫從椅上移下雙腳陪我到門口。「我在五日晚上很晚纔動身，」他告訴我，「可是在我走之前你能够來看我麼？我現在整天都是忙着。」我要去看他的。爲了這最後一次。我離開旅館，有這種印象，好像我剛從馬戲班回來，在那兒我可以吃驚地張開嘴，對着那些跳舞的蛙，吃火的人和其他的奇蹟。在工廠裏，我聽過一個從斯太林格勒傳來的故事，講幾個美國的技師，他們虐待了一個黑種工人而且使他受了重傷，因爲他強硬地闖進他們的飯店。一個有五千

人參加的「同志法庭」把護照還給他們，並且要求他們立刻離開蘇維埃國境。

當然也有別種樣子的美國人。比方說，孟格爾先生，他是受僱於莫斯科的鎚鑿製造工廠的，就因他熱心職務而獲得獎章。現在那些照像的明信片上，印着他的照片，獎章在他胸前，那不少的煙斗在他口裏，傳播在全蘇聯裏面，這是對那些少數的「專家」之一表示尊重。在他「五年計劃」比一個賺錢機會是有更重大意義的。

引起我的驚訝的，是當我回家的時候，我發現門竟鎖上了。我永遠不鎖的！誰會想得到呢？「你睡着了麼，維拉？」我隔着門叫。「我下樓去喝杯茶。」

我在廚房的四圍摸索了十五分鐘。在後院裏，有人在用口琴獨自奏着。「參加這大競賽，參加……」

我重覆上去的時候，我看見門已經開了。維拉在牀裏睡得很熟，甚至當我在黑暗中打翻了一張椅子的時候，她都沒有醒過來。

八月三日

多倒霉！或者多快活吧，我倒是應該這樣說。我的吊桶歌可以不需要了。當我今早很早地跑到工廠的時候，那兒到處都沒有了吊桶的痕迹，我就知道了牠們已經完全搬走了。將來，要求的人們須要拿出許可證作擔保，纔准許發給他們。

我到了貯藏室，看見費瑪在那兒。她是從她的休假回來的，卻像極度的神經衰弱似的。當她拿我的許可證，把鎖匙給我的時候，她的手抖動着。我打開貯藏室，詫異地望着，因為那兒一行行地擺着閃光的新吊桶，桶底補得那樣完整，我看來很覺得滿意。很快活地，我把一隻桶裝滿到邊緣，勝利地挽着牠走到我的機位。但在我經過壁報的時候，我迎面看到一張大的通告。

「在今天休息的時候，同志法庭要審理一件案情：貯藏室看守人伊凡諾夫娜，被告發了未經准許而延長她的休假，並且玩忽她的職守。全體務須出席。」

費瑪之所以那樣神經衰弱似的即是這個原因。這在她當然是一件最不愉快的事情！

當我把吊桶交還的時候，我發現費瑪給幾個女性的同情者圍住了，她正在對她們講出她底煩惱。

「這是馬利殊金擺佈好了的一個陰謀，因為我不讓他戲弄我呀。每隔半點鐘，他常常跑來，滿口都是這麼那麼的托詞。「呵，我忘記了拿我的尺。」「呵，當我拿鑽子的時候，我的許可證是不是交給你？」「呵……」」

「可是他不能夠對你的休假，生編出一個故事來的，」有一個姑娘膽怯地插進來。

「唉！那算得了什麼？我想，要是二十九日又開工那是不值得的，因為三十和三十一那兩天我們放假呀。缺了一天工就要審判你——只有馬利殊金纔做得出那樣一件事！」

「對不住，我要第四百八十八號的測量表。」一個年輕工人的頭在櫃檯邊露出來。費瑪開始找尋她的架子。我喜歡她，因為她有一個友愛而光明的心地，但對她的控告卻是實事。她不會把那些貯藏室弄得井井有序。在她尋找工人所需要的東西，時使他們老是等着。

「是的——是的——是的，」那些姑娘們用疑惑的聲音說，就離開了貯藏室。

即使沒有全體務須出席的佈告，沒有人願意在這次缺席的，因為大家全高興着這件事體。審判員成圓圈似的坐在那些機器的突出的上面；在中央，馬利殊金已經放好一張棹子，在那兒那判官們——我們的肥胖的馬霞和一個年輕的突擊隊長叫做維底涅耶夫的——就要坐下來。他們這些人，我這樣猜測，甘心將他們自己，給馬利殊金做他的陰謀的腳色麼？

「伊凡諾夫娜，維底涅耶夫問，『對於你的判官的人選，你有甚麼反對沒有，是否承認你的罪過呢？』」

「不，」費瑪輕蔑地說。『如果有一天我會缺過一次席……』」

「這是第二次缺席啦，」馬利殊金指正她。

「第一次不算的，因為我趕不到火車。這種事情誰都會碰着的，」費瑪解釋。法庭裏起了一陣笑聲，但那些判官保持着嚴肅的臉子。那肥矮的馬霞，她在最近這幾天裏已經長胖了許多的，露出憤怒的神情，因為她高聲對費瑪說：

「在過去的春天我們碰到同樣的麻煩。你沒發現到，當你不回來的時候，那全班工人就得沒

有傢伙上工麼？」現在馬利殊金請求許他說話。所有的腦袋都伸出來聽真他的話。

「對於伊凡諾夫娜的疏忽，我曾經有過身受的經驗。」他開始。「不論甚麼時候一個人跑到她那兒要點器具；她是常常因她的粉撲或者她的小說而那樣忙着，而忘記了她在甚麼地方的。如果一個人拍拍她的肩膀，她覺得受了侮辱似的，就十分作勁起來。我很清楚，如果在資本主義的事業裏面，她會老早被開除的。」

費瑪羞紅到她的塗粉的鼻子的尖端。那些姑娘們彼此望望；現在她們中間一個都不相信馬利殊金是和費瑪鬧着愛情的。

「而且你自己不明白麼？伊凡諾夫娜，」維底涅耶夫說，「當着你塗粉在你鼻子的時候，那些帝國主義的力量正在武裝着反對蘇聯的戰爭？我們爲甚麼要發展我們的工業？貪着好玩，還是因爲我們要從那致我們於死地的外國資本主義者手裏把我們自己獨立起來呢？凡有階級意識的工人都和農民聯合起來，他們自己努力到極大的限度，但是你，一個少年康民呢，只是坐在那兒塗白你的鼻子！」

「我們要更嚴厲地責罰你，完全因為你是一個少年先鋒隊員。」那肥胖的馬霞冷肅地說。
「如果你是從甚麼鄉村來的生手，那不會有甚麼關係的。但你是勞動階級父母的一個孩子；你隸屬於少年康民，所以大家希望着你，要給廠裏的農民和中等階級分子做一個好的榜樣。」

那些法官退在一部機器後面商議。當他們轉出來的時候，維底涅耶夫宣佈判決：

「在事實上考察，伊凡諾夫從前已經受過懲戒——六個月以前，她被派到貯藏室，因為她不能盡工人的職務——她將要接受嚴重警告而且降級到一個學徒的身份。」

這件事在我們覺得太嚴重了。一個年紀大點的女人開始責罵維底涅耶夫。她說他不近人情而且力說費瑪很年輕，可以改過自新。她叫他想起那部片子，「生路」；牠說明那些無家可歸的孩童，怎樣被忍耐力和同情心而變成一些有用的社會份子。

在別的時候，費瑪一定會因這個和無家可歸的孩童的比喻而感到被侮辱的，可是現在她沉默的毫不介意的在那兒坐着，她的臉已經不紅了；牠是青白的，她那金黃色的頭髮開始披散在她的前額。

於是法里雅·新珂站了起來。她生氣，但不是對費瑪。她轉向維底涅耶夫。

「你知到你在此做些甚麼事情？你正要把一個年輕工人趕出蒲提洛府工廠哩。她萬不會在這兒做一個學徒的；很簡單地她只好走，那麼，她會碰到甚麼境遇呢？」

所有的眼睛都轉向了法里雅，她是我們最活動的工人的一個，而且受了很高的尊敬的。

「說大話自然是容易的事，而且新進份子好像一定要這樣做，」她繼續下去，卻沒有望馬霞一眼，「可是那些大話有甚麼好處呢？我們的任務不是要去責罰伊凡諾夫娜，而是去教導她。因此，我提議要把她從貯藏室那麼單獨的職務中，調換出來，在那兒她看不見我們的耕種機是怎樣造出來的。而且要調到一張工作椅子上。別個人做好的那些工作，和出產的愉快會給她一個鼓舞，並且散工制度能使她獲得她自己的成績的意見呵。」

「她在工作檯上做過工的，可是她做不好，」維底涅耶夫堅持地說。

「今天她會做得很好的。至少在我們判罰她之前，得給她個機會去做好。」

「法庭已經宣佈了判決，」維底涅耶夫高聲地說，可是每個人都曉得他正在躊躇着。

「是麼？我們今天晚上在工房裏，把這件事再談一遍吧，同志維底涅耶夫。」法里雅轉身走了。顯然地，維底涅耶夫並不希望等到晚上，因為他跟着她，而且開始一個討論，在那兒她分擔了她應負的責任。當我經過他們的時候，我聽見她說：

「那是一個左傾的歧路。這樣一個嚴酷的，不公平的判決只能削弱我們的權力，而且取消一個同志法庭的教育效能。」

那些女人在費瑪身邊圍成一個圓圈。所有那些在休息前判罰了她的行爲的，現在關懷着她。幾乎好像她是一個殉道者，並且向她說明她們的同情。法里雅是對的；維底涅耶夫想拿她做一個例子的目的，已經引起相反的效果，所以有大多數人反對這個判決。

八月四日

在工廠裏第四天常常是最有趣的。各處都有十分像禮拜六的一種空氣。我無論如何該聲明的，一個禮拜中每天的名稱已經完全廢除了，因為牠們已經失掉了牠們的意義。沒有人理會牠們，

人們只管問今日是什麼日子。

這次我不十分企望着我的假日，因為那即是說，我要和羅爾夫道別了。在描寫熱戀的書裏面，女人在這樣一個分別之後往往是頹廢了的。我很知道，我是不會頹廢的，跟着明天的那一天，是八月六日，也即是我們的下午班的第一天。但我將永遠再聽不到羅爾夫信口說出的『哈羅』而且那使我安寧的，使我暫時快樂的方法，都將從我的生命裏消逝了。

我感到這樣悲苦，我幾乎想藉中午時分所發作的劇烈的肚痛和臀骨痛，來轉移我的煩悶。無論如何，我覺得繼續工作是非常困難的。而且不能夠等那從第四部來的突擊隊長，開始嚼他的胡瓜蕃茄夾麵包——他常常是先用午餐，其餘的人纔跟上來。

我蜷伏在一張近茶爐的矮的長檯子上面，縮起我的兩腿。這樣。暖氣不斷地傳來。那位衣服襤褸的猶太女人在我旁邊坐下，便開始怨訴着說，雖然她曾受過一番好教育，但她卻被判罰了要在這裏做挑水的事。她又說她害了病，把那病叫成一個我從沒聽過的名字。事實上，她曾經要求過調換工作的，可是因為從她的監工處得不着保證書，所以沒有辦到。『非常懶。所有她在她的古老的

高等學校學得的東西，早已忘記了，」是他的證明書。

因機器的嘈雜聲，我注意到中午的休息時間已經過了，便站立起來。我覺得好了一點。瓦利亞問我從那裏來，並指教我去「助理醫生室」請假出去，但我不願這樣做。第一，我的低下的散工記錄已經在黑板上張貼了出來，緊急需要着的耕種機的件數也開列在上面；第二，如果我們一個月曠着要請一次假，那麼我們女工就永遠不能希望得到和男工同等的待遇。

我管理得十分妥當。在機器轉動着的時候，我坐在那個本來離我很近的包裝木箱上面，但當那韃靼婦人開始掃地的時候，我仍然十分歡喜，因為她常常在我們放工的兩個鐘頭之前就掃地的。當她到我這兒的時候，我用一種怒氣的口吻問她，她不想將替我買午餐的盧布裏面剩下的錢給我。可是她不回答，而且將她的掃帚，正正從我的腳上掃過去。我突然大怒起來，跑到瓦利亞那兒向她伸訴；我大聲地說我要替這女人做篇評論登在壁報上。

瓦利亞爲我把她找了來，但她平靜地回答說她並沒有剩下的錢而且她不像是預備逃跑的。對於把掃帚放在我腳上的事他不說一句話。自然，這樣小題大做是我的傻處；但是病痛在作怪，一

個人在那樣的時候是常常容易激怒的。

當我回家的時候，我看見我的桌上有一封貼着一個俄國郵票的信，可是不認識牠的筆跡。我把封信撕開來，可是當我看見『你的愛迪』的署名的時候，我不能够相信我的眼睛了。牠開始道：

『親愛的李梨，』

『請你允許我這樣稱呼你。在這個國家裏面，凡事不問適當與不適當只問有沒有利益。你知道，我早已討厭了我的廚子；你願意接替她的職務麼？蒲提洛府的工作在你是太辛苦了。我可以給你八十個盧布一個月，並供給膳宿和洗衣，因為我不是常常在家的，你有許多空閒工夫，那麼你就可以繼續你的蘇聯研究了。我希望你接受我這誠意的貢獻，並望你早早答覆。祝你好。』

『你的愛迪。』

要是這是從一個歐洲人那裏來的，這樣一個貢獻會有很明顯的意義的，但在愛迪那是不同的。我一點兒都不疑惑，這是他一個純粹實用的提議。可是如果我明天把這封信給羅爾夫看，他會有些甚麼意見？

八月五日

「呵分離，痛苦的分離，

對你誰能坦然無憂？

我們將永遠不分離，

當着天這麼長，地這麼久。」

在革命前的俄國，那是一首最流行的手風琴調子。在今日，大家卻唱道：「丁香花是在開放；就是他回來也不要憂傷。」

一切東西，甚而各個人的私生活全都充滿着希望。但什麼是我的希望？首先，一個人必須清楚自己真的希望別個人回來，然而我確不清楚。我已經改變了。在今日我需要一個做事的，而不要一個只會賺錢的男人。我需要一個新世界的建造者和羅爾夫，我在卸除着我的舊殼的最後一層，但那過程是很痛苦的。「呵分離，痛苦的分離，對你誰能坦然無憂？」而在這個憂煩的中間，愛迪的信

供給了一個歡快的插曲。『你知道，我早已討厭了我的廚子。』我和羅爾夫有了笑的資料這個念頭使我感到快活。

他差不多一切都準備好了；只剩下內衣褲和一些紙張沒有檢好。在桌上他裝好了一大包給我收用的好東西——調湯片，巧格力，硬果子，罐頭肉。在這最後一次，我驚訝着，他在這些日常生活的東西上所消受的煩惱。

『我曾經接到一封從愛迪那兒來的信，』我說了，同時等着他的驚奇的喊聲。

『他在信裏說了些甚麼？』他只是問道。我把信交給他看。他微笑了。

『你瞧，愛迪是個很好的脚色呵！他明明不很認識你，然而想着怎樣能夠幫助你。你要接受他的提議麼？』他幾乎不能相信我的耳朵了。

『你真的是那樣的意思麼？』

『無疑的。那對你會是一件很好的事體。我不知道你是那一種廚子。愛迪是很特別的。』

『無論如何，對我是一個很好的職業呀！替一個美國專家當廚子。』

「爲甚麼不呢？這些歐洲人多頑固。那天晚上愛迪講給你聽的那個洛森費爾得就做過

……」

「一個擦鞋匠，我知道的。所有美國的百萬富翁在他們的青年時候都是些擦鞋匠哩。」

「隨你的便吧。那完全看你的。可是要寫封婉轉的信給愛迪，因爲受了拒絕在他是不滿意的。」

「如果他能够袒護秘密謀殺黑人的話，他是不會那麼容易生氣的。」

羅爾夫氣得滿臉通紅。「秘密謀殺黑人！當你看見一個女人張開口睜大眼睛聽你說話的時候，你自然會想法子去騙她一下。你將來是要吃大虧的，我不曾見過比你更不懂世事的人。」

「你靠着我不懂事的人也過了不少的快樂日子。」

「有些時候並不怎樣快樂的。你以爲一個人對付你是容易的事麼？你是一個小暴躁鬼。」

「那麼我們分開是一件好事情了。」

「那麼，當然咯。」

我送行的心情完全打破了。我站起來。「再會！」

羅爾夫立刻感動了。我們剛纔所說的一切現在都不管了。他把我的頭拉到他肩膀上面。第五幕，最後一場；等一會，那些觀衆在回去的路上就會咕嚕起來，因為這齣戲收場得很壞。他們得不到他們的「呵分離，痛苦的分離！」

當你喉嚨裏有那種窒息的感情的時候，那是多麼可怕的呵。眼淚開始流出來，而在羅爾夫的灰色眼睛裏，有着那樣一種溫和的閃光……

「我們甚麼時候纔會重見面呢？」

「永遠不會的？」我粗暴地回答他，便跑開了。正是該走的時候。眼淚流下我的臉。一陣陣滾下來。我已經忘記了那一大包東西。

三個人從走廊的盡頭走出來。兩個男的和一個女的——都是外國人。他們向我走來，在我看來，似乎從他們的眼睛裏，可以發現熱烈的貪求和惡意的歡快。呵哈！他們畢竟在幕後看了一眼，並且發現一個波爾雪維克的殘虐的犧牲者。那一個男人拿在手裏的不是一架照相機麼？不久我恐

怕就會『在蘇俄的一個啼哭的女人』發表在一本美國雜誌上標着無法可想爲要打破那個男人的機會，我閃身走進了沐浴間。

在那兒我能盡量地發洩我的憂愁，而不至製成一種反蘇維埃的宣傳。當我訣別的時候我究竟在那兒呢？呵對了，『呵分離，痛苦的分離！』

在工廠裏我希望能夠加入早班。把機器開動，將銀色螺旋從鑽洞裏清理出來，堆起那些做好了的槓桿！牠們放在那兒是怎樣地閃耀着，二十件，交叉地放着，一個疊一個，正如我所見過的那些工人等着芬尼加乘車來收取牠們的時候，同樣地安放着。芬尼加載着牠們去交給那些工人，他們的手是因和金屬接觸而變成漆黑的。那些裝置室的工人就把牠交給鐵器管理處。『製造耕種機的普羅列塔利亞特，在你手裏……』

我們這兒的生活像是春天的水；牠向前捲進，越過那些石塊和其他的障礙物，沖去那些腐爛的東西，把自己瀰漫在草地上，田野上，前進，永遠前進，如果一個人無聲無息地隨着牠的潮流飄流，他是沒有工夫後顧而迷戀着過去的……『呵分離，痛苦的分離……』不，今天我不唱這個歌；我們

唱的是很不同的東西：

「破碎的愛情會產生苦惱麼？」

不呵；不管那痛苦怎樣難堪，

在集體的工作裏我便得到

那最好而且最光明的慰安。」

八月六日

我真想不到那是可能的。

怠工在蘇聯居住的時候，對「怠工」這字的意義我已經得到一個明顯的概念。一個怠工者或破壞者是一種人，他……不，我們不能把他叫做一種人；讓我們說他是一個不能忍受那些波爾雪維斯特們的，中產階級的智識份子。他需要舊時代再回來，而且做一切可以危害蘇聯和牠的工業的事情。自從那著名的實業黨案以後，「破壞者」這個字已經變成一個口號和一種侮辱了。那

時，被告的供狀，讀起來像偵探故事，並且把他們簡直寫成比莎士比亞所想像出來的暴徒還更兇惡。這自然會引起勞動階級的猜疑和防範。

然而，俄國人的普遍的懶惰與故意的怠工，這兩者的分界究竟在那裏呢？有幾個人告訴我說撒波林，我們的實業經理，是一個破壞者，同時我聽見過，對那冶金機械，耕種機各部的副總監也有同樣的控告，可是我卻找不到牠們的根據。有一次，我在法里雅·新珂面前，談到這樣的事情，甚至聳了我的肩膀。但她不給我一個答覆。

今日早晨的天氣像是下雨似的；一股冷風從附近的海上吹來，雲在天空裏密集着。然而並沒有雷雨的預兆；不，這正是北國的早秋。我在我的工服外面，披上一件「外國雨衣」並且從我的皮箱裏，抽出我的防雨帽和我那一對藍色的俄國襪子。在蘇聯一個人無論買甚麼照例要買半打的，只要那種物件是有存貨的話。在店鋪裏，一個人第一是問「你有這樣或者那樣麼？」而第二就是「我可以買多少呢？」價錢是一件小事，因為大家都有充足的錢。那些店鋪常常擁擠着許多顧客，因此，在顧客中的店員也不免有粗魯的行爲。忍耐和謙遜是顧客特有的道德。

在蒲提洛府區裏那天刮着很大的風，這個區域緊靠近海岸，以前那些工廠和鄰近船廠都是隸屬於同一的管理之下，現在這兩個商行都分開了。在這幾天那種瀾漫全廠的油質的快意的香氣，令你感覺你正走進一間暖室一樣。

可是當我做工的時候，我突然感到有些冰冷的東西滴到我的頭和肩上。我驚跳地朝上一望，看見雨點從屋頂的玻璃格子的間隙中直滴下來。有幾個地方那些雨筒直漏得像露天那樣大，而且濺到機器上面。機器的吼聲消失了；許多工人停止了工作，跑開去拿水桶，他們想把牠們放在他們的機器的適當位置上，那裏可以把雨點承住。我拿起我的雨衣，爬上棚架，把牠展開在機器上面；當我再跳下來的時候，我看見瓦利亞在那兒。

「哼，」她用明顯的天真問道，「那怠工到底是甚麼意思？現在，你可有一個概念？」
我裝作不明白這個問題，跑到練習生的桌子那裏，從我底掛袋裏拿出一條手巾。在我正在把頭和頸上的水擦去的時候，蘇賓斯基跑到我這兒來了。

「你這樣照料你的機器是很對的，」他微笑地說。「你瞧，我們是這樣缺乏人手，連那些屋頂

的漏洞，我們都沒法修理。過幾天我們就要來修理牠，否則我們的機器都要生鏽了。可是現在，我想，你對於甚麼是怠工，有了一個具體的例子吧。」

我沒有回答。我的衣服已經濕到不斷地滴水。那些可惡的破壞者！

八月七日

整個早上我都不能把這件怠工的事情憑自己的頭腦想出來。十二點鐘我趕到工廠預備把牠澈底地弄清楚，並且去向黨委員會要求解釋。我會見的那位同志給了我一個斜視，把他的小帽推向後面，搔着頭皮，隨後叫了一個高而胖的男子和他商量。他們兩個人都用小心，猜度的眼睛把我上下地打量着。

「你不是不是一個黨員呢？」那胖人問。那時我瞥見索羅維奧夫，他是背向着我站在那兒。當他轉過來的時候，我十分震動了一下；爲甚麼，我不能夠說。

「聽着，瓦西列夫，」他說。「我認得這個同志。你可以把材料供給她。」

那兩個工人彼此望望；那胖人的眼睛表示同意，他的同伴也好像是贊成了。「好的，」他說，「我要替你查查幾個案子；一個鐘頭以後再來吧。」

一個鐘頭的等候在我們的觀念裏是一個很長的時間，但在俄國那不算甚麼。

我在街上閒逛着，圍繞工廠的門首，我看見不少的到那兒找僱用的農民。那些牆壁密密地張貼了各種印刷的和手寫的佈告，叫那些工人趕快向各種職業班和俱樂部報名，因為牠們在八月底準定開辦。俱樂部內面包含各種日常的活動，有無線電和攝影會；有文學、政治、和生產（一種使工廠工作加速的課程。）有成衣縫紉的課程，絃歌班有裝絃課二絃琴課與「伊蘇」課（Ligo，繪畫和創造的藝術。）參加最後一種課程的工人製造繪畫的廣告，布置那些節慶日的廳堂，替劇社設計佈景，在所有的會裏面劇社是最活動最普遍的。

去年冬天，全莫斯科的俱樂部的劇會有一次競賽，由莫斯科工聯托拉斯組織委員會，對優勝者發給獎品。大多數的劇社演出一種宣傳性質的短劇，討論蘇聯的日常生活；那些戲劇的作者排演者都是各工廠的工人。這些劇本的主題全根據於各種問題上面，有的討論各種工業的財政計

劃的問題，有的主張每個同志在未來的蘇維埃選舉時有選舉權，有的提議在工作時間須要按時出席，還有的極力反對飲酒和中產階級的生活方式。但是那些初學的演員以有限的工具使戲劇博得舞臺的效果，這是很可驚奇的一件事，服裝和用具十分簡單——平常的衣服和塗色的笑的面飾，或者滑稽的顏飾。各個腳色特有的小帽，一個醉漢用的伏特加酒瓶，一個給裝病人用的大紙板做的注射筒，一把給「茨契斯特加」(Tschistka)用以驅除被清除者的帶子，有些刺諷畫，繪有怕工作的人，不按時工作的人，「飛行者」(這是從一個工廠飛到別個工廠去貪求最高工資的人們的諱名)以及破壞者——舞臺是用旗子和繪寫的標語裝飾的。有時對話也用口琴或者雙絃琴伴奏着；只有幾部作品採用那由韻律的動作而變成舞蹈的管絃隊和歌唱班，此外更沒有別的東西。然而，那些演員們的毅力和幽默，卻已把生命和現實主義強烈的香味，盡量地滲透到那些簡短的小劇本裏面。

我聽說，這些劇社的工作有一種固定計劃的根據。去年秋天他們的代表曾在第十六次黨員大會上鄭重的允諾了：要「利用他們的藝術做一種工具來幫助我們正在建設起來的那偉大

工作，和普羅列塔利亞特的階級敵人鬭爭，剷除所有的滋蔓和所有的非政治的和中產階級的觀念，並且建造些新的普羅列塔利亞的幹部，組織羣衆的自發的一切活動。『黨員會允許了那些劇社一個機會來表現牠們是否踐言。在每個劇社排演之前，牠的團員之一出來報告本社的各種活動，隨後考驗委員會的委員把牠拿來批評一下。排演之後又舉行一次討論會，所有的觀衆都得參加。

第一次的排演在十二月開始，但到四月，在許多劇社沒有完全輪流排演以前，劇社已經發展到得很可觀了；單單建築業工人就有六十六個劇社，而食糧業的工人又可以另外組成七十個劇社。

在 R. S. F. R. (蘇聯的俄羅斯部) 大約有九萬個藝術突擊隊在各種俱樂部鄉村讀書室和各區裏面——內中有五千分在鄉村裏，另外有一萬散在軍隊裏面，在烏克蘭，藝術突擊隊的數目比較的更多些，並且因爲每個劇社包含有二十乃至二十五的社員，所以那『自發的』劇場運動擁有二百萬以上的人數。這些數字仍在繼續地增加着。由於那些劇社努力實現藝術的要求的使

命，那些初學的劇作者和演員們，迅速地走到職業者的標準上，並且，我們可以預料，不到幾十年的光景，兩者的差別必歸消滅，藝術將成爲全國民的一種事業。那時，藝術的工作簡直會成爲那最完善的集體的最高成就。同時，劇社會走向戲院的途徑，日報上的工人通訊會把文學當作一種職業，而那『伊蘇』將成爲創造的藝術的支柱。

不幸，我沒有機會來讚頌我們的蒲提洛府工人的事業，因爲休假略，修理略，等等原因，以致那些俱樂部在夏季便不得不停止一切的活動。我們仍然沒有找到新俱樂部的地址，只是暫設在『正月九日花園』對面的一所舊樓房裏面。我發現，新聞班設在樓下的，有油漆氣味的地板上，而新塗上的天藍色的粉飾，卻在上面幾層樓的牆壁上，平靜地乾着。在一個房間裏，我看見一張色彩鮮明的繪圖，寫着『世界的創造』並附有說明的字樣。在圖的一邊題着『聖經所說的』，在另一邊是『科學已經確定了』。原來，我已經偶然來到『無神區』了。

我一直走進那正在改組的圖書館；看來牠好像經過了一番叛徒的搜劫似的，但是幸運地，此地沒有那種恐懼的。圖書管理員是一個工人，而他的助手卻是有特別技能的知識份子。這裏的習

慣和工廠的與民衆圖書館的習例差不多相同，借閱圖書並不花錢，但是事實上，因爲那幾個館員要服務於一萬一千個讀者，所以不容易找出每一部借出的書的蹤跡。不留心的讀者不注意到預先的通告，罰款制度又不受歡迎，認爲牠與拒絕讀者差不多沒有不同，所以結果是許多書散失了。我們的圖書館藏書五萬冊。同時我也知道，爲了個別的手工廠——總共五十八所——我們設有旅行圖書館，可是牠們不到那耕種機部去的，因爲我們沒有地方去安放那些書。除於美的文學發生興趣外，對於技術時事和政治文學的需要也很廣大。

我不能說那圖書館或者那藍壁的房间給了我一個特別愉快的印象，我並且艷羨地想起那市政人員的漂亮的俱樂部，和我在那兒度過聖誕節的前夜的莊嚴璀璨的莫斯科的「魯伯俱樂部」，那時恰巧碰着一個「反宗教運動」，形式上有一個關於聖誕節的意義的簡略演講，接上是一個音樂會，和一齣講述一九〇五年十二月的事件的短劇。

在「魯伯」俱樂部較高的一層樓上，我發現一個精緻的休息室，陳設着綠色的器具裏面有一個擴音機和一個華麗然而便宜的碗櫃。那俱樂部的人多極了；在晚上九點鐘以後不再准許一

個人走進去，而圍着門口的高聲的辯駁，和彼此的推擠仍是繼續着。女人們穿了最好的衣服，而且從她們波捲的頭髮裏我瞧見許多光亮的梳子。那是一個節日，但一點沒有聖誕節的神氣。

在下面那個大運動場裏，穿了背心和短褲的男孩女孩一齊在玩着手球和足球，擺成圓圈，練習各種健身的把戲，還跳過許多的木欄。甚麼時候，蒲提洛府的工人纔能得到他們的新的俱樂部呢？

在委員室裏我只找到索羅維奧夫，他一心注意在那張報紙上面。

「另一位同志在那裏？」我用盤問的聲調問。

「他一定是忙着事情去了，」索羅維奧夫不介意地答。我苦笑了一下。

「我倒想經驗一次，當着你們當中有一個人是不讓別人老等的。」

我們的人是這樣少；他們全有重大的工作的。所以那是很容易明白的咯，那些事情很少的人一定要等那些事情最多的。」索羅維奧夫的話是很對的，但使我氣極了。

「維克多·米歇洛維支，」我不高興地說，「維克多·米歇洛維支，你好像相信，我只是出於

好奇心和一種娛樂的願望。而來查問你們這些可怕的破壞者們，我對這件事發生興味，第一因為我要把我自己的觀點弄清楚，其次因為我需要一點報告，當我回國的時候，不論誰人問我這些問題，我都可以回答。」

「真的麼？」索羅維奧夫裝出驚異的態度。「如果你是爲着這樣重要的理由而來的，你當然能够多等一會兒的。也許你寧願明天早上到這兒來稍爲散步散步。」

「我沒有工夫來散步，」我反駁了。「我不久就要離開這裏，而且我還有這許多地方要去看。」

索羅維奧夫放下他的報紙。「你要走了甚麼時候？」

「這個月底。」呵，這句話把他擊中了！

他把我注視了很久。「好的，我想你可以走吧，」他說，又拿起他的報紙。我在房子的一角坐下，思考着用甚麼方法去刺激他一下。一味的看報，他拿出一盒香煙，把一根放在嘴裏，把牠點着了。我站起來向門口走。

「你到那兒去？」我聽見他問。

「找香煙。我要抽煙。」

「剛纔你爲甚麼不說？我有的是滿盒的煙。」

「我不要你的。我自己可以買。」

「你是會不着諾維可夫的。別裝那付神氣吧；我受不了。」

「管你受得了受不了。」

「哼，我是……你真像一個女人！一個人永遠不知道從那一邊去接待你們女人。」

「接待，真的。你對任何人都要接待的！可是我們得先說些無意識的話！」

「哼，總而言之，你是同那些莊嚴的，自負的外國紳士混慣了的。」他用一種譏笑的聲調說，可

是我看出了笑的底下有嚴肅的態度。

「誰會想到那維克多·索羅維奧夫，那位佛蘭吉爾的征服者，是一個懦夫呢？」

索羅維奧夫把小帽推到他的頸後——俄國工人最喜歡的一種姿勢。

「是的，佛蘭吉爾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時一個人知道甚麼是他應做的事情，但在這兒……」
我們彼此互相望着，便大笑起來。

「哼，你們好像滿高興似的。」諾維可夫說，他正在那個時候走進來。

「那麼你的靈魂的苦難完結了，」索羅維奧夫說。「好的，我要去了。那麼爲了現在……」
（「爲了現在」在蘇聯是個慣用的臨別的招呼。）

「你到底想知道甚麼事呢？」諾維可夫開始在他的紙堆裏摸索。

「昨天雨水從屋頂漏到我們的耕種機的機器裏面。那是不是怠工者幹的玩意兒？」

諾維可夫轉過來。「呵，可是我怎能知道呢？一個人能夠看到人們的腦袋裏的事麼？也許，在這種情形裏，那並不是國際的怠工者，而只是破壞者在這裏做事像豬那樣愚蠢的一個例子，不消說。結果是一樣的。」

「做事像豬那樣愚蠢？你是甚麼意思呢？」

「我再舉一個例吧。你們的屋頂的玻璃格子是用一種品質頂壞的灰泥黏接起來的，但我們

不能找出一個人叫他負責的。工程師伊凡諾夫吩咐他的助手，穆拉尼奧夫，定買灰泥，自然附帶的說到了灰泥一定是要可以經雨的。穆拉尼奧夫把這件事囑咐到現在在斯太林勒克的耕種機工廠服務的佛明，叮囑他一定要在灰泥未鋪之前把牠檢驗一下。但當灰料一到的時候，佛明發了熱，躺在牀上，又把這件事信託在……哼，沒一個人真正能夠記得起他是誰。因此，意外的事情時常發生。事情是壞了，可是沒有一個人能夠受責備的。」

「那也許只是疏忽的原故。」

「自然咯。開頭我們大家全這樣想。可是這些意外的事出得太多了，於是我們認定，在疏忽的背後，一定有某種性質的組織。隨後許多事變發生我們便懷疑起來。」

「什麼，有例子麼？」

「管理處弄錯了裝置部的定單便是一件例子。裝置部需要一萬五千個滑車，但是耕種機機件部只供給一萬個。五千具的耕種機，因此都沒有裝上滑車——不是一件好笑的事。」同志某某，你們不是同志，你們是計劃的破壞者。」這一部責問那一部，「對這種非普羅列塔利亞的行爲，我

們要請同志法庭傳審你們。」「你們完全瞎鬧，」是對方的回答，「我們完全依照計劃做事，不少半個滑車的。」於是事情是這樣解釋明白了，但那狡猾的伊凡諾夫卻卸脫了他所有的責任。」

諾維可夫深思地凝視着空間。「還有些案件呢，」他接上說，「我們造成了這樣重大的機頭，然而那些軌條竟支持不住。可是我自己問道，無論怎樣，一個工程師照例是能够計算得確鑿的。如果不能的話，他到底學了甚麼東西？隨後我們發現許多很壞的金屬，因為那些混合金是弄錯了。」他點着一根香煙。「還有呢，當我們重建工廠的時候，有人叮囑我們不要改變原有的面積。那些工人們所主張的改善那些舊房間，以適合新的機器的提議都推翻了。還有一件意外的事，當撒波林照外國貨幣拿錢到國外定購機器的時候；其中有些我們可以從俄羅斯工廠買得到的，而其餘全都是不必要的或者甚至完全沒用的。並且我還記得，他們把耕種機機件部極力現代化，把牠弄成最新式的，可是仍舊把冶金部丟在一邊，所以牠就不能完全供給我們所必需的原料。」

「呵，這便是我們有這許多空機的原因。現在我明白了。」

「當那些製造滑車的新機器運來的時候，雖然那些工人還不曉得怎樣去開使那些新的東

西，但他們早已把那些舊機器拿開了。結果是我們本來，每天可以做出八十架耕種機的，現在只能做四五架。隨後，他們常想拿來怠緩我們的工作的程序的方法做出來了。在一九二八至二九當中，五年計劃的頭一年，我們預算要做三千具耕種機的；黨的負責份子把這件事和大家談過了，並且工人們也做了他們的提案，事實上，一切正在完美地進行着，而那些工程師起來搗亂，並且想來證明我們是在想着創造一個烏托邦。可是，我們並不因此而打消勇氣，而且辦到了比我們原定的數量超過五十架。在第二年，當我們預算着要造成一萬二千架的時候，開始又有困難，而我們又一次完成我們的程序。我們的經理就像那樣的人，他們不但不帶我們走上去，反而把我們拉回來，同時我們須得提防他們，恐怕他們會陷害我們。」

「那麼到底你們怎樣揭出他們的真面孔來呢？」

「工人們越來越加不滿意那些工程師。怨訴的空氣越來越濃厚起來；評論開始在壁報裏出現，批評他們的活動，並且要求普羅列塔利亞份子應該同他們聯絡起來。有一大幫工廠報紙的通訊提起過那件沙克地案子，但是，因為我們仍然相信我們專門技師的忠誠，所以黨委員會不想干

涉這件事。我們不願意只因為他們小小的過失的原故，便把他們在工人中的聲望減低了，因為他們還得要訓練一下，可是任何這樣的舉動，只是給生產以絕大的影響。但那政治偵探局發現實業黨的文件……不錯的，而且在審訊的時候，撒波林和他的同事承認了在蒲提洛府工廠裏，破壞的工作是很困難的，因為那些工人是有這樣強健的階級意識的。」

「呵，那麼現在你們已經把那些破壞者完全趕出了工廠以外麼？」

諾維可夫的臉變成陰鬱的了。「關於這一點，我今天早上還可以毫不躊躇地說「是」的。工廠的首腦是那個里窩尼亞人，卡爾·馬可維支·奧茲；他從前在國內戰爭的時候是一個軍需官。我們的工程師完全是年少的「進步的」工人，或者是些對於我們的動機有同情的人，內面包含有不少的康民主義者。不在那一方面一切都是不錯的。」

「後來發生些甚麼事情呢，同志？」

諾維可夫並不即刻回答，只是凝視着他前面的那張桌子。「是的，是的，那就是那麼一回事，」他喃喃着最後說，「我們在休息時候，把這件事討論一下吧。」

『可是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我叫起來。他擡起他的頭。』

『昨天晚上，在耕種機械件廠裏，一架機器弄壞了。』

『在我們那一部胡說！一個錐子或者一個鑽子吧——那是常有的事。』

諾維可夫槌着桌子。『有人將毛氈塞到那些洞裏，所以無怪那機器在輪子第一次轉動的時候就破裂了。』

『是那部機器呢？』

『在工頭的位子右邊的那一架呀。那是一架用來轉動滑車的。』

『那是柯爾加·斯維都諾夫的機器呢。他是我們的文化組織者而且是一個少年康民呀！』

在我心靈的眼睛裏，我看見那戴着繡花便帽的溫和的柯爾加。

『一點不錯！柯爾加的機器。當他那天到廠工作的時候，他會高興的吧。』

『怎麼會發生那件事。柯爾加不會丟下甚麼毛氈在機器裏面的。不，斷然不會的！』

『在這件事情裏面，那決不是疏忽的原故。在夜班的時候，這架機不用的。可是牠的位置同其

他的離得很遠。甚麼人走過去好像要同工頭講話似的，在那兒徘徊一下子，彎低腰裝着，看甚麼機器的樣子——那麼那件事在五秒鐘以內就可以做好。

「我想不到我們廠內的任何人會做這樁事！」

「也許不是的吧！從事實上講，一個破壞者在沒有僱用他的工廠裏，幹破壞的勾當，不是十分冒險的。」

「可是有人會看見他的呀！」

「在清晨的時候，當每個人為睡覺的願望努力爭鬪的時候，那看守者的敏銳麻木了，這是不會有人看見的。那麼，一個富農的兒子就做得毫不費力了！」

「可是你怎麼確實知道那一定是個富農的兒子呢？」

「還有誰呢？一個工人是絲毫沒有可能的，一個貧農也不會做這樁事的，不，甚至他是信仰宗教而不肯在集合農場作工的也不會的，他的階級的本能十分堅強，不致使他有破壞的想頭。我們曉得，在這些農民的兒子的眼目中，所有的耕種機都是針刺，因為牠們使那些更窮的農民脫離

他們而獨立呀。現在他們不須向那些富農租借馬匹，而拿辛苦的工作去還債。我們的耕種機，對於耕自己的田地的農民，是一個大的助力。」

我站起來。「謝謝你的報告，十分感謝諾維可夫同志。這些破壞的事件是十分有趣的呵。」

「是的，假使他們不要我們犧牲這許多時間，金錢，能力和材料。從那點看來，他們不是怎樣有趣的。再會，同志。」

在走廊裏我碰到索羅維奧夫。他的眼睛愉快地望着。「那麼，把你自己的觀點弄清楚了沒有呢？你現在得到一個怠工的具體觀念嗎？」

原來他知道了我和法里雅關於這點的談話呢！可是我沒有讓自己洩露言語的心情。

「維克多·米歇洛維支，我說，『昨天晚上有人弄碎了我們廠裏一架機器哩。』」

微笑從他的臉上消失了。「你怎麼會曉得諾維可夫告訴了你麼？」

「是的。再會，維克多·米歇洛維支。」我從我的袋子裏抽出外國雨帽，因為天已經開始下雨

了——一直走到門口。「同志，」我聽見索羅維奧夫在我後面叫出來，「同志，慢點去！」

我轉過來，他走到我面前。『我要到莫斯科去幾天。』他說。『當我回來的時候，我們必得談談話，唔？』他的語調告訴我，我們現在是朋友了。

『我想你真是愜意呢，維克多·米歇洛維支，你對於機器的煩惱很快地丟開了，而不讓牠麻煩着你。』

『我爲甚麼要給牠麻煩呢？我們曾經征服這許多敵人；當然我們會設法解決那富農的兒子的。』

『諾維可夫也以爲那必定是一個大農民的兒子。』

『除了他還有誰呢？好了，再會呀，親愛的。』

生命真是美麗的；生命是奇妙的。可是講到那架機器真是一件憾事。

八月八日

當我進了作家飯店的時候，我看見娜達沙，沒有和她的高而瘦的像鯡魚的丈夫，卻和一個矮

而小的像淡水鯉魚的男人，坐在一張桌子旁。和他們一起的，還有一個十二歲的，穿一件沒洗的工服的女孩子，她正在舐着一隻雞腿。娜達沙對他們都沒有加以特別的注意，只取下了果子醬汁的麥餅，一塊塊地吞下去。

「叫點粗麥餅來，我的金寶貝，」她勸我。「很好吃；現在我吃到第三次了。呵，還有，我可以向你介紹這位比奧多·比得洛維支·里斯金？」

我在他們桌子前面選了一個坐位。比奧多·比得洛維支一心一意地同我談話。爲了我的原故，他把話言轉到現代德國文學上面，並且提起「威廉·梅思德。」

「我的金寶貝，」娜達沙截斷他的話，「你問點心店要些蜜餞糖果，也要些餅和茶。別讓他們找出些甚麼優待券給你，因爲那些優待券只是今天通用的。」

「你以爲他怎樣？」當那矮傢伙走開了的時候，她用法國語問我。「你不以爲，他看來似乎鄙
『的麼？』

「不的，」我說，「可是你希望他怎樣呢？至少他讀過哥德。不過你得將餐桌上的規矩稍微教

訓那孩子一下。』

『談不到那麼遠的，我的金寶貝，』娜達沙說。『你真以為我要跟那矮胖子在各省跑來跑去麼？』

『那麼爲甚麼你開始這件事呢？』

『我並沒有開始這件事。不過他要把他的心事告訴我。那就是這件事常常開始的原故。謝謝天，有這個小姑娘；她是一個好借口呵。我只要告訴他我做一個繼母是不恰當的就行了。』鏡子，牆上的鏡子，誰是他們當中最適當的呢？』在這個時候比奧多·比得洛維支回來了，帶着一副愉快的臉孔，像聖誕老人滿載着許多甜蜜的東西似的。我憶起，曾在一張日曆背後看過的東西（所有的最偉大的至理名言都是寫在日曆牌子上面的。）牠說，在一定的情形之下，一個女人常常經過一切男人同樣的經驗，而在同樣的情形之下，一個男人常常經過一切女人同樣的經驗。在娜達沙這方面，這句話像是很對的。

談話轉到蕭伯納以及這男人所帶回來的蜜餞糖果上面。於是娜達沙問我，明天想不想去人

民法庭聽聽那件案子——馬利亞·彼得羅夫娜的僕人杜尼亞同她的鄰居法西利撒·福基娜的糾葛，因為後者詆毀了她並且揪了她的頭髮。自然我答應要去的。

在工場裏他們正在修理屋頂。在玻璃格子上面常常露出一個頭或一雙腿。秋天最先要送來牠的雨水的警告；俄國有一句古語說：農夫不等到雷響，永遠不在他自己身上劃十字。

八月九日

除了馬利亞·彼得羅夫娜和她的丈夫、女兒、醫生之外，在同一間房屋裏還有三伙人。第一伙是一個康民主義者，一個勞動階級的學生，同他那在銀行服務的老婆在一道，第二伙是一個人數極多的農民家庭——父親，母親，孩子，祖父母們和女僕，他們都在一個偌大的，不通風的房間裏住下。本來這房間是完全屬於那年輕夫婦的，可是在俄國，有一種習慣，從鄉間來的結了婚的夫婦，在城裏租好了一個房間，馬上要請他們鄉間裏的親戚們來住。過分的擁擠在他們不算一回事的；他們在他們自己的『依士巴士』（*Исаба*，農家茅屋）裏過慣了的。我想起那首軍歌：

「我蹲伏在桌子上

把一切告訴這個村莊。

那些有腿有腳的人簡直是癡瘋

如果他不飛跑到彼得格勒城中。

雖然我的衣服看來有點奇異，

我是這屋子的主人卻無問題。」

那農民家庭是已經受過教育的；房屋裏的浴室和便室是像一個人所望想的那樣乾淨的。他們是些溫和的，寧靜的脚色，對政治沒有興味；在房角的照片的對面，掛了一張列寧的相片，他的雙眼扭起來，頭上戴了一頂小帽；沒有親身見過他的人都會把牠看作這房間主人的一位農民親戚的像哩。

講到列寧的各種照片是一件奇事；牠們完全好像隨着主有者的身分而改變的。比方說，在亞力舍·波里索維支的書桌上，烏拉奇米爾·伊里奇（列寧真名）攝出彎着身子在一張真理報

上的樣子，看來像個有學問的人，可是在兵房的時候他卻像個戰士，像個革命的鼓吹者。在蒲提洛廠內他看來像個金屬工人。在亞美尼亞我看見過一個黑色的亞美尼亞的列寧，在底伏里斯是一個喬治亞的列寧，而在伏爾加共和國是一個德國的列寧。可是這些照片不會改削一點原來的面目，或者失掉了那受人愛戴的領袖的典型姿態——在蘇聯裏他是每個孩子一看就曉得的。這屋裏的第三伙，或者，不如說是第四伙，這一伙和其他各伙是彼此仇讎的。那太太，她是一個勞動階級的婦人，然而「帶有較低的中產階級的偏向」的，像娜達沙所常說的那樣，在她每一個休假日，都把那廚房變成一個戰場的。這位安娜·亞基莫夫娜在我們私人見面的時候，常常很友善地對待我；甚至她露出黃色的牙齒對我微笑而且要求我把我的小紅珠子賣給她。同時她把眼睛睜視着我，像山狼預備吃紅頭巾（一個女子的名字）（Red Riding Hood）似的。那是最可怕的。

這位有「較低的中產階級偏向」的安娜·亞基莫夫娜曾經在口角的時候詆毀了僕婦杜尼亞，因為她的脆弱的聲帶不够使她表現重壓的感情。今天那案件在人民法庭之前要提出審問。

我們到遲了一點，法庭已經開審了，在門口我們就聽見那被告叫嚷的聲音，她兩頰灼熱，眼睛發光地站在法庭裏面，她正在對那學生叫出怒罵的語言，用狂暴的力量要使那金髮判官——顯然是一個勞動階級的女子——和她的兩個陪審員袒護她而駁斥他的證據。

「真是一個康民主義者！」她叫出來，「他對康民主義者是一種侮辱！當他的老婆在鄉間的時候，他把娼妓帶到家裏來，是的，他真的這樣做，那腐化的康民主義者！我要進洗澡房的時候，可是那裏的門已經門住了；我從鎖匙孔裏望進去，呵，一看就看見一個娼婦在澡盆裏洗澡。」

「你怎麼曉得那女人是一個娼婦呢？」一位陪審員問。

「我怎麼曉得那種人一看就知到的。甚麼女人會有這樣厚的臉皮，在一個生人的澡盆洗澡的呢？」

「我要求說一句話，」那勞動階級的學生插進來，「剛纔說到的人是一個從卡山來的同志。因為那天是那麼熱……」

「這件事是完全不相干的，」那法官打斷了。「惟一的問題是究竟被告有沒有詆毀了原

告。」

「我只是說，」那學生說，「我可以請官究辦你的詆毀罪，福基娜同志，因為你誣蔑我的行動，說什麼不配做一個康民主義者。可是我不高興理會這件事。無論如何，我有一句話要說到你那在小組裏的丈夫；一個黨裏的同志竟會讓他的妻子這樣不受一點兒教訓……」

「你——如果我們不是在法庭裏的話，就請你享受一點了。你聽見沒有，法官同志，你聽見他怎樣想來離開丈夫和妻子沒有呢？」

「叫證人安納茲基娜上來，」法官下了命令。

我們的年輕的農家女孩子微笑地走出來。法官叫她陳述她的名字，社會的出身，職業和她所隸屬的團體（如果有的話。）接着她警告她要講真話。可是同志安納茲基娜顯然地認為不把自已混在別人的糾紛裏，是一件比較聰明的事情，所以否認見過或者聽過甚麼詆毀。她加上說：她永遠不會注意過那常有的口角，她滿面喜色的退出了法庭。

另一方面呢，杜尼亞的憂愁越加沉重了。她說女市民福基娜是常常擺太太架子的，咒罵她而

且打她。『我的主人是一個有學問的人，』她說，『可是他對我常常是很有禮貌的，而她呢只是跟我一樣地是一個普羅列塔利亞特，卻要把她自己擡高起來。這是因為她只是近來纔變成普羅列塔利亞特的；在她的鄉村裏她是一個農民的女兒，而且……』

『你是個扯謊鬼，』福基娜咆哮着。

『她的父親僱用勞動者；他是一個榨取者。當他們建設了集合農場的時候，他就想出投機的勾當而成爲非富農化了。』

『完全是扯謊！』那興奮的福基娜叫起來。可是那肥胖的杜尼亞站在那兒，表現着體力和康健。她長得太粗大了，衣服是十分貼緊的；在她的襪子和裙邊當中，我看見了那些強壯的，紅色的股肉擠出來。因為她把私人口角和階級戰爭連結得那麼巧妙，使我猜想，也許事先她曾經受過那位學生一番教唆吧。不，那是可以不必的；像這類的事情大家都知道。

現在那勞動階級的學生築起了他的堅固的壁壘。

『在別的房子裏，』他陳說，『這件事會沒有甚麼緊要——只是一個女人們的吵鬧而已。』

是在我們那兒是不同的。有一個外國記者常到我們家裏，對於我們文化的退後，她會得到一種甚麼樣子的印象呢？我相信這樣的口角，在德國是不會有的……」

我幾乎嚷出了幾句話，但是那就不合時宜了。無論如何，我個人的提起，好像對於杜尼亞的幫助是極有效的，當那些法官退去商議的時候，我這樣推想。

「她當然會贏的，」一個有突出的鬍子和一雙紅的發炎的眼睛的農民說。「這樣爭鬧下去是不妥當的呀。那黨員的幾句話是多麼娓娓動聽呀！文——化——的——退——後，是的，很對呀！」

「沒有請你說話的時候，別把你的嘴插進來！」福基娜向他叫出來。「那不是你的事情呵！」

「那正是你弄錯的地方，小嬸嬸。法庭裏的案件常常是我的事情呢。不論甚麼時候我有了假期，我就坐在這兒聽了一件又聽一件。這個人這樣說，那個人那樣說，一個人常常不曉得誰是對的。比方，現在說「贍養費」這個字罷；那是個美麗的字眼呀，我就非常喜歡講到牠。好的，剛剛在你的案子之前，我們就看見了一個婦人和她的孩子，又有個農人，他們向他要求贍養費。他說：「是的，但

這件事怎樣發生的呢？我喝醉了。」他又說，「所以我就沒注意到她怎樣有了個孩子的。」可是她——呵，她是一個狡猾的傢伙——她有一個證人伴着她，而且那女房東又同樣可以做見證。「請你繳款吧！」那判官說。「減輕一點都不行！繳清！」是的，那就是審判；審判總有兩方面的。如果他是喝醉了的，那孩子也無法可想；誰都可以說「我是喝醉了的，那麼再會吧，我的親愛的！」啦！」

幾個人開始大笑。那農民好像受了忤逆似的。「有甚麼好笑的呢？」他問。「文——化——的——退——後。」審判是一件不能糊塗的事體而且需要一點理解的。是的，牠是在這樣做，我的好朋友。」

在這個時候那判官又走出來。法庭裏立刻就沈靜下來。大家都傾聽着那正法官的話語。

「法庭宣判女市民福基娜犯罪已有證明，判繳罰款二十五盧布。」

「怎樣已經證明？」安娜·亞基莫夫娜從她的位子跳起來。「誰證明了？法庭不公平呵。黨裏面那個傢伙向法官丟眼色，那麼她就說「已經證明」了。」

「不要吵鬧，女市民，走開。不要阻撓法庭的公事。下一件案子！」

「你說已經證明了！我要告訴我的丈夫！他會向最高法院上訴的。他會在報紙上寫，你坐在那兒說我的罪已經證明了的事。我要去問加里寧看他怎樣說，看那是不是應該的，那些康民主義者讓娼婦在家裏洗澡，隨後法官就認為我的罪狀已經證明了……」

「女市民福基娜，要是你再不停止，我馬上把你趕出去。」

「你要走啦，小嬌嬌；你聽見她在說甚麼，」那農民叫出來。「你不要妨礙我們的事情吧，你的官事已經打輸了！我們離開審問杜尼亞的案子的法庭，她的臉孔露出她的得意和歡喜。她覺得她自己是當代的一位女英雄。」

「一個非常好的女孩子呵，」馬利亞·彼得羅夫娜批評道，「可惜得很，我們不能再留她了，因為她要進工廠去。她是最後一個請求加入我們的工人學校的人而且正在學習着要做一個機師。自然，她們是很對的，家庭的瑣事可以斷送她們的前程，而且使她們自己沒有發展的機會，可是像我們這些在舊時代裏已經弄壞了的主婦卻是無法可想了。」

「使我驚奇的是大多數工人的妻子都僱了傭人。」

「是的，她們一定要僱人，因為她們在外面做工，而且她們覺得僱用一個女孩子更是容易的事，因為她們可以供給她的住所——在她們，一個房間裏多一個或少一個人是無所謂的。在智識份子方面當然是不同的，因為在一些新房子裏是沒有女僕的房間的……」

「那麼你以為這問題怎樣纔能解決呢？」

「那全靠我們的「社會的規模」的發展。有了好的會食堂，託兒所，和我們新房子裏所有的熱氣管那麼個人的家庭會逐漸地給集體的家庭代替的。當然那是一個很長的過程，不能說是一旦可以完成的，可是即使在如今，還有一大部份居民不在家裏過空閒的時候的。那些男人寧願帶了他們的妻子和兒女到他們的俱樂部，或者公園裏，去找知識和娛樂，在那兒，父母把兒童們丟在一個特別運動場，便走開去娛樂他們自己。」

因為我們現在已經到了馬利亞·彼得羅夫娜的門口，我要向她說再會，但她堅持着留我吃午餐。路得美娜·麗柯拉芙娜和我們一起坐下，但是什麼都不肯吃，因為她已在墮胎食堂吃過了午餐。

這個食堂的奇怪名字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我後來問到路得美娜·麗柯拉芙娜在一個墮胎院做工，在那兒，未來的蘇維埃公民被遣送到另一世界裏去。我曾經聽見過墮胎在蘇聯不是合法的，而且這種手術是在公共醫院裏由醫生舉行的，可是我很高興親自到內面去看看。

『如果你有工夫，明天早上到醫院來找我，』路得美娜·麗柯拉芙娜說。

在蘇聯，要看甚麼對你有興趣的東西是比在我們本國容易得多的。雖然每個人都是非常之忙，可是他們並不以為向一個作者指示和解說一些東西是徒費時間的。

八月十日

我感到這樣不安，我不能把自己振作起來為甚麼路得美娜·麗柯拉芙娜要帶我進手術室呢？

從一些階梯，我走過了應接室的門，那兒有幾個婦人等待着。在牆上有光鮮的彩色的印刷品，下面寫有註釋的。在左邊牆上是一些外科手術的圖，附有註釋說明病人怎樣不能聽見或看見任何

東西；在右邊牆上有一張各種避孕方法的掛圖，那註釋說明牠們的應用方法。在後面牆上有許多玻璃箱子裝着每個發展時期的胎兒；牠們更大些，就更好看些。門上面是一條標語——所有蘇維埃的公共場所都有標語的——『讓這回墮胎是最後一次吧。』門旁邊坐着一個矮小的中國婦人，她正在患病用手帕掩着面，更前面一點，有一夥婦人在談論懷孕。

『你要檢驗麼？』那姑娘問我。『那麼請你到更衣室去，再……』

『不，我沒害病呀，』我急忙地說。（多蠢！我突然想到。把懷孕說成好像是一種病痛似的。）『我要和醫生路得美娜·麗柯拉芙娜說幾句話。』那位姑娘報告我的訪問去了。

『那沒有甚麼事的，』有一個女人說。『貧血症也會那樣的。有一次我想我是墮上了，可是也沒有甚麼。』

『是的，可是那發抖的痙攣呢？我從我的前兩個孩子纔知道的。最初我以為受了寒，便喝了覆盆子茶。後來我就曉得。』

『發抖；我從來就沒有聽見過。在我呢，牠來的時候……』

「路得美娜·麗柯拉芙娜要見你。」那姑娘把通到診症室的門打開了。

路得美娜·麗柯拉芙娜穿了一件白的套衫，使她看來更年輕些。那兒還有另外幾個醫生，許多病人站成一排的等着他們。病人們把自己脫得精光，一點不覺得難堪，一個個順着次序躺在檢驗牀上，俄國人的羞恥觀念是很強的，不過，那只是男性方面纔有的。

「兩個月了，」一個醫生冷血地估量道，把她的橡皮手套扔進水盆裏。她檢驗過了的那個女人沒有甚麼情緒表現出來。

「你來得正好，我的親愛的，」路得美娜·麗柯拉芙娜招呼我。「我馬上要到手術臺去；只是等着你。姑娘，給這同志一件套衫吧。」

在去手術臺的路上，路得美娜·麗柯拉芙娜向我解釋，在這醫院裏，只是爲了醫學上或者社會上的原因纔施行手術的。一些不能引用這些手術的婦人，仍有權利請一位醫生用私人的手術將她們子宮的果實割下來，不過那樣一來就是花錢的事體了，可是在這裏，她們付出手術費，和三天的膳宿費是很便宜的，並且按照那女人或她丈夫所賺的薪金來加減費用的。

那些器具是在前面的房間裏消過毒的。手術臺是一個很大的房間，有鑲磁的地板和粉塗的四壁。在這兒我們看見現代的衛生逐漸在代替着過去的種種的荒謬；那便宜食品和醜陋內衣的酸味，那謹慎地一開一關的門，與一個肥胖而骯髒的產婆作低語和絕望的磋商，那一個扯爛了子宮和一個躺在搖床上流血到死的女人的荒謬事體。

那些病人穿了長的白袍子走出來；她們看來好像古時的基督教的殉難者，正要被拋到獅羣似的，但是她們不唱讚美詩。說來奇怪，她們並沒有特別表示恐懼和興奮，因為在這裏她們的團體產生了一個很好的效果；她們曾看見一些同病者從臺裏擡出去，而且聽見她們說『並不那麼壞。』她們知道只要幾天工夫，她們就得康健地離開醫院的。施手術會致死，實際是不可能的事。

那些女醫生是異常熟手的。用一些長的，笨鈍的傢伙便把那子宮撬開了；血流出來病人呻吟着。隨後開始挖掘的手續；那些金屬的夾子從那女人的身體裏鉗出些流血的肉塊。這裏，自然的殘忍在那種令人難堪的方式內顯示出來，……然而，到底人類的意志是比物質更強些。今日的婦人是她自己的身體的自由管理者，當技術和教育更加進展的時候，她會有一種方法能夠調節她的

性生活，而使這些手術成爲不須要的吧。

接着，一位身材寬大的大家庭的可敬的母親之後，便是一個十八歲的年輕女子躺在那兒。她的黑頭髮散亂地貼在她的濕的前額上，她的全身因痛苦而顫動着，而她的呼吸就變成哭泣了。

「呵，可愛的，」她突然叫出來，「你不知道牠是痛到什麼地步呵！」

「只要一會兒，我的親愛的，那麼我們就可以弄完了，」醫生撫慰她說。

那主任醫生走到臺裏，招呼我而且問我是否喜歡那種手術。我驚詫地凝視着她。

「喜歡牠！你真的能够說「喜歡牠」麼，你這開心的人？」

「她是比其餘的病人更沒有經驗的，」一位拿着一把鏡子而且爲醫生傳遞器具的年輕助手笑了。那主任醫生露出不高興的臉色。

「跑進去我們的博物院去看看那些江湖醫生和庸醫從前在婦人的身體上用過的桿棒和鉤子吧。在外面他們仍然是用那些東西——你就會曉得我們的墮胎院是多麼幸福的。」

「可是爲甚麼你不給那些女人一點麻醉劑呢？」

「那麻醉劑的結果常常是比手術不舒服多了……而且牠只能經過幾分鐘的時候，我們的醫生是那樣的。」

「到這兒來，我的親愛的，」路得美娜·麗柯拉芙娜喊道，「看看這個病人吧。她曾經生過幾個孩子了，這在她是不算一回事的。只有第一次纔是十分痛苦的。」顯然地，路得美娜·麗柯拉芙娜很明顯地怕我會得到一個不好的印象哩。我走到那位對施行手術所謂不算回事的女人那兒，她帶着一種攣痠的表情躺在那裏，當醫生問她曾經有過幾個孩子，在那兒做工等等的時候，她吃地答着：「在施手術的當兒她要求我同她談話哩，」路得美娜·麗柯拉芙娜說。

「我能够看看那些病房麼？」我詢問。

我被領到一個房間，那兒三個女人躺在鐵牀上。另外一張牀是空着的。有一個戴着眼鏡的女人在看着「列寧格勒真理報」。我不曉得該同她講些甚麼。

「你是醫生麼？」問我的是一個有鬚髮的年輕女子。

「不是的。」我說明我的姓名和國籍真的有一百次了。所以如此，我不只是爲要證明我自己，

而且因爲『外國人』這個字對俄國人有一種奇怪的效力。牠使他們成爲高興說話的人；有的開始讚揚他們國家的事業，有的講出一些令人髮聳的故事。但在蘇聯住過幾個月了，我是應該和他們討論一些事件的。

『真的？你是一個外國人？』一個有紅而圓的臉子的婦人估量着說；一塊乾淨的白布纏繞在她的腦袋上。『你們國家裏也有許多墮胎的割治手術吧？』

我解說：這樣的手術在資本主義的國土裏是禁止的，所以，惟一的統計只有因牠致死的統計。無論如何，那些數目表示只在德國一國，就有無數的女人是因觸犯德國刑律第二百八十八節的結果而遭慘死的（在奧大利是一百四十四節。）

『中產階級的女人要付出一大筆手術費哩，』讀真理報的那位女人加上說。

『你自己已經有過許多次的施行手術麼？』那有鬚髮的鹵莽的女子問。

我裝着並不懂得那麼多的俄國話。

『我曉得一個女人，她在七年裏割過十次，』在角落裏的那位女人說出來，『但她的丈夫是

一個猶太人。」

「那有甚麼關係麼？」那髮髻的女子問。

「當然咯！猶太人是那樣縱慾的……」

「哼，我卻有過非常不同的經驗，那圓臉的女人反駁她。『他們能够整晚地談個不休，所以他們能够，可是……』」

「同志們，這是取甚麼一種態度呵！那眞理報的讀者把報紙放在一邊。『那是關於個人而不關於他的國籍的。這種反猶太人的意見……』」

「爲甚麼是反猶太人的說一個人是縱慾的並不是一種侮辱。」

「或者說他不是縱慾的。」

「你們所說的區別真的可笑哩，同志們。」

「我沒有甚麼反對猶太人的，」在角落裏的女人說。『我的丈夫是一個猶太人，而且如果我不是得了療治的話，就有十一個孩子了。一個房間和十一個孩子！我們是這樣過慣了日子的。當我』

害病的時候他常常需要牠。」上帝恕饒我，你簡直是一個豬呵，比得洛維支，我常常對他說這話。「你不能够再等兩天麼，我的親愛的？」他說「我正在這個時候渴想牠」每一次我都確實知道，那又是施行一次手術的意思。」

「哼，你是一個傻瓜呢，傑拉西莫夫娜，」真理報的讀者批評道。「處於你的地位，我會叫這個比得洛維支滾開的。」

如果你叫他滾開，他就要跑到別的女人那兒去呀。

「你不要爲了他做那件事，因而破壞你的健康。你能够有許多男人，然而健康只有一個呢。」

「是的，一個人像你這樣受過教訓的就行了，里芙姬娜同志，可是我們這種……」

「我像你一樣的只是一個勞動的女人，但是我用我的腦筋。醫生同志，」她轉向路得美娜，麗柯拉芙娜說，她剛剛走進來，「沒有誰能够作一次演講來解釋這些東西麼？」

「關於女性衛生今天晚上有一次。」

「那不只是衛生呀。女人們在她們和丈夫的關係中間需要一個指導的方針哩。她們有許多

因爲沿着那老法子而毀壞了她們的康健的。」

「那是一個好意見，里芙姬娜同志。你認識一個長於演講的人麼？」

「我要問問工廠裏面。有一回我們找到一個非常有經驗的男子，在我們女人一個集會裏演說過這個問題哩。」

她們不再是醫生和病人了，只是兩個同志——因爲她們在努力着指導和教育別人的。

「你在那兒工作呢，同志？」我問道，當路得美娜·麗柯拉芙娜翻轉那鬚髮的女子的被褥，撫摸她的肚子的時候。

「我是在蒲提洛府工廠的耕種機部的。」

「甚麼，你也是在甚麼廠？」我感到好像碰到一個女同鄉似的。

「在舊式耕種機廠裏。」

「我從來不曾到過那裏。以後你一定要來看我一次呵。我在新式耕種機廠作工，在監工的辦事處左邊那一部鑽孔機那兒第五組。」

『好的，我以後要去看你，』里芙姬娜說。我們握了手。我和這些女人的談話已經塗抹了我在手術臺裏那些難受的經歷。但當我在電車裏的時候，牠們又回來了。

『你對於我們的醫院得到一種甚麼印象呢？』路得美娜·麗柯拉芙娜問。

『我發了一個永遠守貞的誓。』

那醫生顯然地不高興起來。『我的親愛的同志，你是太主觀的了。』

『你們醫院在社會意義方面自然是很可欽佩的。我是說你們是很能幹的，用一種衛生的方法來處理這些事件。可是這種事情的本身……唔……』

『你並不以為我們是些贊成墮胎主義者吧，可不是我們的政府是用所有可能的方法和牠抵抗着的呢。』

『你不是想告訴我，蘇維埃政府在反對着墮胎正正跟我們的政府一樣厲害的吧？不可能的！』

『那是當然的，不過用的是別的工具。用一種母性幸福的永久的計劃，用許多託兒所和幼稚

園，用一種居住問題的解決方法。普通是經濟情形驅逼那些女人到墮胎手術那兒去的。但是我們能够多想點法子來減少墮胎醫院的就醫的人數，靠提高生活的標準和鼓勵避孕法的利用，卻不靠甚麼犯罪法的幾多條節。無論如何，誰能够大膽去強逼一個母親生小孩子，在他不能安全地保障孩子們的生存的時候？」

「你去問那些資本主義的國家吧，我的親愛的路得美娜·麗柯拉芙娜，可是不要把我當作和他們一樣的呵。你們國內的人老愛這樣做的，因為他們是那麼喜歡辨論的同時高興去把他們的對手找出來。」

那醫生微笑了。「我很對不起，可是我要走了。今天你要去看馬利亞·彼得羅夫娜麼？」
「我沒有一定。我有點頭痛哩。」

我真地有點頭痛的。該怪那墮胎醫院麼？

八月十一日

我並沒有好些。反而，我的四肢都痛起來，並且我全身抖顫着。我不能不想那些在墮胎院裏的女人們。或者我感受了風涼吧。

整個早晨我躺在我的美國布沙發上面；我甚至連讀甚麼東西都不能夠了。大約在中午，我把自己振作起來，跑到作家飯店去。我在閱報室看見娜達沙她帶着鬱鬱不樂的樣子。「你猜猜，我的金寶貝，」她低聲地說，「爲了愛我，他要把孩子送到他母親那兒去，而我真地想不出怎樣再弄個托詞哩。自然這個麻煩正要在我只得到剩下的幾天工夫來弄完我那本書的時候，就會發生。甚麼時候我纔夠年老，而不要給這些男人騷擾呢？」年老——是的，那當然是色慾問題的最安適的解決。

當我又回到家裏的時候，我墜入了憊倦的睡鄉。十點半鐘拉芽叫醒了我。我喝了點兒茶便預備到工廠裏去。我的背部和臀部多痛呵！

八月十三日

現在我算是職務上的害病了；我得了一張醫生的證明書。如果我老早去過我們的藥房，我昨天就可以停工了。可是我弄錯了，跑到『助理醫生室』去要阿斯匹靈藥片，並且在一張橫椅子上面睡了一刻鐘，纔有力氣起來。我覺得好些；痛苦減輕些，我纔決定到工廠藥房裏去。我看見那兒已經沒有病人，只有一個年輕的人，帶着一付蠢笨但是狡猾的農民的臉孔，滿頸子的瘡癩，惹得看護婦非常生氣。

「我知道你曾經拿開過那綑帶的。我曉得，因為昨天我把牠縛上去，完全跟這不同的。」

「告病假是愜意的呀，」那醫生發感嘆道。

「可是向你保證，醫生同志……」

「你不要保證甚麼吧，我親愛的孩子。你不是第一次呵。如果明天我看見你動過這條綑帶，我要和你的管理人碰頭的呀。」

「甚至不能讓一個人害病的呀，」他咕嚕着，一面穿上他那油垢的護套。

「你又有甚麼病呢？」這問話不是用一種很友善的調子問的。我講出我的症候。那看護給我

一枝溫度表。

靜寂，打破牠的只有在我像是高聲的時鐘的滴答聲，和外面機器的隆隆聲。那醫生一頁一頁的檢閱着她的診症簿。她是一個矮小，肥胖，莊重的人；從她的白套衫下面露出一隻講究的高跟鞋子。她頸子上面，剛剛在她的衣服的洞口之上，有一顆痣。『她結了婚麼？』我猜想。『自然的。第一因爲每個人在蘇聯裏都是要結婚的，而第二呢，這些有痣的女人永不會獨身。她一定對待她丈夫，也用她剛纔向我表示的，那同樣的謙恭的吧。那一定是，』米沙，拿我的外套來，』和，』米沙，把那本書給我！』

『把那溫度表給我，』她命令了，沒有轉過臉來，而且恰好是用我幻想過的她對她丈夫說話的那種調子。

『三十七度。一點也不高的。』她譴責地把我望了一眼。

『看吧，同志，』我堅持地說，『我是一個志願工人；我不是靠着在廠裏所賺的東西的，那麼，所以我沒有理由想來愚弄你了。我的熱度或者因爲我吃了阿斯匹靈，便降低了的吧。』

「你爲甚麼吃阿斯匹靈呢？」她語調較溫和地問道。「我現在不能給你證明書。照章我們至少要在熱度三十七度三的時候，纔能够發證明書的。我可以給你一片阿斯匹靈，明天清早把牠吃掉，要是在當天你覺得更壞些，就跑去你的區藥房，向那兒要一張證明書就是。」

那是惟一可能的解決了，因爲牠是在一點鐘就關門的，同時，那是證明我是搭不着電車的。我不能夠走回家去；那必得花我半天的工夫。

正在我扭轉門的把手的時候，那醫生把我喊回來。她眼睛裏有一種較溫暖的閃光，當米沙迷戀她的時候，她是這樣望着他的。那一定是七年前的事，當他倆正要到最后交換條件的時候。

「你的雨衣在甚麼地方買的？」

「那是一件英國貨。」

「呵。轉過來瞧瞧。很漂亮呵。」

那看護從化驗室走進來，看這件外國雨衣。

「唔那麼，你明天一定要去藥房的。」那醫生嚴肅地說，便又俯身在她的診症簿上面。

我趕快地回到工廠。額頭上有點輕微的汗。現在我覺得好些，而且我歡喜我可以繼續地做工；或者索羅維奧夫快要旅行回來，而明天一早就會到工廠找我的。親愛的維克多！如果我禁止我自己來常常想你，那只是因為，我要拿我全部力量來防止自己，不要於你需要於我之外給你更多的東西。我並不需要把我自己為你弄成太平易的。

我的工作進行得很好，但在清晨的時候我覺得發熱，而且我的四肢開始又痛起來。屈身在那些檯檯上面，幾乎成爲不能忍受的了。我關好了那部機器，趕快跑到盥洗室，爬上臺子上面。我只想在那兒歇十分鐘，但當我回去的時候，那韃靼女人正在掃着周圍的地。我一定已經去了一個鐘頭，可是好像沒有一個人曾經注意到我的缺席。我想起了那佈告欄的命令：『把那些偷去了的鐘點還給國家吧。』那時候加泰雅走過來，站在我的機器旁邊。

「在早班的第一天，我們有一個「星期六」呢。你參加嗎？」

「那是甚麼？」在這兒，一個人是繼續地聽着新的事情的。

「那是我們做給工廠當禮物的，自願的額外鐘點呢。鑄廠裏有許多廢物，要收拾收拾的。」

「你們要做幾久呢？」

「大約到六點吧。」

「如果那時候我好了，我當然要參加的。」

在我的腦袋裏有一種警警聲；我簡直好像在一種半意識的狀態裏動作似的。要睡覺的願望超越其他的一切，而且使我把任何事置之度外。我向瓦利亞說了一聲非常冷淡的再會，她正要到一個休養院過她的假期的，我並且覺得即使我馬上看到維克多，也不會關心哩。當我發現我自己終於躺在我的美國布的沙發上的時候，那是一種幸福的安適。

維拉把我的中餐送給我，我是在公共住宅寄膳的，並把我們的工資的一半作為牠的費用的，但是，直到現在，對於那位丹尼亞嬸嬸私人的烹調藝術我還沒有知到多少。俄國人只有在充量地供給肉和油的時候纔能夠煮得好的。不管她的家庭小到怎樣，一個俄國的主婦一次決不會買少過一磅的肉，因為在烹調藝術裏，她只表現很少的想像能力。普通俄國人對於生活的表面，是比我們不苛求多了；便利，舒服，好的食物和甚至好的健康，這些東西在他們幾乎好像是，並不如在我們

那樣重要的。

但那些歐洲人，居住在蘇聯裏面的，不久就開始在這方面改變他們的觀點。我注意到我的病痛在我像是多麼不重要的，同時我瞭解爲甚麼我們這公共住宅的其他的同居者，並不爲我而特別關心。他們何必呢？他們不是工廠的管理人；他們要唱歌，並且覺得聽他們自己的歌聲是一種需要，那麼他們就唱：『呵，爲甚麼，呵爲甚麼沒有愛情呀？爲甚麼只有些玩笑呀？』

不的，我親愛的同志們，這次在我那並不是玩笑呵。

藥房是開門開到下午八點的，我自己就和自己商量着，還是先去要張證明書來纔看病呢，還是反過來呢。覺得起身很困難，我便決定了走後一路。

但不幸地，我們公共的鬧鐘停了，所以我剛到藥房的時候，那最後的醫生正在收拾他的器具，而堅決地拒絕爲我的原故延長他的工作時間，因爲他以為我應該早點兒來到的。世界上沒有那兒像蘇聯那麼充分地灌輸教育的；戲院的招待，當排演已經開始的時候，拒絕你跑進大堂裏去；蘇維埃的警察，他用他的哨子停住電車，爲的要罰一個當電車開動的時候跳了上去的搭客一個盧

布他們是充滿了一種觀念；他們是在執行着一個文化的使命。那同樣的想法促醒了我的醫生，當他要走出門口的時候，對我所有的訴求和咒罵一概都不理會。

我像一個妬忌的妻子似地追在他後面，而且告訴他維也納的醫生對他們的病人是和善得多的，甚至當他們是一個陪審員的時候；講到他們的仁慈和小心我說得極其流利，他甚至並沒有轉身告訴我去維也納找醫生看去，而只是靜靜地向着火車站一直走去。我惟一的高興就是他找不到一個坐位。至少那是有點意思的！

但我覺得自己十分慚愧。在我的興奮中我真地已經忘記了我的疾病。我不曉得我的臉頰究竟是爲發熱或發怒而在燒灼着。究竟心理上的是從那兒開始，肉體上的是從那兒終結呢？我不能够擅自決定那一點。

我吃了滿碟的從中餐裏剩下來的冷黃芽菜湯，並且吞下了一調羹滾熱的稀飯。隨後我就出去到工廠藥房；這次我沒有甚麼麻煩地得到了我的證明書，而且在一點鐘的時候又回到住所。當我開了我們的房門的時候，我看見維拉坐在我的沙發上面，而柯斯提亞，我們的一個年輕孩子，躺

在地板上，他的頭放在她的腿上。

維拉正在高聲地向他讀着甚麼。他們兩個跳了起來，而他開始向我解釋，因為「曾經在我出去的時候用了我的沙發。」隨後他頰頰地迸裂出一大堆蠢話。我不能够說：「別介意我吧！」因為那就包括了我是在場的意思的。

現在我是躺着而且覺得像一袋穀那樣沉重。逐漸地一切東西消失在我的意識之外，只有一件意外事纏繞在我的記憶裏。我在一幅草地上躺着，在那炎熱的，正午的夏天太陽裏；圍繞我的昆蟲在嗡嗡吱吱地叫着。一隻蜜蜂繞着我耳朵營營地響，但是我不怕他……我有多大年紀了？或者十歲吧……我不能够記得準確……可是有一件事使我煩悶，而不能說出那是甚麼……我的思想徊環着像那隻蜂兒繞着這一塊黑暗的地方……呵，是的，我一定要回家吃午餐了，可是我沒有力量起來……那麼會發生甚麼事嗎？呵，是的，在我的證明書上面，牠說我明天要自己去報告，十五號，在藥房裏……吃午餐……而我不能起來……太陽是那樣熱……我喝了……我是這樣地不快活，一切的東西使我煩惱……我早已厭倦了我的廚子。那是誰說的哦，假使只要我知道了誰說

的，我一定可以好起來，不然我必定要死……正如一個神話裏所說的……如果你不能夠解決這個難題，你就要死。

我在睡榻上把自己安排好了，因為那樣我能夠死得更舒服點兒，以後我就不知道甚麼了。

八月十四日

維拉曾經打了三次電話到藥房去請醫生，但那號數總是有人打着。因為那天天氣暖和，而我的溫度已經降低了，我從床上起來而且走到附近一條街上的藥房裏。

在櫃檯旁，我接了一個號碼牌，和一張載有醫生名字的診票——醫生溫斯坦是在四樓上的。大約有二十個病人在走廊那兒等着，他們全是有給醫生溫斯坦看病的票子的。這位醫生成爲那些等着的病人裏面講話的主要題目，從那兒我聽出了議論的主題是一個女人。有的人說她是一個恐怖人物，她把那將死的人趕回工廠去；有的人卻頌揚她的老練和仁慈。

我注意到一個像很年輕的女人，有一付美麗的然而蒼白的臉孔和一雙大的灰色的眼睛，她

略爲站得離開別人一點兒。她穿的簡單的黑衣服，看來十分適宜。我在她的旁邊坐下，而且想開始一點談話，但那是不容易的，因爲她是那樣冷默的。她甚至不問我，我從那兒來的，我在那兒工作，我不是不是一個黨員，和我私下的病痛是甚麼。一種不暢快的人物。

我告訴她一些我自己的事情，想把她的話引出來，喏，你看！她轉到我這邊來。

「我的父母和我的兄弟和姊妹都住在外國——在巴黎哩。」隨後，看見我眼睛裏的無聲的疑問，她加上說，「也許你曾經聽見過L——王子吧。」

呵哈！一位舊俄羅斯的人物呵！當老世界的一些破壞的碎片，從革命的海洋裏突露出來的時候，那的確是一種震驚呀。

他們對新制度的反抗，在力量上實在可以令人驚愕；他們假裝一套保護色，但他們依然內在地沒有改變的。這位在蘇維埃政體裏長大二十多歲的姑娘，完全不被那把舊土地弄得顛倒混亂的颶風所影響；她堅定而且不搖動地站住，用她的兩腳植在一個並不存在的地面上，而且仍然不能察覺牠的不存在咧。

她的俄國話仍然是沒有被蘇維埃的日常生活的話語表現方法，被牠的新創造的短句和略語，被那從工廠，或者甚至從戰壕裏發源的簡括的粗話，所接觸過的。她嫁過一個中產階級的丈夫，他是被某個托拉斯所僱用的，並且她在這個夏天去看過她從前的產業。哦！那花園已經變成多麼荒涼的；沒有人去修剪那些樹木呢。在這房屋的一邊，村蘇維埃建立了牠的總部，他們沒有一個人會關心到這些東西上面。他們已經把那音樂廳改成電影場……是的，他們已經改了。

「第十五號」有人不耐煩地叫出來了。「第十五號在那兒」我跳起來。「再會，同志。我希望你……最好的康健。」

「你在白花了我的時候呀！」醫生溫斯坦向我怒吼着，當她嚴峻地從她的散亂的紅頭髮底下瞪着我。「你有甚麼病？」

「我得了感冒病，而且有熱。」

「你怎麼曉得呢？」她的聲音是嚴厲的。

「開頭我覺得是，後來他們在工廠裏探出了我的熱度的。」

醫生溫斯坦從一個裝着一些美麗閃光的液體的玻璃杯裏，拿出一根溫度表給我。隨後她就用她的近視眼睛檢驗我的證明書。她是既不年輕又不漂亮的；她的過去的生活一定有許多跟我們的工廠醫生很不同的地方。或許她在沮力克讀過書，而偷運了不合法的著作到俄羅斯的；在她的分娩不久以前，她和一個同事結了婚，而她的兒子是一個少年康民主義者，他用她的洗禮的名字稱呼她。因為沒時間，所以她不能常常見他；當他們碰見了，他們通常是吵嘴，因為他們彼此都以他們的愛情為可恥的。

醫生溫斯坦伸手來取溫度表；當她檢查溫度表，發現真地有熱的時候，她的眉毛皺起來，——那麼我不是一個裝病的了。她在我的背脊和胸膛上；錐了幾下，便坐在她的桌子旁邊，替我開藥方。『在櫃檯那兒，他們會給你一點阿斯匹靈，睡在牀上使牠盡量地發汗；後天你再到這兒來，可如果你仍然有熱，找我就是了。』

『我的朋友今早也想打電話到藥房來呀。』

『她應該在電話旁邊等着，一直到打通為止。』

「我的肺有甚麼毛病麼？」

「沒有。第十六號！誰是第十六號？」

我一面走出去，一面聽見醫生溫斯坦向第十六號的冷肅的問話：「你有甚麼病？」

我把兩張毯子和那件外國雨衣蓋着自己，便覺得好像我是在一個鎔鑪裏似的。在我的四周一切都是很寂靜的，因為我們的年輕人今天都跑進鄉村裏那一個少年先鋒的營幕那兒去了。有個人在院子裏閒逛着，唱着，「買一件花布衫給我，因為一個康民主義者愛上了我。」

維克多從莫斯科回來了麼？我能够想像出他在工廠問起我，而法里雅便告訴他我是病了。他不曉得我的住址倒是一件好事情，因為他會到這兒來，而一個發着汗的女人是最不開胃的呵。會有誰來工作我的機器吧？在我的耳鼓裏好像聽見牠的隆隆聲……但牠逐漸地更低微更遠沈下來……我睡着了。

當我醒來的時候，那好像是快夜了。我聽見房屋裏的人聲。我的頭好像出人意外地輕了起來，我的寢衣緊黏在我的背後，我起來找一套乾淨的衣服，一個淡紫色的信封就掉到地上。當我睡着

了的時候，一位同志進來了，並且把一封從家裏寄來的信放在我的枕頭上面。

當一個人已經在這兒住了幾個月的時候，要和外面的人們通信那是非常困難的。那些花了我們外面的親友許多思想和時間的事情，在我們好像並不重要，而且我們有一種感覺，他們不瞭解我們這兒的生活。當蘇聯在國外是那樣不公平地受責難的時候，一般批評不僅根據那些立意捏造的消息，而且主要地，是從事情經過外國人的眼睛，就似乎不同的事實裏發生出來的。

但是這封信帶來了使我深受感動的消息。一個和我同年的朋友死在維也納。開頭我不能够確信牠；一個人竟那麼突然地從這個世界永遠消逝了，這好像是令人意想不到的。那對我是一種震驚，從那裏透露了另一種感覺——一種快樂的感覺；我沒有死，我在一張乾淨的牀上躺着，並且我的熱度已經降低了。

我一定要好起來！快點好起來！不要爲牠白花了時間！在中古時候他們常用『死的跳舞』的壁畫來裝飾那些宴會的廳堂。對死者的紀念呵！想想死亡，享受人生，飲酒和戀愛，飲酒和戀愛！今日的我們偉大地享受；在我們，那最高的快樂就是去創造一些東西。但是這種創造的快樂，從來沒有

像在俄國這樣普遍的。

「你醒了，同志？」維拉拿着一杯茶走進來。「你好麼？」

「好得很，謝謝你。而且我十分高興我沒有死掉。」

八月十六日

「好得很」當然是一句過分的話。我的溫度恢復常態了，可是我的頭卻痛得可怕。醫生溫斯坦以爲那是感冒的自然的結果。今天我最後一次去她那兒；我感到很抱憾；我將不再見她了。她給我明天的告假證明書；今天我試在頭痛時散步，可是我走不遠。我在院子裏坐着，坐在牠的唯一的那棵樹下；那些葉子已經染上了微黃的色澤。威爾達布在附近的沙裏玩着。院內的狗兒走過來，而且把那些用細草裝飾得很美麗的沙城踏倒了。威爾達布沒有哭，只是把狗推走，而且想向他解釋明白，他是做錯了。他對那隻畜牲說着甚麼呢？要聽懂威爾達布的俄國話是困難的，但有一件事是顯明的：他並不把那狗兒當做一個破壞者，而只是看作一個沒受教化的農村分子。

八月十七日

自從我的病後，今天我第一次去了作家飯店。我很喜歡再看見娜達沙；因為她不知道我的住址，雖然她是懸念着我，也不能夠來看我。她已經『像她說得恰好的清算了』她的威廉梅思德所以現在又十分快樂。

我告訴她，有一個相識的人不久就要從維也納到這裏來，並且可以給我帶點東西；有沒有甚麼東西她高興要我替她辦的？她回答說她現今不需要什麼；如今她只是需要在外面憩宿，洗一個澡，並且用新的力量開始一個新的生活。她提議我應該參觀一個兒童藝術學校，我們便約好後天到那兒去，因為明天，在我第一次回廠工作之後，我一定是太疲倦的了。我的頭痛停止了，但我仍然覺得十分疲乏。

八月十八日

又回去作工。又一次，我和那油味，那隆隆的機器一同在那光明的工作場裏面。聽到那單調的隆隆聲使我覺得很舒服！

今天有一個特別漂亮的男孩子在那部磨光機旁邊。因為我們人手不夠，所以只有最重要的幾部機器在尋常狀態之下繼續做着。當牠們是「空機」的時候，管牠們的那些男人就去掌管別的機器。那部磨光機就是那些乾兒子之一，通常牠是給一個美髮的，在彼得河府和我們一起的人看管的；我們在同一的節拍裏工作着，因為他磨光一根槓桿和我把槓桿鑽洞所需要的時間，大約是一樣多的。一根根的槓桿他拋給我；我把牠們弄好了，便堆在地上。

可是另一個男人工作得像鬼那樣快；在沒有確定把槓桿刨去幾多之前，他完全不須要甚麼計算的。他只要把牠轉進去——像閃電般快——便開動那部機器；在旋轉了若干下之後，他又把牠停了，呵，你瞧！那根槓桿的厚度是剛剛合適的。我用羨慕和讚美的態度注視着他——那確是一個金屬工人，在他自己的事務上差不多是一個「專家」呢！他是鐵器的主人和支配者；他正確地曉得了怎樣去管理牠，因此牠服從他。等着我的機器的銀色槓桿逐漸變成一大堆；那傢伙向這邊

一瞥，把他的機停住，便點起一根香烟；那惡漢在等着我呢。我感到極度的煩惱；那一根香烟就是一個武士向別一個武士作爲單人決鬪的挑戰而拋下來的一隻手套。我接受了牠，並且發現一些妙法來加快我的工作；我當鑽着那一根槓桿的時候，就計算好了這一根，而且又把另一根預備放進機器裏，這樣輪到牠的時候我可以不用耽擱地放牠進去。隨後我開始放鬆螺旋，在鑽完之前，那又另外省去我幾秒鐘，這樣我努力趕上那個磨光匠。最後我不停地開用那部機器，所以牠的輻射器不必停止。

好一會兒我繼續地改善工作來節省時間。隨後突然地——我一定是把牠放鬆得太快了——那槓桿開始在螺旋鉗內跳來跳去。我聽見一種熟悉的磨擦，軋軋的聲音，同時一塊鋼的厚片子，看來好像一隻割斷了的人的手臂，在空間裏無知覺地旋轉着，其餘的一半在原來位置裏停留着不動。

我沒有法子而且失望了。當你在一部機器上做過一些時間以後，你就會開始去想牠，把牠當作一種比人類更精密或者也更堅實的活的東西。牠並不向你表示甚麼顧慮；牠對任何錯誤或者

疏忽，只給以鐵面無私的回答，但是，如果一個人小心地而且愛護地對付牠，牠卻像一個小孩子那樣柔順，並且在絲毫的地方都服從你。

那長頭髮的工頭走過來了；我把那兩塊碎鋼給他看。「同志，我弄碎了一把鑽子，」我說。

他沈默了一會兒。「到貯藏室去另外拿一把來吧。」最後他說了，並且他在那張從他的背心袋子裏抽出來的表格上開始填寫。我瞥見一項條目：「弄壞的原因——惡意，不小心，工作太快。」他將在那個字下面劃條底線呢——不小心還是工作太快？可是他三項全沒有劃線。

當我從貯藏室，拿着我的新鑽子回來的時候，我看見維克多站在我的機器旁邊。那是我的壞運氣，他老是在我做了些傻事的時候趕到的。

「我已經弄碎了一把鑽子，」我陰鬱地說出來，一面我開始把新的裝好在適當的位置裏。

「你覺得不大舒服麼？」有一種親切的，深沉的調子在他的聲音裏。「你是病了很久麼？」很久！我只告了六天假罷了。但接受這樣的同情卻是令人快思的。

「我對於那件事一點都不知道呢！我昨天纔跑回來，便聽說你是病了。我剛接到了一些戲院

的門票；梅葉荷德的戲班在這兒表演呢。」他疑問地望着我。「你高興去麼？我得到的票子是，二十一日的——你的休息日的。」我能夠領悟他的不安，可是不能夠說，到底是由於破碎了的鑽子的煩惱，還是由於他私下的情感。不論如何，我也是感到不安的。

「維克多·米歇洛維支，」我請求他，「現在請你走開。當你望着的時候，我不能感到有充分的自信力再開始工作。」

我以為他會像平常一樣，用些調笑的句子回答我的，可是他的態度變得更困惑了，並且他匆促地回答了，「是的，自然的，我要去了，自然的，自然的！」

「那麼我怎那拿得到我的戲院門票呢？」我囁嚅地說。

「我——我今天會把牠帶給你，」是他的囁嚅的回答。我們是兩個甚麼樣子的獸子呵！

我重新開始作工，而且注意到那有豐富的頭髮的工頭，從他的坐位裏用一種母親對着她的在水邊玩着的小孩的神情來伺視着我。但現在我放棄我的愚蠢的競爭，並且更小心地工作；仍然，我自己滿是得意的，當着數槓桿的時候到了，因為我已經比我平常的成績，超過二十件了！

八月十九日

我們今天舉行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中午集會，那時候我們討論斯大林計劃的演說。在那些黨裏的負責同志跑進來工場裏，叫道：『全體同志請到後院裏去！』之前，我們的機器已經停頓了。

我和法里雅跟加泰雅一起走出去；我們帶了我們的茶壺和夾肉麵包，坐在近着鎔爐的那些鐵條子上面，便開始討論那梅葉荷德的演戲。加泰雅，她看過牠，告訴我們那是那些智識階級的劇本之一，根據拉狄克的批評，現在牠人不會使甚麼人發生興趣的。從那劇寫成的時候，到牠在書籍中舞臺上出現的時候，其中的時間，一定經過了一年的光景呢。

在蘇聯的急速的生活裏，一年是一個長期間哩。雖然作家們是拿那最近時事的材料做他們的主題的，然而文學是追趕不上生活的。可是，那本『利益的清單』在頭一晚上，所發生的刺激力，在日報和定期刊物裏對於這部劇的廣大的通信，以及各種各式的人們的繼續的談論，這些證明了那位女演員拱查洛瓦是有充分的時事性的。

娜泰芽和一個演說者一起出來了，那演說者原來就是維克多。我們大家坐在舞臺上和橫樑上，好像一個家禽欄裏的一羣雞似的，可是當一些人，不肯離開她們已經坐得很舒服的後面的鐵欄杆時，也發生了一件小小的事故，因為舞臺上已經沒有餘地了。『我們要站着來喝我們的茶麼？』她們問。『那些衝擊隊的姑娘們已經把甚麼地方都佔滿了；她們顯然是那樣想，像我們這樣的人站站就滿好的咯！』因此法里雅，加泰雅和另外幾個黨的負責份子，就站起來，把位子讓給那些埋怨的人們。

維克多首先對他的題目給了一個歷史的評論。在沙皇主義時代，他告訴我們，那些專門技師和管理人的薪金，對那些用手的工人們的低微的工錢，是那樣地超出比例的——正如牠們現今在資本主義國家裏一樣——所以在革命以後，必得要努力使這兩個階級的收入平等起來。但那些時代已經是過去了，雖說我們還沒有生活在社會主義的年代裏，那時候，一切應用的生產品會根據工人們的需要，而散給他們。現在呢各種的鼓勵仍然是必要的，所以，我們的責任是要向那些對生產目的最有用的同志們，確保一些較好的生活條件，結果，那工金的比例仍然會分成等級的，

而那最好的衝擊隊員會得到現金的花紅。

維克多不做聲；娜泰芽問誰要講話，但大家都保持着沈默。俄國的工人沒有金錢的觀念的；他很少浪費和借貸，而且他的需要是最驚人地適當的。我們的蒲提洛府的人們認加速生產是一件光榮的事體，而不把牠當作增加工錢的一種手段，同時我深信，他們大部份把現金花紅，看作一種特殊的標識。

提出來的第二點喚起了更大的興味，因為牠是講到反對不負責任的運動的。維克多告訴我，斯太林曾經為一種加速生產的目的，介紹了連續的工作週。可是那斯太林格勒的耕種機製造廠現在卻實行了一種六日星期制，全體工人並有同樣的休息日。主張摹倣他們的榜樣的提議引起一部分的反對。

一個年輕人問那是否要失去我們的第五天休息日的意思。「那麼，如果我們這樣做，」一個婦人說，「我至少要像我的老傢伙一樣，在那同一天休假的。」雖然維克多告訴那年輕人，新制度一定是要跟着工作時間的減削而來的，但他依然提出反對。

提出來的另一點是，貯藏室管理人常常發出一些損壞了的工具，並告訴那些領受的人，牠們是原樣地由那些上一班的工人交回她的。要在一班放工的時候，把那些交進去的工具，完全精密地來檢查，那自然是很困難的；許多工人確知這一點，便對於報告損壞有意地隱瞞了。無論如何，要是照史珂洛霍特工廠的辦法，那些下班的人，直接地將工具交給上班的人，那麼事情自然是不同的。我想要聲明這一點，但是等了那麼久，娜泰芽就宣佈時間已到，而且把會散了。

當每個人都起來了的時候，我走到維克多那兒。『我還有一個提議呢，』我告訴他。

『是的那是甚麼？』我告訴他，在史珂洛霍特工廠裏應用的辦法。

『那是非常好的。爲甚麼在會議裏你不把牠提出來呢？』

『我一下子沒有想到，並且……』

『一個人必定要訓練自己想得快些的哩，同志。寫下你的意見，並且把牠放進壁報的信箱裏去吧。』他表現得一點兒忸怩的痕跡都沒有。他又是那個實際的，有自信力的男人。他的內心已經同我分離了麼？從他的黑色的托爾斯泰襯衫的上面袋子裏，他抽出一張光亮的紙張，把牠交給我。

「你的戲院門票。別忘記——後天，八點鐘。我們在那兒見面吧。」他一面微笑，一面和我握着手，我心神愉快地趕快跑回我的機器旁邊，緊抓着那張票子，緊得像一個孩子抓住他母親給他的第一枚錢，當他的母親要把牠拿去買東西的時候。

我在電車裏得到一個最不常見的經驗。那次車子很滿，像牠平常在每次下班的工人出來的時候一樣；我是站着，拉住一條皮帶，擠在人們的身體中間的，那時候我和一個工人交換好意的無禮的舉動，他的面頰是繼續地被我那紅髮帶的尾端輕刺着。那輕刺妨礙了他，當他已經把他的英文法書在他的鄰人的肩膀上放好了，而且一心在變用動詞「*so*」的時候。

突然地我聽見從下面來了哼的一聲，望下去，第一次就注意到我的一個膝頭，被擠到一個年老但是嬌小玲瓏的女人——一個「雅致的太太」——像我們在奧大利應該這樣稱呼她的——的瘦腿中間去了。她真是一位太太呢，她忿怒地轉過來，朝着坐在她旁邊的朋友，用德國話說，「怎樣一夥粗人啊！如果誰向她們說一句話，「別鹵莽呵，我的太太，」就是你得到的惟一的答復！」

她的聲音和外貌是可怕的。工人的忿怒和這種冷酷的，嚴肅的憎恨簡直是比不上的。這是第

一次，我在蘇聯裏碰到這樣赤裸裸地現出真像的例子；我所碰見的舊世界的代表者，全都是留心言語的。可是這位雅致的太太恨不得把我撕成小片——不是爲了我的膝頭推到她那兒，哦，天哪，不是的，只爲了我把一條紅髮帶圈在我的頭上，爲了我的手因金屬的污穢弄黑了，並且爲了我看來滿是愉快的而且滿足的。我俯身向她，帶着世界上最甜蜜的微笑，用德國話說：

「我請求你的原諒，太太；我沒有法子呢，因爲我被從後面推着。」

那老婦人的眼臉像一個受驚的鵝的翅膀般張開了。「我們不是講你呢，女市民，」她用驚嚇了的嗓子吃吃地說了。

在飯店裏我碰到那位白衛軍與狄帕斯的微笑的臉。「你知道斯大林最近的演說是講甚麼的嗎？」他問。

「知道的。平等待遇與不負責任的清算呀。」

他用手一揮，否認我的話。「不，不，我的意思是他關於智識份子說了些甚麼呵；他們是應該被更同情地待遇的。我很尊敬斯大林；他常常幫助我們這邊的。」

一個人多多施捨，總有許多人得到他一點東西。

八月二十日

讓那有本領的自由活動？『有本領的』這個字有一種資本主義的掘取金錢的意味。所以我們不如說：『讓那些創造的力量自由活動。』

我們多少的這種活躍的天賦的力量，給資本主義的那些鐵律破壞掉的呢？小弟弟偷偷地用一些船舶，機器，黑人——整個藝術的世界——的圖畫裝飾他們的書房的牆壁，而我們把他們交給鞋匠做學徒。有着水晶樣明亮的喉音和純粹的音調的女孩兒們，必定要一天天地縫紉着，直到她們的手指刺壞了。但是那些男孩子和女孩子在這里琳娜學校裏——依照藝術劇場那位著名的女演員的名字而取名的——經過了特別的試驗之後，就在那兒的名冊上登記下來。他們在他們的平常功課之後，一個星期有兩次兩個鐘頭的參加。

他們已經從他們的襁褓中長大出來了；那軟滑的皮肉在他們的襪子上發光。他們的舌頭開

談；他們的小鼻子流涕。他們同樣的是一些小孩子；那惟一的區別是，當他們在大廳裏圍成一個大圈跳舞的時候，他們能够合着音樂的節奏。

那是他們的第一課，所以沒有人告訴過他們要怎樣做的。無疑地這些小傢伙在他們的血液中有着節奏。願意地和歡喜地，他們跟着他們的教師的指導；他們頓着他們的小小的脚，蹲在地上，雙臂舉起來做成一道門，別的人在那上面跳過——一半在玩耍，一半在跳舞。

隨後就是圖畫科。那開頭的教授課程，大家全是一樣的；韻律的步調和繪畫是必修科。過一些時候，當那些特別的才能變得很顯著的時候，他們就考進音樂家，演員和創造藝術家等的各班裏去。

我們參觀這些八歲孩童的自由繪作。他們的題材主要地是從工業化和集體運動裏取來的，然而亦有少數從現在已經疏遠了的國內戰爭取得速寫的材料。有一個小孩子竟用外國事件來作圖；他的速寫告訴我們警察用他們的防身武器來攻擊一個工人們的示威運動，兩個警察和一個穿便衣的人（顯然是一個奸細）在一間房屋週圍潛行着。在那房屋的前面有一盞孤零的

街燈在這幅速寫裏有一個奇怪的、恐佈的環境哩。這個小孩子所寫的另一幅描摹一個農婦奉獻一個雞給一個鄉村的牧師。那婦人的屈膝禮和那牧師的不關心的神態，只用簡單的幾筆就給他忠實地寫出來了；我們這兒也許有一個將來的佐治·葛洛茲呢？

我在演講班裏看見了更年長的兒童。那也是他們的第一課。在棹子的一端的兩個女孩子開始交頭接耳，因此他們的女導師用她的鉛筆在棹上敲着。「孩子們，」她說。「我們必定要在最短的時間裏，盡量學得些東西，隨後就要讓出地方來給下一班的。國家爲你們的訓練而花了的錢，不要給他白費了，所以我們要把那糟踏我們時間的人，當作破壞者看的。」

以後就聽不見低語聲了。

這些萌芽期的藝術家的前途，完全靠着他們的才能。如果牠是適合的，他們會在四年的預備以後，會考進音樂的，創造藝術的，或者戲場的各種學院裏去的。如果牠是不適合的呢，他們會在他必須工作的工廠或商店裏，做牠的藝術班的領袖。他們在這兒吸收的藝術原理的完全知識，將來會結束那淺薄的耽美主義。在二十年之內，蘇聯的藝術世界會將牠那些不完善的份子一概肅清。

這些工人們的兒女將要貢獻給世界多少東西呵！

八月二十一日

「一匹野馬能够找到方法

來咬碎那綁他的繩扣？

我的愛人今天能够這樣膽大

來把我的愛情擺在腦後？」

雖說梅葉荷德是蘇聯最有趣味的奇觀之一，但當我換衣服預備去戲院的時候，我必須承認我想着維克多是比那「利益清單」想得多些。當一個人確說任何地方的生活不像此地那樣受理論的管轄的，此地是仰望美洲的實際的成就當作摹仿的榜樣的，這只是一個明顯的矛盾。是的，沒有別的地方的生活是這樣被公式和解答所統治的，從那裏，牠的人民會創造出來的現實，是必須首先被推論出來的。

如此，戲院代表社會的一種象徵的事體是很容易明白的了。在舞臺上，每一個個性是一個社會集團的代表；工人，知識份子，富農，貧農等等，都是具有牠們的集團的典型的個性的，那些個性不像那容易改變的個人的性質，牠們是保持着恆性的，而且用最顯明的方法表現出來。可是，那流行於西方的心理學上的個人的藝術觀念是要把社會學上的動機擺在幕後，而只在戲劇家和觀眾上面創造一種附屬的印象。

因此，那悽慘的衝突，是常常可以在這種事情裏看得見。那「主人翁」不能從他的社會，心理的環境裏把他自己解放出來，或者只是那麼做得太晚了，亞菲蓋諾夫的「懼怕」裏的教授們的情形就是例子。普遍對「心理學」（在蘇聯是一個濫用的名字）的拒絕和社會學原理的好尚使這一類的最初的劇本——有牠們的勇敢的農民和中產階級的暴徒——在廣大的，赤裸裸的狀態中創作出來。因為一般人需要在象徵社會集團的典型的個性中把人類的特點盡量地描寫出來，所以上述的那些劇本又成爲快要消滅的了。如果那種要求能夠圓滿地得着供應的話，我們將來會比那西方的公式般的牌子，有一種更深遠更多變化的「心理學」，因爲在那「社會化的

個人』和那抽象的『人性』當中有了明白的比照。

這就是奧列沙的劇本裏的情形。觀眾中有多少知識份子，在那女演員拱查洛瓦身上認出了他們自己的肖像的呢？而且在他們的發展的過程中，他們當中沒有一個不曾經過一種拱查洛瓦的閱歷的。

那些知識份子，從那舊世界裏把牠應該貢獻出來的一切好東西——牠的文化財產，牠的藝術的和文學的寶藏——把持着而把他們的頭顱，朝那新現實的硬壁上直碰。要一個人服從他人的命令，那是極端困難的；一個人要問他自己，有多少獨裁的方法是由社會的需要促成的而有多少是由於主觀上的任性的。當一個人被吩咐着要把自己適應別人的需要並且執行着無端加臨的工作的時候，他的人格就是給人強姦了。在一個人的孩童時候，他讀過那些擁護自由，無恐無懼的騎士的故事；是的，那種崇高的英雄主義已經在國內戰爭裏表現過出來，但現在呢，一個人被命令去和一個不能忍受的鄰人一起共廚房，而對於這樣的犧牲卻是得不到感謝的。

在那齣戲裏那女演員拱查洛瓦爲了學習和休養跑到巴黎。在俄國人的估計裏巴黎向來是

站得很高的，而且那時候想得一張出外的護照是那樣困難的，那法國的首都是一個真正的福地。但當拱查洛瓦到了那兒的時候，她做那每個蘇聯的女國民容許會做的事，放鬆了政治的信念；她到一個縫衣匠那兒去。她爲一個俄國的跳舞會定做一套衣服——一個由俄國的僑民組織的跳舞會呀，於是危急的局面就發展着。雖然她只是被一個純潔的願望所誘發，想去非政治地和各種舞伴共舞，而且去接受人們非政治的贊賞，但我們現在發現出來，在這個世界裏，那兒是沒有非政治的東西的。她不久就開始感到她去探望那僑民縫衣匠的結果，因爲她發覺她的日記本子失蹤了。

這本失去了的日記她已經叫他做『利益清單』的。那裏面詳載了革命曾經賜給俄國的知識份子和牠的類似者的利益的清單——他們受過了懲罰的罪犯的清單。但現在拱查洛瓦改變了想頭；像那許多別的曾在蘇聯住過一個長時間的人一樣，她變成厭惡那種舒服的，然而無目的的，沒意義的國外生活，而企望着回鄉。可是太遲了，因爲由她的變常的境遇所造成的命運，已經捉住了她。那些僑民已經印出那『犯罪清單』當作反蘇聯的宣傳，那位大使便拒絕招待他。她同她

的故鄉絕緣了；她惟一可走的路只是混進那些仇恨的、無目的的僑民的社會裏面去。因此她就找到一個有效果的死法；她的眼睛凝視着現在准許她反國的蘇維埃大使館，她就在導領一個失業工人的示威運動的時候，被一顆警察的子彈射倒了。

這個結局像是傳奇劇似的，但我不能替這個拱查洛瓦的個人主義的、藝術家的人，想像出將來的事業。也許，蘇聯會把這些彈高調的、沒組織的、悲觀主義的知識份子的墮落看做一些不證自明的東西吧，但更重要的是，對於那些在尋覓一種方法來避免他們的危機的西方的國家，這本劇是有深刻的教訓的。拱查洛瓦是怎樣地企望西方和牠的最偉大的藝術家——卓別麟，把他自己扮演成那孤獨的悲劇，全人性的悲劇！

全人性的？在我的下手坐着一個人，一個新時代的男人，他對所有拱查洛瓦的舉動，只是搖頭的。在貯衣室裏，他問我從前在外國曾否有過機會碰見那些僑民。我告訴他有一個小小的柏林的飯店，那兒不論老板和侍女，都說毫無錯誤的俄羅斯話，而且每天那留聲機都唱着那惟一的悲涼調子：「我是一個多麼不幸運的私家商人呵！」於是我們互相望着便大笑起來。但那些私家商人

的悲傷不是我們大笑的原因；我們只是在不論甚麼時候我們互相望着便要笑的。無論如何，我們是比卓別麟的悲劇，登上了更高的地位。

我們離開了戲院。夜是很暖和的，維克多夾着我的外國雨衣，因為這樣使我更加喜歡牠。那些無月的夜晚已經過了。在黑暗的天空的半圓月看來簡直和中歐一樣，而那尼瓦河閃爍得像流質的金屬。這兒我常常對那『銅騎士』作孤獨的訪謁。

我們坐在一張橫椅子上；維克多的手臂放在椅背上。我坐得像舊式的英國婦人那麼板硬地直豎着，但在我後面的那隻自由的手臂，痛苦着我，像一個鬆寬了的螺絲鉗似的沒法子收攏起來。如果有一場地震來了，那張椅子會高高地升起來，而我們會拋在一塊的。我在一張片子裏看見過一個類似的意外事，在那裏面一個鐵道遇險的事情，把兩個怕羞的愛人扯在一起。

『你不冷麼？』我聽見維克多說，隨後他輕輕地把他的小手放在我的肩膀上面。我能夠感到他的手指的暖氣，透過我的薄薄的衣料。他是那樣挨近着我，我能夠嗅到他個人的氣味。那時我突然憶起了拱查洛瓦，那女戲子，感到有把一切告訴他的必要。

「維克多同志，我低聲說，我得向你說明……我進這工廠，並不是因為我要知到你們的生產，和幫助你們的……我是那美國技師的一個朋友……而且，我需要……這個美國人……」我的話越來越變成錯亂的了，但牠好像並沒有引起維克多甚麼詫異，而他也沒有收回他的手臂。但是現在我的故事是說出來了，我又感到我是有把握的。現在讓事情順着牠們的路走吧！

「我是好久想告訴你那些事情的，」我繼續說。我望他的整個臉。便看見他的眼睛閃耀得像尼瓦河一樣。「那惟一的事情把我扯住的就是有一種害怕，怕你會因此而鄙視我呢。」

「爲甚麼我會鄙視你呢？」他回答。「我一向就知道的了。」

「你知道了？你知道了我和那工程師的事情？」

「我猜想有那一類的事情呵。」

「單獨爲了一個中產階級的專門家而跑進你們的工廠，你不鄙棄我麼？因爲，只是利用那些耕種機來……」

「爲甚麼我會鄙棄你呢？每個人都能够改變的。你能够明白。」我羞愧得發熱。

「那麼……法里雅呢？」我問。「她要猜我……」

「我不曉得。有可能的。」

我很困惑。他們已經看穿了我，可是他們仍然把我當做一個同志看待。我想起了那個康民主義者，他叫他的朋友去找那失望的拱查洛瓦。「拉她回來，」他指示他。「用她自己的語言告訴她，說普羅列塔利亞特是寬宏大量的。」但是和五年計劃的完成工作合作，而目的只是爲了愛情的事件，那仍然是最蠢笨，最可笑，最女孩子氣的，我更加困惑，但是，像平常一樣，維克多來救濟我。

「我們大家都曉得你現在是爲那計畫而工作的，」他說。他的話使我平靜了，但雖是這樣，我仍不能完全恢復我的自制力。

「我不能夠明白爲甚麼你們喜歡我，」我抗辯道。

「你怎麼曉得我喜歡你？」

「我不是專說你個人的，而是說那些同志們呵。」

維克多突然變成歡快起來的。「看呵，現在你正在想法擺脫出去；你並不是很勇敢的呢！」

「你弄錯了。我甚至怪我自己，對於從你那兒擺脫那件事，用力太少哩。如果使你高興的話，我能够告訴你，我是十分喜歡你的。」

維克多的眼睛閃光了。「那是真的麼？」

「百份之百的。真的！」

「我現在也是喜歡你的；百份之百的喜歡呵！」

「現在？你從前不是的麼？」

「從前只是百份之二十五罷了。——正正像一個人的進步那樣，在這裏面你是繼續發展着的。」

「你以前相信我自己會做出一些甚麼事情來麼？」

「我是很清楚的。你是忠實的而且勇敢的。」

我感覺到好像一個做侍從的人，剛剛被擢升到騎士一樣。我正如新創光的鐵一般地堅強和明亮。現在無論死亡或魔鬼都不能傷害我。在這樣一個心境裏，英雄們上前去了，只拿了他們的矛

鎗，和一夥無數的敵兵作戰——而且打了勝仗。

我要用這些現在在我心裏喚醒了的無上力量去做些甚麼事呢？我很快地就下了決心。

「我要留在這兒和你一起工作呢，維克多。」

他的面孔已經變成怎樣憂鬱的！在他的眼睛裏，有一種濕潮的閃光，當牠們悲慘地凝視着那條尼瓦河的時候。

「在最近這幾天裏面，我對那問題已經不知道想過多少的呢，」他說。

「那麼？」

他移動他的位置，並且俯着背脊，兩手放在他的膝蓋中間地坐着。「那不會有什麼結果的呵，同志。」

現在在我好像一個地震來過了，並且把尼瓦河震蕩起來，那月亮和我們的坐位都舉高在半空中。

「事情不會……有什麼結果的麼？」

「我可以解釋呢，同志……我有一個老婆，她以前是屬於黨的並且做過我們的偵探……她給一個軍官捉住了，那是她工廠從前的經理……當她還是一個女子的時候，她在我們的工作裏參加了活動的……不論甚麼時候，這個商行僱用的婦人們提出甚麼要求，她們常常派她去會見那個董事長的，因此他很熟悉她。他們拷問她，要她報告我們的情況，他們用他們的來復鎗的重頭撞她……從那時起，她的神經就受了可怕的重傷……我一生怎麼能夠離開她呢？」

「沒人會要你這樣做的，維克多。我永遠不會允許任何人爲了我而消受苦痛的。」

「那麼你以前在想着甚麼呢？」

「我……說老實話，我不會想過甚麼東西……但是我相信一個人，能夠用不同的方法去愛不同的人的。」

「你知道，同志，和你討論那樣的事情，在我是很困難的。對於這樣的問題我簡直不會怎樣思索過。當然，就你自己的國人而論，你是對的。可是我們在這兒，怎樣纔找出時間來用不同的方法去愛不同的人呢？你自己就知道有多少工作是等着要做的，那不是不可能的。」

「那麼，爲了你沒有時間，我們就必得分開？」

「那不是這樣的，但是我怎樣來向你解釋呢？你會受苦，那在我不對的。不，如果一個人愛一個女人，他必須能夠把牠當做一個真正的同志……和她共同生活並且和她一起工作……一個康民主義者是不應有雙重性的生活的……我覺得要說出我的真意，那是很困難的，因爲我不慣於講這樣的東西。我有這樣多的話要同你說的，可是我有甚麼法子去找出那些適當的字眼呢？」

「我明白你所說的一切。繼續下去吧，繼續下去吧！」

「好的，那麼另有一件事。在我們的國家裏，你已經看見過和經驗過那麼多，你應該把我們的事情告訴你們自己的人民，並且和他們的偏見戰鬥呀……在那邊我們須要朋友。」

「那你就錯了。一個曾經在蘇聯住過一些時候的人，做一個煽動者是不行的。他是太習慣於發現自己缺乏工具，找出損失，對牠們埋怨，並且將犯罪者當衆懲罰。假如我像可憐的拱查洛瓦一樣的呢？」

「不，那完全是另一回事的。那女戲子感覺到她自己本身是被污辱了的；她並不把那社會當

做整個的東西來關心的呀。我們需要我們能够學習的實際的批評，而我們只能夠從那些相信我們但是澈底知道我們錯誤的人們得到這樣的批評。」

我們起來，便一直朝我的公共住宅走去。現在我們彼此較以前更貼近着，可是所有的緊張已經消失了。我不是不快活的，因為我深信了維克多愛我。我不能夠不快活的呀。

他在我的門口站住，他的手插進他的皮帶裏並且瞪視着我。大門是開的；雖說只在昨天，我們公共的鐵器從廚房給人偷了去，但不知那個人又忘記了把牠鎖上……在走道裏很黑而且很幽靜……我說不出那個思想是先到維克多那兒還是先到我這兒的，不過我看見他的臉變了樣子……他用他的手緊握了我的雙肩……那時候威爾達布開始哭叫，而且有一道光在門左邊的窗子裏露出來。格蘭尼·瑪爾伐的聲音在她的夢中嘆息：「哦，上帝主呀……殘忍的罪惡呵……」狄挪赤脚的跑進廚房裏拿些牛奶給那小孩子，她進去的時候就擰着電燈。那燈光閃耀在她的散亂的金黃頭髮上面，同時牠的明亮包圍了她那細弱的小孩般的軀體……

迅速地維克多向我俯着身子，「再會！」他急速地而且笨笨地吻了我的頭髮，把他的小帽拉

過他的前額，使用忙速的脚步慮慮地去了。他沒有一次轉過來。

「我的愛人今天能够這樣膽大

把我的愛情擺在腦後？」

八月二十二日

「我不能停留在家裏。有些甚麼常常要拉我到工廠裏去。一早，我記起我還沒有將我的醫生的證明書蓋印呢。我得把牠拿到辦事處去，便被遣到我們一部的理事長那兒去。他不在他的房間裏；我等了半個鐘頭。他終於出來了；他還是一個年輕的脚色，一個曾經從勞動階級抓上來的男子。

「請你不要靠着我的棹子，」他說，一面在細看我的證明書。

「我不會弄壞牠的，」我粗魯地回答。

「你不會弄壞牠的，可是你在騷擾着我的工作，因為你正站我和光線的中間呀。」我正犯了拱查洛瓦同樣的罪狀。

在外面的辦事處裏，那位姑娘向我解釋；我可以同時拿到我的病假的錢，和我的每月工資。

我看見那黨委員會辦事處是空的，便走去工廠飯堂吃飯。但在那兒我碰到壞運氣；那魚是醃了的，而且在我用餐的時間裏，兩個農民爲了他們各自家鄉的事物的狀況而爭吵着。一個人確說，他們必得犧牲他們所有的牛奶，而且不准留一滴的，另一個反駁，說他有那樣多餘的牛奶，如果他高興，他可以在那裏面洗澡呢。如果照着他自己的鄉村講，也許每個都是對的，但每個人都叫對方做扯謊的人。一個擁護蘇維埃的外國人，也許會把這聲訴的農民當作一個富農的兒子，而一個不表同情的人就會把另一個列在煽動者一類。

長期的經驗已經教訓了我，對於那許多遊歷者的報告所根據的本地居民的敘述，我們必須用極端的小心去觀察。這些一定是敘述者生活着的地方情形的產物，而沒有一處地方的情形是像蘇聯的各地那樣千變萬化的。一個人對於親見者的政治上，心理上的態度也得加以考慮的。這樣一種人用低語說給我聽的一些消息常常證明出來只是相對的真實，或者甚至完全是事實的附會。在同樣的情形裏，許許多多偉大的可能的事業，常常只是給凌亂的工作，組織和材料的缺乏，

豫定的惡意或者一種責任的推諉，所阻止或妨害了。

我回到委員室，這回我碰見諾維可夫，他用一種好奇的眼光望着我——這些人怎麼會知道了一切事情呢？我要求他借那本，在一九二六年印行的，爲慶祝蒲提洛府工廠的一百二十五年盛典的那本紀念小冊子，並且在一個角落裏坐下來讀牠。開頭只要有人開門，我便擡頭一望，但不久我就給我們工廠的歷史勾引了。在前面說過的一百二十五週年紀念的時候，中央執行委員會將紅色獎章授給工廠，爲了你們在增進蘇聯的工業力量的發展當中的顯著的功勞。『我必須承認我對那獎章感到榮幸，雖說牠是在我來工廠的許久以前頒發的。』

那位創業的蒲提洛府，他把他的名字給到工廠的，是許多常常換手的行號的主人之一。有一個時候這行號是隸屬一個法國的洋行的；隨後國家銀行就把這個俄國的克虜伯的一切股份都收買了。那時候製造機器也製造大礮，而且就在隔鄰的塢裏造船。在一九一四年的秋天，這些工廠完全改作戰時工廠，但在布勒斯特·里多佛斯克和平條約之後，出產逐漸停頓而那些工人就離開了那些地方。

隨後恐怖的內戰和荒年一併來了，工金冊已經大減了，從一九一七春天的三萬工人幾乎減到一九二二年的一千五百人；多數從前的僱員都南下了，和白軍抗戰着，而其餘那些留下的人就組成了一種略具形式的鐵道工作。

然而，甚至在當時，向上進展的局勢仍然是有的。在一九二二的同年那「蒲提洛府工廠」的名字改爲「赤色蒲提洛維茨」。那行號同列寧格勒機械製造托拉斯聯在一起，並決定把大廠鑄造廠改爲一個耕種機工廠；因爲那兒的耕種機是根據福特原則造成的，所以他們接受了福特生·蒲提洛維茨這個名字。

但在第一個模型完成之前，已經消耗了不少的時候。一直到了一九二四的五月一日，那俄國耕種機第一號纔舉行牠的奏凱式的遊行，掛了旗子而且圍了花環，在蒲提洛府工人們的大巡行的前頭，受着人們的熱烈的歡迎。自後蒲提洛維茨開始牠的平安的工作，而且一年又一年地，那出產曲線和工金冊的數字都升高起來。那位蒲提洛府工廠的作史者寫出了下面的恰當的批評：「全國的一般工業的進步的主要階段，大概可以由這個蒲提洛維茨的生產統計上追跡出來

的。』甚而更有意義的是：『這一百二十五年間的蒲提洛府工廠的歷史，就是俄國勞動階級的歷史和俄國革命的歷史。』

圍繞着蒲提洛府工廠的有伯爵和王子們舒瓦洛夫、斯特羅甘諾夫、杜魯壁茨開——俄國境內最富有和最顯赫的家族——等的美麗的邸宅。從那兒，那行號的董事們產生出來，他們叫他們的農民在工廠裏一天做十五到十六個鐘頭的苦工。他們的跳舞會假面會和各種排場顯明地和他們壓逼下的農奴的災苦，成一對照。

不滿意在工廠裏醞釀了而且發動了，但一直等到晚近的七十年代，那第一次組織的罷工爲反對削減工人的工資而發生。在一八七二年聖誕節的前週又有一次罷工；那些工人要求發給管理部扣留了的三個月的工錢。在那個時候，工錢是不發現金的，只發給那些董事經營的店舖通用的代價券，那些董事們自然要把那價錢弄到他們自己合算的咯。這次罷工結果是勝利的，但那時候那些主管官吏開始注意——這些蒲提洛府的苦力拒絕工作不就是暴動、反叛、和革命的警訊麼？木房子已經在工廠的進口大路上爲了那些在門柱上繫馬的哥薩克騎兵而搭蓋起來。在這裏

面只要有一點點搗亂的表示，哥薩克兵就用他們的鞭子來擊打那些工人，實際有些我們現今的辦公處在那時候，就是警察局和奧克蘭納的軍部應用以審問那些被捕的工人們的地方。

但不管這些高壓手段怎樣厲害，那運動是再也不能阻撓的。在一八八五年，一個新的罷工爆發，因為扣除了工人的醫藥費。這個總數達到工人工錢的百分之二，但是沒有一點醫藥的設備。那些比較的受過教育的工人們要求一種康健保險的制度；那行政長官恐嚇他們要把他們完全送到西伯利亞去，而那次罷工就打消了。隨後董事會就為每一百個浦特（pits）的鐵道的造成，設立臘腸和伏特加的獎賞。

在那個世紀的末尾，經濟的恐慌來到了；在一九〇一的五月一日，第一次組織的勞動節示威發生。那奧克蘭納的警備和革命的進展成比例地增長；警察總監杜列潑夫，對擾亂秩序的有效的防止運動，想出了一個對策，由此，「精神上的方法」要去幫助哥薩克兵的鞭子了。「警察方面，」杜列潑夫宣佈，「要和革命黨人用同樣的方法工作的。」那時候奧克蘭納開始建立牠的訓練學校。

在一九〇三到一九〇四年當中，神父加朋在蒲提洛府的區域裏出現。在一九〇四十二月，四個工人因為隸屬於他的組織開除了；加朋召集一個反抗的會議，並且遣派一些代表團到工廠經理，到製造廠監督，到聖彼得堡的市長等等地方。那工廠經理向那些工人謾罵並且叫他們不要滋事；那市長因憤怒和害怕而叫喊了：『革命呀！』在他的後來的報告裏，他把勞資間的關係不是常態的事以引起當局的注意。

挑撥團 (Agents Provocateurs) 被遣派到工廠的成人教育組，去偵察並且報告那些前進的工人。但一九〇五年就在眼前；事情進步得那樣快，使得那時已經常駐在『一月九日花園』裏面的加朋現在已經趕不上革命黨先鋒的要求。那蒲提洛府的工人們在管理部的聯席會議上要求每日八小時，和規定工人需要的工人委員會的組織。於是那主席說：『如果我照行這個辦法，我們就要把所有的股東變成乞丐了。』

在一月四日那天，蒲提洛府的工人們在聖彼得堡區域裏的各大製造廠和工廠的鄰近出現；他們來表明他們和他們的階級的同志們利害一致。他們並沒有白跑；在一月七日那一天，十五萬

的聖彼得堡工人開始一個總罷工。加朋禁止他的附和者閱讀那些政黨的印刷品，但雖有這種妨害，那些波爾雪維士發出的反對和議的警告，仍然找到廣大的贊同和傳播。那時候加朋派了一個代表團去見內務部長，他告訴他們，沙皇絕不接見那些工人的代表的。同日的晚上，在蒲提洛府工廠的鄰近，許多會議舉行了，決議案在那兒通過了，主張立即和日本議和以及全體工人的『個人的自由』。

加朋對於工人革命的勢力的阻撓又達到一次成功。不理會那內務部長發出的警告，他帶了一班請願人去見沙皇。但在奈夫斯基門和冬宮裏響了的鎗聲，到底打破了被聖彼得堡的普羅列塔利亞特所懷抱的幻想：說是條件可以用合法手段改良的。

加朋逃走了。他露出真面目原來是個挑撥團員，並且被社會革命黨員絞死了。隨後罷工和封鎖迅速的接一連二的發生，有革命傾向的工人們是不再被錄用的。在十月十八那天，工廠裏有一次暴動；兩處的經理人被捆在一起，用髒污的袋子套着他們的頭，拋到街上。警察將蒲提洛府工廠變成一個血的浴場；工人們開始在那兒舉行會議；社會民主黨的煽動者深入了這工廠裏面，並且

受到熱烈的歡迎。在十一月十四那天，工人們執行一個波爾雪維士的決議案，並且提出每日八小時制；管理部門將每日十小時制的佈告張貼在牆上，但這些東西馬上就被撕下來了。

隨後伯爵惠特，那自由主義的內務部長，沙皇把他叫做他的「狡猾的朝臣」的，向蒲提洛府工人們發出一個誠懇的訴求，在那裏面他給他們一個溫和的警告，說是「對他們的老婆和兒女存了憐憫之心。」同時，在莫斯科防寨那兒，警衛團的機關鎗正在把那些叛民掃射着。這次對於革命的壓抑，就是凶惡時代的開始，那時候，全俄羅斯的普羅列塔利亞特都遭逢了刑法上的遷徙和屠戮。

接着的第二年當中，這位蒲提洛府工廠的作史者沒有罷工的事可以紀載。工人們在他們被錄用之前，要受過一次精密的檢查，而同時又被逼着互相聯保；登記罪人的簿子還是備有的。到了一九一二年，無論如何，革命運動重新開始，並且帶來了提高工錢的鬭爭。自此以後，又來了爲反抗鎗殺金礦工人林拿而起的罷工，大約在同期間，真理報的創刊號出來了。

罷工的事疊次發生；牠們的性質表明了，蒲提洛府工人們和全俄羅斯的普羅列塔利亞特的

階級意識，是已經怎樣迅速地長成了。他們不只是爲了他們自己的勞動條件而戰鬥；比方在一九一三年七月，三千個蒲提洛府工人，爲了反抗國外工人報紙被壓迫的事，而發動一次罷工。後來這種聲援罷工成爲更常見的了；有一次是爲援助那些杜來烏、戈涅克橡皮製造廠的全體被毒害的女工人而舉行的，而另一次是爲了擁護那些繼續罷工的時候受了警察的虐待的巴谷工人而舉行的。

有幾個月的時間，戰事把罷工的流行病結束了。在那時候，工人的總數加到三倍之多——在報紙上，至少有這多，但有許多新僱的工人是永遠不會在工廠裏出現的；他們是些有錢人的兒子，他們的父母把他們註了冊做蒲提洛府工人，因爲，爲戰事而工作的人，不會被徵去當兵的。

在一九一五年的秋天，尼古拉斯第二到工廠來巡視，想鼓起所有工人的勇氣來多做些大噱；那些理事們想組織歡宴來阻止那些工人的殘酷的沈默，並且使他們的君主相信他已經得着一個熱烈的歡迎。在以後的幾年間，執政者們拿那些較年輕的工人送到前線上去以答覆那幾次的罷工。這個行號被軍隊化了；管理權移交到一個陸軍少將的手裏。後來，一個陸軍上將做牠的指揮

官。一九一六——一七年的冬天，蒲提洛府的工人大多數被逮捕了，但在二月革命以後，那些工人又在那大礮鑄造廠裏舉行他們的會議，那兒就是現在的舊機器廠。列寧、車爾諾夫、柴得賽等人在七月暴動前那些時候，都在這兒演講過的。

十月裏，這工廠戲院是兩個會議的場所，在那兒通過了一些決議案，說是那工人會議應該取得管理權的。在一九一八年的開頭，蒲提洛府工廠被社會化了；在後來的國內戰爭的時候，許多工人接管了那些負責的職位。蒲提洛府這個名字成爲白黨最熟悉不過的。有一次裘丹尼支把捉來的兩個蒲提洛府工人鎗決了，只是因爲他們帶了上面寫着「蒲提洛維茨鐵甲巡洋艦第六號」的徽章。

隨後跟着來了幾個衰落的年頭，同時這個被戰事和饑荒蹂躪了的地方緩緩地集中力量以從事復興的工作。但在一九二二年三月的金屬工人大會席上，列寧用這句話對前進運動發了一個信號：「那退卻的事過去了。」

從那些時候起，多少新工廠已經建造了起來呢？幾多千萬塊錢已經花在機器上面呢？幾多浦

特 (put's) 的鐵和幾多的人在這廣大的蒲提洛府的鎔爐中已經被塑成爲新世界有用的器具呢？

「你應該去和甘多爾，我們的化驗師，談談呢。」當我把那個紙夾交回給同志諾維可夫的時候，他說，「他已經在這裏工作了三十年，一定能夠告訴你各種有趣味的東西。」但是我故意忍住不去問他我要在那兒纔找到甘多爾，這樣，我明天再到委員室來，也就有了一個托詞。維克多在那裏也許他是病了？

今天我們的工廠看來似乎完全不同了——正如一個朋友，當你知道了他的過去的歷史的時候，似乎是改變了。有一天他告訴你他自己的故事，他的鬪爭，失敗和勝利，便好像一個面網從他的臉上被扯了下來；你開始瞭解他的聲音的調子，他的眼睛的神情，他的語言和他的生活的意義。並且有什麼東西能夠比這個工廠的發展更加美麗，牠從那農奴們被逼去勞作的黑暗的羈縻的地方進到革命的崇高的城堡，進到力的歡快，再進到正在建造未來的工作！

八月二十三日

維克多不在那兒。諾維可夫從委員室的窗戶指給我那設有化驗室的紅磚的建築物。我在他的書籍和玻璃當中，找到了甘多爾，那位化驗師，他看來像一個有灰黑的鬍鬚和棕色的幻像的眼睛的猶太浮士德。他是屬於那樣一個時代的：離開了有錢的父母的家庭，『到民間去，』教那些目不識丁的人讀書寫字，這種行爲在當時被當局認爲是革命的，因爲沒有別的地方是像俄國一樣，將平民教育和政治聯合在一起的。甘多爾同志把他的教育工作的一些事情告訴我。

他對於蒲提洛府的歷史有一大部份親身的經歷，因爲自從一八九九年起，他在他的化驗室裏面，一直坐到現在，只是當一九一四年他進了監牢的時候，纔有短短的幾個月的中斷。他住在這工廠的鄰近，混在像我的有伊底伯斯情意的自衛軍朋友所輕蔑地說的，『站在奈夫斯基門的後面的脚色』中間。從這位朋友的聲音的調子裏，我聽出了這是一個通常被聖彼得堡的『上流社會』用來呼喚那些普羅列塔利亞特的一種表現。

甘多爾把那半合法的成人的夜校的事情告訴我，那是革命黨內的工人們所參加的，而且時常受着警察的壓制。那夜校由歐占妮·佛列格爾，革命的老祖母之一，負責管理的。靠近牠的那一所房子，是一羣有自由主義傾向的工程師（包含一些卡德黨的份子）舉辦的『工程師聯合會工藝研究班』。在這裏面，理事長和教員們純盡義務，而工人們繳納五個或六個盧布的費用。

大規模的教育工作是一直到革命之後纔開始的。在一九一八年三月，工廠委員會將籌設一所勞動階級的年輕子弟的學校的任務交給了甘多爾。他從來沒有過輕易的任務的；由濟窮委員會送給他的學生，大部分是戰爭的孤兒和無家可歸的孩子，在上課的第一天，他們就打了電車和那些和平的芬蘭農民的車子。他把他們分成二十五班，每班從十四個人到十七個人，並且將一些剛直的蒲提洛府工人做他們的教導員。

逐漸地那學校自己分成了三組，中等，高等，和過渡等三部，最後那一部包含那些最壞的頑皮傢伙，裏面也有不少的女孩子。各班就在前任理事長的房屋裏上課，現在一些外國的專門家在那裏住着。在那些饑荒的年頭裏，那些孩子們所以照規上學的主因，是因為他們能夠得到一頓豐富

的食物。後來，他們有許多到前線服務的。

在那『Zep』(新經濟政策)的時期裏，學習的課程執行得更加嚴厲，並且在一九二二年(一個在我們廠內的週年中很可紀念的年頭)這個學校發展成爲大家所知的F. S. D. (工廠作坊學校)那種形式的工廠學校，在那兒，幼年人經過一個『七年級學校』(Seven-Year School)的修滿之後，纔能錄取進去，在工廠的開支之下繼續他們的學習。他們每天接受三個鐘頭的學理的教導；在另外的三點鐘呢，他們做實習的工作來賺很低的工錢，工錢是根據他們所表現的才能來增加的，因此在他們的學徒期滿的時候，他們有許多幾乎賺到和一個成年工人一樣多的工錢的。我們的F. S. D. 已經逐年送出了幾批技術很高的工人，他們有些還在更高的技術學校裏繼續着他們的學習的。例如哥魯貝夫起初在大礮鑄造廠裏做一個車床匠的徒弟，現在是一個馬提工廠的工程師，洛莫諾索夫呢，他在少年學校裏開始的，現在是一個烏拉爾的工程師。當甘多爾向我講述這些事情的時候，他的眼睛帶了父性似的驕意閃耀着。

『你是一個黨員麼？』我問他。那在蘇聯裏是一個極通常的詢問，而且決不會被認爲一個多

嘴的問話的。其實我是預先想得到那答案的，因為要從無黨派的個人分別出康民主義者，那並不是困難的事，不過我很高興聽聽這位老手革命家，講出他怎樣不屬於黨的理由。

他說一個康民主義者必須把他的全生命獻給黨，而他的私人利益放在第二步的。『我有這許多私人的利益呢，』他加上說。他對他的書本，玻璃瓶，和試驗管的那麼愛戀的一瞥，清楚地表明了牠所說的意思。

但是，爲甚麼這許多老革命家不加入黨，這還有其他的理由。在這最近的十五年裏，戰術已經那樣完全地改變了，所以他們很有一些人，就因爲不能跟着這些新方法工作而退了伍。他們怎樣快地爲人們所遺忘，真是可以驚訝的事；對於一切的意向和目的，托洛茨基的名字從大革命的歷史裏被抹煞了，而那些社會革命黨和孟雪維士呢，只是像諷刺畫似的存在着。這並不僅是因爲那些當局者要使他們湮沒無聞；卻因生命的節拍是那麼迅速，牠不容許負擔死重的東西，所以把那些不能在進展中負一部份責任的脚色全都排除了。

當我走到門口的時候，甘多爾在後面叫住我：『別忘記到 F. S. D. 工廠去看看呀。』

那 F. S. D. 是設在一所單層樓的房屋裏，只要從理事長那兒得到允許的人纔能够進去看的。那看來真是美觀；在一個深長，明朗的房間裏的許多車牀和打洞機前面，站着一夥男孩子和小姑娘，青春的柔媚明白地畫在他們的快樂的臉上。現在我纔知到爲甚麼我向來看不見少年人在我們工廠裏作學徒；未熟練的童工在蘇聯的任何城市裏再不會被人僱用的。

一個很小的十六歲的脚色帶我看餐室。由 F. S. D. 廚房預備的一頓中飯只要十五個戈比克，這種價錢是根據低下的工金規定的。

那時候我要回去做我自己的工作。我們這班還沒有完工，但是我一看見那些在場的人從這個跑到那個，或者一夥夥地站着，帶着嚴重的面貌在討論一些事體，便曉得有些事情是十分不對的。

「發生甚麼了？」我問。法里雅不回答我；蘇賓斯基熱心地握着我的手，但伴作不聽見我的問話。那顯明地是些內部的事情。

我知道我們的康民主義者的原則；他們將他們所有的困惱向小組會議發洩，但在牠之外是

保持沈默的。可是在中午休息的時候，我知道那擾亂的原因了；一個姑娘在茶爐後面把這故事告訴我。

那會計長曾經不合法地挪借了幾天的工金當她的較年輕的助手注意到這件事，並且跟她當面理論的時候，她跑到管理部去，設法要將她的屬員撤職。那些工人們一聽到這件事的風聲之後，馬上就全體嘩然；因為會計長是一個康民主義者，這件事情就鬧到黨委員會去了。隨後就是事件的頂點，那個遲發工金的人受了一番嚴厲的警告放走了，並且調到別一部去。

這個新聞之來，直像在我的臉上摑了一掌。我感到我自己是工廠的一份子，所以我決不能嚴厲地下批評而不至自傷哩。但當我帶着從貯藏室取來的工具，經過領手的桌子走向我的機位的時候，我停在法里雅的坐位前面。

「我完全曉得了，」我告訴她。「你正是表示着和那個無賴的人團結一致。而不把她踢出去哩。」

法里雅擡起她的頭而且嚴重地望着我。「這兒不是討論這樣的事情的地方，同志，」她說。「後

天是我們的休息日；如果那時候你高興來看我，我們可以把這件事情弄個清楚明白。

「我很好奇地想聽聽這個解釋呢，」我說，並且聳着我的肩膀。隨後我就回去工作。

我漸漸地越加鎮靜起來。我想，在沒有構成我的判斷之前，我必須聽聽法里雅要說的話。總之，維克多是黨委員會裏的人，他無論如何不是不明白這些事體的人。也許我自己去問問他，倒是一件最好的事體。

去問問他這個念頭一來，就有些甚麼在我的心裏痛苦地抖顫着。足足有了兩個整天我沒有看見他一點蹤影。他可有甚麼事故麼？

我無心無意地把我的錐子換了一個鑽子，所有的時間裏都在想着那首歌詠鐘聲和愁人的老民歌。我是處於這樣一種憂愁的心情之中，所以我對於我的磨光工作感不到一點樂趣。

那天晚上，工廠報紙的編輯走進來和法里雅談了幾句話。我便知道快要召集一個工人通訊員的會議。往後我要求允許我將工廠報紙的前幾年的各號翻閱一遍，他們告訴我明天早上再去。我要向諾維可夫問維克多的消息。他高興怎樣就想讓他想去吧。

八月二十五日

我深信他已經到別處去了，但是太沒有勇氣來向我自己承認這個信念。如果不是我的護照到期，而我被逼着要在九月一日離開這裏的話，我不相信我能够鼓起勇氣來問諾維可夫的。爲甚麼許多人說懸望是最難堪的呢？和失望比較起來牠本身就是一種幸福。我將永遠再見不着他了！諾維可夫不在那裏。我坐在挨近藥房的一張橫椅上，在那兒我能够看到每個走進委員室的人。我沒有會見維克多的希望；我只是等着諾維可夫。

一羣工人走過我身邊，他們一面走一面笑；一個用綑帶綁了一隻手的姑娘跑進藥房裏去。我想起了我第一次的受傷和我後來遊歷『隱廬』的事。一切的好像隔了多久而且多麼孩子氣的！今日的我簡直好像已經更加老大更加成熟了。

一大張招貼從對面牆上直朝着我：『同志，你自己已經在生產專科（P. P. K.）和精工專科（R. T. S.）報了名麼？』

P. P. K. 是一種教導的課程，牠灌輸普通和專門的知識到不熟練的工人並且教他們一些實用的要訣，因此他就可以够得上第四級的熟練工人的資格。R. T. S. 的目的是在供給那些不熟練的工人（在第二級或第三級裏的）以那樣的知識，使他們的資格够得上更高階級的。牠使他們一直升到第七級爲止，並且那些在牠的最後的試驗及格的人，就能够升進高等專門學校裏去。開學和開課都在九月十五日。

再過幾步路又有另外的招貼，牠邀人到商業組合科報名的。隨後我就看見俱樂部各種研究會的招貼，接上一張就是宣告女車牀匠的課程的。此後就是黨校的課程的……但在牠以前的其餘一些招貼我就看不清楚了。

在進門的那邊牆上我能够看到在今年六月貼上去的一些幽默的圖畫，刺諷各個工廠在認購國債中所表現的熱誠。那些達到最高數目的鎔爐廠，是用一架飛機來代表的，鑄造廠就用一架火車頭來象徵的。在牠們之後的是染色廠，用一部汽車做代表，而其他的部份就拿電車和騎士等等來表現。最後是一匹驢子，一個用拐杖的殘廢人和一隻蝸牛，向五年計劃慢慢地並且舒服地爬

行着。幸虧我們自己的工廠還沒有被描成最後的三者之一，雖說牠是落在飛機的後面一些地方。我看見一個身裁矮小的工人，經過那些散亂的木塊和土堆，一直向委員室走來。我的心開始很快地跳動，那是諾維可夫。我從我的坐位跳起來，跑去迎他。

「多瓦利殊·諾維可夫！他擰轉頭，驚訝的樣子。」

「諾維可夫同志……第一件事……晨安……是的，你能够告訴我甚麼地方……甚麼地方我找到維克多·米歇洛維支……我的意義是……索羅維奧夫同志呢？」

「索羅維奧夫在兩天以前已經被調到斯太林格勒工廠去了。」諾維可夫的形貌，那蝸牛，那驢子，和那 P. P. K. 和 R. T. S. 的招貼，一齊在我的眼前跳舞着。隨後我發現我自己在我們工廠的進口，就立刻跑開了。

有半點鐘的時間，我圍繞那蒲提洛府的迷宮漫無目的地閒逛着。天開始下雨了，但我並沒有注意到那些雨點；我顛躓地跨過那些木頭堆兒和金屬垃圾上面；一個老工人向我大聲說了些什麼我不能明白的話。終於那鎔爐的灼熱把我的知覺喚了回來；完全出於意外的，我已顛躓地走進

了鍛冶廠裏面，在那兒一球火焰向各方面放射出無數的火星。我並不避開……我感到逼切地需要一種肉體上的痛苦以減輕我的心靈上的隱痛呢。

「喂，女市民呵！你爲甚麼像木頭似地站在那兒？」我聽見一種激怒的聲音說。「走開呀！在這兒掉了甚麼？」

「不要管她吧，米殊加你不曉得她在找尋她的丈夫麼？他自從上次發工錢以後就沒有回家了！那些工人們咯咯地笑出來了。」

「別發愁呵，小嬌嬌。你的農民跟一個麻面姑娘到那些島上去了呢。我看見他請她喝一瓶檸檬水。」要是我今天晚上回家你就打死我吧，」他一面望着她把那些東西喝下去一面說的。」

「你要當心，你已經把你的護眼鏡正戴在你的鼻子上面，而不在你的額上呢。如果一粒火星掉進你的眼睛裏，你就不能够再偵察別人的事情呢，」我反駁道。

這巧妙的對答把那些笑聲轉到我這邊來了。

「喂，喂那是個利害的女孩子呵！你要當心，尼古拉，不然你要自找苦吃呵！」

尼古拉努力要恢復他的地位。

「你以為我是一個戴了護眼鏡在這兒走來走去的工程師麼？」他問，並且聳着他的肩膀，但這句話只能使他的聽衆冷靜下來。

有一些時候我注視那紅的火光。那是可以使人戰慄的，當你看到那鎔化了的金屬被傾注出來，並且想到只要一滴就足夠把一個活人弄死。對於傍觀的人們，這與其他的任何危險的工作是一樣地刺激的，而在同時，關於那些滴着汗的，在火的前面蠕動着的，雖然在熱，危險和苦工中間，仍然有工夫來戲謔和發笑的污穢的人們方面，有些東西給了我一點慰藉……生命在前進着呵……

八月二十六日

今天我走到外國入護照處去拿我那離境的照會。在那兒我纔曉得，除了附存幾張照片外，我要向我的公共住宅和工廠得着我所擬定的行程的許可書。

在下午的時候我訪問法里雅·新珂。她住在罷工街裏一所新房屋裏。這些大規模的公共住宅的建築法使我想起新近在維也納和柏林造起來的房屋。實際，這些建築家大概都是德國人，但這些蘇維埃的房屋的內部，與德國的類似的房屋的內部絕對不同。俄國人做事要大規模的習慣在這裏可以證明出來，並且表明牠本身對空間的浪費是和其他的各方面一樣的。那些房間大而且高，但那老住宅的組織仍被保存着；幾個家庭同居一層樓底，而使用一個公共的廚房和浴室。熱氣管已經裝置了，但後面的院子還是零亂的樣子。在裏面，沒有綠草的鋪道和美觀的小花園；那種注意到室內和室外的家庭文化觀念，在蘇聯是不像在西方那樣進步的。

縱然，法里雅的美麗的頭和波紋金髮把她襯顯了出來，但沒有她那紅的髮帶，在我看來她就很像個陌生的人。她正像那些農家女，詩人涅克拉梭夫曾經把她們寫成「臉容充滿平靜的端莊，舉動充滿和諧的毅力」的。我豔羨她那種招呼我坐下的態度，以及當她向走廊裏叫着，「把那些水泡點茶吧，媽媽。」的時候，她那頸子轉動的姿態。在這個蒲提洛府作工的女子身上，有些完美的和持重的成分，使我回想起古代的或者文藝復興時代的一些人物；也許哥德曾經這樣描畫過他

的伊菲甘尼亞的吧。她當然是不會比我年紀大的，但在她面前我依然覺得好像一個小孩子。

「你爲甚麼那樣望着我？」她問。

「我正在猜想着你的社會出身。你是一個知識份子，還是從勞動階級出來的呢？」

「我是一個工人的孩子，但是我已經讀完了那九年級學校的。我也懂得德文；不，我不能夠講牠——附屬句子的末尾的那些助動詞，弄得我覺得自己很笨。」

「你會覺得英文容易些麼？」

「是的，可是我們不能夠完全學英文。在今日，德國是歐洲的普羅革命的焦點。」

她的母親端着茶走進來……一個年老的，久經憂煩的勞動階級的女人。她像是很興奮。

「法里烏沙，」她喊，「他們今天在合作社裏有許多豬頭出賣。因爲我不知道你會不會嫌那裏面的油太多了，所以一個都沒有買。不過油是可以燒煮下來的而且……」

「你喜歡怎樣就怎樣吧，媽媽。不，我不會嫌牠太肥。我是很高興吃牠的。」她一看見那老女人的失望的臉就加上說。「你喜歡吃生胡瓜麼？」她一面倒茶一面說。「我可以削一個給你。」

我們吃的時候，她就說到她的本題。「你因為那個會計長巴浦基娜沒有被開除便覺得很驚訝呵。她在她的工作上是很能幹的，而且這時候我們也找不到人來代替她呀。」

「但那是一件原則上的事情啦，新珂同志。我們必須要跟我們的目的的一致纔行。我們是為一些利益而努力還是為那個新世界而努力呢？」

「我們的工業做成的利益就是那新世界的基礎。」

「新世界同舊世界看不出多大的分別了，如果像巴浦基娜這種樣式的人物也允許在裏面工作的話。」

「那麼你真地以為我們能够根據他們的道德的性質，來挑選我們的工作者麼？我認得一些道德高尚的腳色，他們是全然沒有能力的。在你的意見裏，他們是擔任負責職務的較好的人物麼？」

「我只知道詆毀人的和鬼鬼祟祟的，不應該在一個革命運動裏面。」

「可是自然你在那兒找得到他們的。每一個健全的組織都有牠的寄生蟲的……」

「如果牠們不被消滅，那要毒害牠的。」

「當我們够強健了的時候，我們一定要把牠們完全消滅的；你不必爲牠擔憂。」

「倘使你知道，在外國人的眼光裏，這樣的人會怎樣使他們不信任革命運動就好了！」

「不信任我們，他們會麼？他們和資本主義的大膿瘡比較起來，只是一些小疹子罷了。你必須從一個更高的觀點來考察這些事情哩，同志。你甚麼時候離開我們？」

我覺到再多的辯論的無益了。

「大抵在下月一日吧，」我回答道。你可知道瓦利亞·提摩費葉瓦在甚麼時候回來？」

「哦，提摩費葉瓦？那真是一個姑娘！我們想叫她做我們的莫斯科商業聯會學校代表，可是她不肯去。她可以在那裏的一個公共住宅找到一個位置，並且有一個月一百七十五個盧布的薪水的呢。」

「爲甚麼你不去？」

「因爲我已經是專門地做文化工作的。隨後，我們須要進行同志斯大林定下的最新的計劃，

給那些不屬於黨的份子一個衝動呀。」

「那麼爲甚麼你做一個領班的工作，而不去擔負些負責的職位呢？」

「哦，我歡喜在工廠裏的。我在那兒有一個很大的勢力範圍哩。蒲提洛府工廠是我們家族的一個傳統的所在；我的父親和祖父都在那兒作工的。」她停了一會兒，隨後使用一種低聲加上說：「我的父親在一九〇五年給哥薩克兵打死了。他是某次罷工的領袖。」

在這個時候她母親從合作社回來，失望的心情在她的眼睛裏流露出來。

「法里烏沙，豬頭通通賣完了，」她叫了出來。「你想想看，第五號的那個明基娜剛剛比我搶先一點，把最後的那一個搶去了。我是怎樣一個老傻瓜，何必要回來問你呢！可是我很怕你會嫌牠太肥的呵！」

「不要緊，媽媽，」法里雅安慰她。「我們還有些罐頭魚哩。」

「罐頭魚！你竟把牠叫做一樣菜麼？我永遠不去摸摸那些廢物的，而且一點肉都沒有，我怎麼能够弄出湯來呢？」

我教她一個維也納的粉湯的法子試試看，但她只是輕蔑地吐了口沫，便走去廚房從她的鄰居那兒找安慰去了。

法里雅陪送我到門口。我們用一次長久的，親切的握手分別了。

八月二十七日

今天我終於親眼看見一次 G. P. D. (政治偵探局) 的逮捕事件。我已經等了一個長時間來看這件事；要是竟然離開蘇聯，而沒有涉獵過那些爲人們常常談論的官員們的種種把戲，那真是太傻了。

我是一個人在馬利亞·彼得羅夫娜的房間裏。她已經出外買東西去了，而其餘的通通在作工。突然地我聽見了一聲敲門（那門鈴已經壞了），我後來記起是一聲特別大的敲門的聲哩。我開門就看見面前有一個戴着一頂淡紫色便帽的穿了制服的人。

當他問起老安納茲金的時候，我第一次的感覺是一種失意的感覺，我想他也許是來尋問一

些新到的親戚的哩。他的圓圓的，和善的農夫的臉，好像暗示着是那樣一回事。

但不是的，他拒絕告訴我他的訪問的理由，而且當我們發覺那農民家庭的門鎖上了的時候，他開始在走廊那兒上下地踱着。我請他進來（希望有一次敘談）但他拒絕我。

「沒有關係，我能够站的，」當我說替他拿一張椅子來的時候，他回答道。他的和讓使我很不開心。這個遠著聲名的「恐怖時代」到那兒去了呢？他是甚至連一根防身棍都沒有帶的。在一種最沮喪的神態裏，我坐下來，繼續做我的工作。

隨後又有另外一聲敲門。我一跳就到了門口。

「你會經留心到安納茲金織不織襪子的麼，女市民？」那 G. P. D. 的男人問。隨後他扣好他的外套，並且開始在那些口袋裏瞎摸……無疑地他要拉出他的手鎗來！可是他不過抽出了一個煙草袋子。

「不，我從來沒有看見過他做那樁事的，」我回答道，仍然感到一點驚惶。馬上要發生些甚麼事呢？

「你能够給我一根洋火麼？」他問，並且那就是我們談話的終局。

那是我同 G. P. D. 第二次的見面。我的第一次是在斯太林格勒。我們正是剛到那兒，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一個房間……所有的旅館都住滿了。那事情在每個城市裏都會發生的；最好的辦法是找到他的團體預先給定下房間，而在這裏那作家會社已經非常好心地替我們弄妥當了。但在斯太林格勒我們都是陌生的人，又沒有一個人能够告訴我們，在甚麼地方可以找得着作家會社的會址。「那麼我們跑去 G. P. D. 看看吧，」羅爾夫決定了。我們走進一間外觀很愜意的平房，看來像是私人的避暑別莊似的；牠用藍色和白色，裝飾得很雅緻，牠的塗漆的木地板是很清潔的。有人在一扇門上寫着：「G. P. D. 局長室；」局長那個字末尾的「s」字和那個「D」字是用小小的，滑稽的花字裝飾的。

羅爾夫敲了門就進去。在一張桌子旁邊坐着一個年輕的金髮的人，正在聽着一個有美髮的少年康民黨員的報告。

「日安，同志，」羅爾夫說。

「日安，」那個金髮的脚色用厭煩的調子答道，就再沒有注意我們。只在那少年康民黨員報告完結的時候，他纔轉向我們這邊。

「有甚麼事情呢？」他問。

「我是一個美國人。我在這兒是陌生的，並且我想找個房間。」那個美髮的少年康民黨員走到電話那兒。

「喂，這兒，G. P. D. 我要給兩個美國人找一個房間。」

大概那家旅館回答說所有的房間都住滿了吧，因為他往後就大叫，「破壞者！」憤憤地摔下了聽筒。但他打去的第二家旅館似乎比較地有點希望。

「不是「或者」而是「一定」哩，」他向那邊的人請求。

「我一刻鐘以後再打電話吧。聽着呵，柏蒂加，」他轉向他金髮局長說，「等一會兒打電話到十月旅館去，並且告訴他們一定要把這兩個外國人招待進去。我現在很忙呀。別怕弄得他們討厭你，不然你就做不了一件事的。那麼，暫時……」

「暫時，」柏蒂加喃喃地答道，他的鼻子埋在他的紙張裏。

雖然在我留居蘇聯的期間中，我常常聽到逮捕和檢查住屋的事情——我記得在羅斯托夫火車裏的那個婦人，她等待着，一直到她能夠看見我從廁所裏出來，爲要告訴我一些 G. P. U. 的活動的事實——雖然由那些反對蘇維埃政府和工廠裏的經常保險的人低聲地在每個外國人耳朵邊說出來的消息，說是那 G. P. U. 是普羅列塔利亞的國家的支柱之一，但在我，仍以爲那兩個在那藍白房間裏的漂亮的青年是常常保持着——一種田園風味的。這個印象並沒有給目前事情塗抹掉。多少作家碰到壞運氣的呵！

當我聽見入口的那扇門上的另一個敲聲的時候，我就跑出去。這一次是那年輕的農民的老婆。

「這是安納茲基娜同志，」我解釋道，介紹她給那 G. P. U. 的男子。

「看這兒，女市民，我奉了命令來搜查你的房間哩，」他說。

安納茲基娜同志並不覺得怎樣驚異。她只在一種假笑裏張開她的嘴唇，便打開了那扇門。隨

後他們從裏面又把牠關上了。我在外面走來走去，但因為我不能够聽見安納茲基娜的聲音，我開始懷疑着，也許有些非政治的事體在門的那一邊發生着，雖說根據波爾雪維士的一條基本定理，世界上是沒有非政治的事體的。

在事實上，老安納茲金真地被逮捕了。他在 G. P. D. 裏面過了一晚，並且當他第二天早上再出現的時候，他現出那樣一種悲愁的面貌，那麼面談一次是不可能的了。我甚至不能確說他繼續織襪子不。

八月二十八日

在晚班之後我告訴工頭我要走了。他的臉孔是冷肅的可怕的，在他問：「爲甚麼呢？」的時候。「因為我在俄國居住的允許期間下個月就滿了。」

「你能够把牠延長的。」但我給他一封從作家會社寄來叫我辭去職務的信。他叫我到斯米爾諾夫那裏去，但當我走到門口的時候，我聽見一陣大鬧的聲音。一個女人正在聲尖地叫着，我進

去了纔發現她就是那討厭的猶太女人，她正在斯米爾諾夫身上發洩她的盛怒。

「你聽見過這樣一種侮辱麼？」她號叫起來。「他們答應了給我寫字間裏的工作，現在呢，一個像我這樣弱薄的女人卻要繼續做着這種粗賤的工作。我的背脊完全駝起來了！」

「我已經告訴過你，爲甚麼我們不能僱用你進寫字間的。在你的調換聲請書裏，有三個文法上的錯誤呢。」

「文法上的錯誤！甚麼，我在高等學校畢了業，而且得到銀質獎章的呢！」

「那麼你一定把你在那兒學到的東西一起忘掉了。你對我們是沒有用的，女市民；你只會到處訴怨而且妨礙別人的工作。」

我真不能相信她那小小的身軀竟有這樣大的嗓子。我想她的叫喊是會震碎了窗戶的。

「這樣一種卑污的詭計呵！這樣一種侮辱呵！對我說甚麼……」

「亞力山得洛夫，請你替我解除這個女人的煩擾吧。」斯米爾諾夫向坐在他對面的那個男人懇求。亞力山得洛夫在考慮這件事的時候，把他的前額皺起來。

「我來給她填上一張開除表好了，」他提議道。

「女市民里茲佗爾，你是想開除呢，還是想做着你現在的工作而不埋怨呢？」

「我不想開除，也不想繼續做我現在的工作。我要進寫字間去。」

「寫好她的開除的證明書吧，亞力山得洛夫，」斯米爾諾夫放棄地說道。「甚麼事情呢？」他轉向我，我就把我的文件遞給他。

「哦，你還沒有和我們獸多久啦，」他喃喃地說。

「我已經學到了許多東西哩，同志，」我溫和地答道。

「這樣一個卑污的詭計呵！」那猶太女人怨訴道。「這樣一個下賤的詭計呵！」

但這時亞力山得洛夫已經填好了她的開除表。

「要不要我簽字，女市民里茲佗爾？」斯米爾諾夫仍然躊躇地問道。

「不！」突然地那女人叫出來。「我屈服吧。我馬上回到我的茶爐那兒去吧。如果我突然中風了，你就得負責任的。但是我禁止你在我的墳墓上做甚麼演說，並且讚揚我是一個「勞動的女英

雄」咧。」她走出去並且猛力地把門關上了。

「你必須從圖書館蓋一個圖章交給我，證明借給你的一切書籍，你完全還清了，另外一個是疾病基金會的，又另外一個是救濟基金會的，證明你並沒有欠他們的錢，隨後還要一個耕種機部部長的，一個輸送局局長的，還要一個工廠會議的，和……」

「噯呀，斯米爾諾夫同志！我要花一個禮拜工夫都做不完這許多事情呢。這一切的傻事有甚麼好處呢？我向沒見過這樣的官樣文章的！」

「是的，我們故意這樣做的，」斯米爾諾夫解釋道，「因為我們要使工人，離開此地，是一件很困難的事。過去有些時候那是很可怕的事體，他們不斷地來又不斷地去的。在一個人走開之前，我們幾乎沒有教會了他一點東西。現在我們要把那精神上的壓迫，拿來給他們搯上試試看。」

「你把牠叫做精神上的壓迫？甚麼，你要使我跑斷我的腿罷了！再會，斯米爾諾夫同志。」

「再會，同志。快點在你自己的國家裏面開始一個革命吧。」

因為我要去護照局，我就把收集所有各項圖章的事情延到下一天。在護照局裏，我受了一個

長久的盤詰；我要把最近這十一個月裏我做過的一切事情，告訴在那兒負責的姑娘。她要曉得我的生活的方法是甚麼，我曾經住過甚麼地方，並且對我的陳述需要文件的證明，我認爲這是一種最累贅的手續，因爲不管護照局或那藍與白的 G. P. U. 辦事處，都不能夠在兩天之內把牠們調查清楚的。我很想把這位姑娘的注意力引到整個的事件毫無實用的地方，但是我制止了自己。要是在工廠裏，那就不是這樣的：我是隸屬那兒的，所以便有一種權利來批評，甚至有一種義務來這樣做的。但在這裏，那會成爲不機敏的，因爲我不過是一個陌生的人。我將要再去習慣做一個外國人！

八月二十九日

一直到兩點鐘我纔上牀睡覺；我簡直是半死半生的。我奔波了整個的早晨，設法從各種的團體裏取得我的圖印。有些主管人不在那兒；有一個理事長正在開着會使我老等着。當我離開他的辦事處的時候，我是悶氣極了。在發薪室上面，那兒掛了一張佈告：『今天沒錢發給。明天再來。』如

果明天也沒有錢的話，我便怎麼辦呢？

在編輯的辦事處我碰到較好的運氣。甚至有幾篇被接收了而沒有登出的稿件，也給我預支了稿費。牠總計起來有那麼一筆大款，我就決定到列寧格勒·柏林的航空站裏去定一個坐位，雖則如此，我剩下的錢還够買一張從柏林到維也納的二等車票和一雙雪鞋呢。

我那有伊底伯斯的情意綫的朋友是最艷羨的了，當我告訴他我要去德國的時候。

「世界上最乾淨的國家呵，」他喊出來。「這樣的有秩序！這樣的守時間！」那女優伶要求我寄她一些服飾的雜誌，娜達沙卻向我道別，因為她正要同她那瘦弱的丈夫到莫斯科去。

「再會，我的金寶貝，」她說，把我摟在她的寬廣的胸上，「趕快在那邊弄起個革命來。我真不明白，爲甚麼你們那些人仍然沒有厭倦了資本主義呢！」

「只要我們有了一個列寧……」

「那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的觀察方法呀，我的金寶貝。」那瘦男子拿了她的外套來。

「祝你一路平安，同志。要是你找到一個機會寄給我一條釣絲，我就要極端地感謝你。要是替

我的鎗弄點彈藥就……」

「聽說，我的金寶貝，她怎麼能够給你寄彈藥來呢？無論如何，如果你在家裏多歇一會兒，並且把你的書讀完，那對你就會更好些的咯。」

在夜班裏，我的機器又來一次「空機」，我就被安排去搬運一些圓筒，從一個箱子搬到別個箱子。這使我想起一個孩童時代的經驗，當我要學那些大人們縫紉的時候，我的保姆給我一枚沒有線的針，允許我拿牠在一條舊的裙子上面工作。

是的，我有許多事情要感謝那保姆的。不只是她教了我縫紉，而且她也教了我去崇敬英勇和慈愛，並且不合偏見的觀察一切事物。她帶我在田野和森林中跑來跑去，她一面走一面唱着康尼勒的詩句，在晚上，她毫不介意地坐在男人們中間，爲下屆的冬季縫她的法蘭絨短褲。

瑪爾伐和一個我不認識的老農民，也被安排到和我一道工作。他們已經把他們的工作合理化了；他們把所有的圓筒放在一條長的鐵桿上面，每人抓住牠的一端，這樣他們把那些圓筒擡到箱子那兒。當我們在做這種工作的時候，一個少年康民黨員給我們帶來了一號我們工廠的報紙，

『蒲提洛維茨報。』那張報上的油墨還是濕的。

『克拉尼·蒲提洛維茨』瑪爾伐拼出音來。

『甚麼！你現在能够看報麼？』我驚訝地問。『你過去對於讀書是那樣極端反對的！』

『唔，那裏面有甚麼原故呢？我是反對讀書的，然而現在能够讀書。甚麼原故？』

『也許你同時改變了你對於集合農場的意見吧？』

『是的，也許我同時改變了我對於集集化的意見。』

『那麼，我很高興把我們的泰洛爾農民們送到這兒給你哩。他們，甚至那些最窮的人們，都是極端保守的。』

『那麼你要替他們做些甚麼事呢，我的親愛的？』那農民問。『一個人須得把一些事情，對他解釋明白，要說，「倘若你倚靠那些大田主，你簡直是在割着你自己的咽喉。」你第一次對他們說那些話的時候，他們也許會笑你的，第二次，他們也許會吐口沫的，而且叫你滾開去，但第三次他們就會靜聽你的話。事情就是那樣的，我的美人。』

工廠的照相人在早晨的時候來，爲報紙拍一幅我們的突擊隊的照片。我要求他印一張給我，因此他乘這個機會，在我向法里雅借了一條乾淨的束髮帶之後，也替我拍了一張。那些工人們圍繞着我們，隨後那件事就很明白了，實際上他們沒有一個人知道了我是一個『外國的知識份子』的。當他們察覺了的時候，那件事引起一個很大的刺激，那位曾經歡送我的男子甚至在會議席上辯解我的寫作是沒有關係的。我是非常地吃驚的，因爲那黨委員會，所有的負責份子和蘇賓斯基和柯利亞等等都曉得了。最後那些男孩子決定了要把明天的中午休息時間奉獻給我，因爲那是我的最後一天——或者，更正確地說，是我的最後一晚。

八月三十日

我的親愛的瓦利亞當我到了工廠的時候，她就幫我的忙，一直幫助到在那裏的最後的幾點鐘。當我完成了一切的手續，想在發薪室領取我的工錢的時候，我發現昨天那張『沒錢』的佈告仍然在那兒。我是失望了：明天是我的最後一天，那時候我還有這許多奔跑的事體要做的。我站在

那輪送局門口，猜想着應該做些甚麼的時候，突然地，我看見一個頭上有一條毛織束髮帶的女工人橫過那條街。

「瓦利亞！我叫了出來。我們彼此連忙地跑到一起。

她是昨天從休養院回來的。因為天氣很壞，而她又念起她那年輕孩子來了。我問她有甚麼辦法。

「是的，一號纔是發工錢的日子，但不要焦急：你一定能够預先得到你的工錢的。」她把我帶進了委員室，我們幸運得很，在那兒找到了監工。

「聽呵，」瓦利亞說，輕輕地拍着他的肩膀，「這裏有一個外國工人，她明天就要回家去了。她今天一定要支到工錢纔行呀。」

「帶她到瓦爾金那兒去吧，所有的外國人的事情，都是由他負責的，」他答道。

我們找到了瓦爾金，原來是一個穿着歐洲服裝的肥胖的男人。自從羅爾夫去後，我就沒有看見過一套英國料子的衣服了，牠令我馬上回想起，我現在又要回到那一個消失了的世界裏一個

世界，那兒有你需要買的一切東西，但在那兒你卻要憑你自己的本領，並且繼續地走到金融的困難上面。當我有幾分厭惡地沈思着我的目前的旅途的時候，瓦利亞把我的事件告訴了瓦爾金。

「甚麼！他們還沒有把你的工錢給你麼？一個卑污的，下賤的詭計呵！」那肥矮的專門家叫了出來。

但現在我感到，好像是莫里哀的劇本裏那個婦人一樣，當那些鄰人想從她丈夫的鞭打中救她出來的時候，她喊叫着，「我願意給他鞭打呵。」我是站在工廠那邊來反對站在我這邊的那個胖子的。

但最後瓦爾金給我一張能够令我從儲蓄銀行裏拿到我的工錢的表格，因此現在我能够清償我在公共住宅裏的債項了。我誠懇地多謝了瓦利亞，並且問她，她明天能否給我一次最後的訪謁，同時拿回那件絲襯衫。她漸漸現出忸怩的樣子。

「不，你知道的，我並不想向你要索呢。」我明白法里雅·新珂的影響已經發生了效力。

「那麼，如果你不能夠把牠當作一件禮物，就給我一些東西來交換吧。」

「我能够給你甚麼呢？」

「你有一次說過你可以給我一條紅髮帶的。」

「一條紅的束髮帶！自然可以，自然可以咯！在五月一日那天，我們大家都得到紅束髮帶的禮物的。我只是束過一次，因為我還有一條去年留下來的呢。可是我想，給你一條普通的髮帶來換一件絲襪衫，在我那豈不是太寒酸了麼？」

「牠將來是這工廠的一個紀念品啦。你不能够把牠叫做寒酸的。」

「那麼就十分感謝你。我是頂愛得到那件襪衫的。你要曉得，我的意大利人在他接到那封信的時候就跑回來。他是、非常可親的，並且老是說着『卡拉卡拉』。那在他的話裏就是『最親愛的』的意思哩。隨後他就問，我喜不、喜歡跟他結婚。我快要做瓦爾瓦拉·亞法納西葉夫娜·范提里夫人了。那不會很有趣嗎？」

「我很歡喜你已經下了決心哩，瓦利亞。你就要去登記吧！」（登記是「結婚」的新說法。）
瓦利亞沈默了一會兒。「不，我不會那樣做的，你要知道。」她最後說道。「我還不曾下了決心。」

哩，我……不能夠的。」

在這一點上，我不再提出甚麼問題。同樣我也不問她爲甚麼不去莫斯科讀書。我曉得那兒有些東西是比她更強的。

在公共住宅裏，維拉用一種新聞驚嚇我，說一個集合婚禮就要在下一個休假日裏舉行。她要和珂斯提亞結婚，而另外還有兩對哩。當珂斯提亞很得意地問我，我會否「注意到甚麼事情」的時候，我躊躇不答，因爲我想起了那天沒有鎖上的一扇門。

一會兒杜西亞，新娘中之一個，走了進來，坐在我的沙發上，而且和我談了一番心腹話。維拉和珂斯提亞是已經有了一番經驗的，但不論杜西亞或者費底亞在實行上或理論上都是從來沒有深入過性的問題的。

「但是現在你快要不是門外漢了。」我說。

杜西亞嚴重地點點頭。「我們不要認爲，一個少年康民黨員一定是耍熟悉性的事體的。縱使多少有點像中產階級……一個沒落的階級的特殊性呀。」我把福基娜曾經注目的紅珠子送給

她。

今天我是最後一次到工廠裏去。

八月三十一日

別了！別了！

別了，我的美麗的鋼鐵，別了，你們那些耕種機，別了，黨委員會和小小的諾維可夫、法里雅、瓦利亞、柯爾加、蘇賓斯基，我的錐子，我的鑽子，所有你那些槓桿，你那些在工枱上的嘈聲，你那些油的氣息，你那個鍛冶廠和尼古拉和米殊加，你那個鑄造廠，裝置廠，染色廠，磨光廠，舊耕種機廠，熱力廠，修理廠和附屬修理廠呵！別了，你那吊桶貯藏室的鎖鑰別了，你們那些被拿來試鑽子，而工頭把你們叫做撞柱遊戲的金屬圓筒。別了，你們那些老的疲憊的革命前的工人們，你們的氣力，是被多次在奈夫斯基門的血漬的示威，是被那些哥薩克的鞭子，是被每天十四個鐘頭的工作消磨了呵！別了，你這快活的一代更年輕的人們，你們這些戴着紅髮帶的姑娘，你們這些文化和黨的工作者呵，別

了！

柯爾加安慰我。「我也去呢——到軍隊中去呵。」

「甚麼，你做個兵士？」我驚訝地問。「但是你怕還沒到二十歲吧？」

柯爾加用一種激動的姿勢整理好了他那頂繡花的小帽。「請你原諒，同志，但我並不是要去做一個兵士。一個兵士是一種受僱的職業。我要去做一個革命軍人呀。」

突擊隊的一個份子致歡送詞。他關於我說出了一大些誇獎話，我的虛榮心竟使我把牠們記錄下來。「我們到底碰見了一個外國的知識份子，她並不因為只是走過一趟我們工廠和搜集各種的統計，就滿意了，她把我們的勞作的重載負在她的背上，而且願意和我們共同生活的哩。我們要請託她把關於我們的事情告訴她本國的工人們，告訴他們我們的壞處，同時告訴他們我們的好處。他們必須知道關於我們的一切事情。我們要求他們跟着我們的榜樣，並且建立那些自由的工廠和作坊。」

他的演講的末段大半是說到法西斯主義者帝國主義者，和社會民主主義者的。

「你要回答麼，同志？」娜泰芽問。

要我致答詞那簡直是件苦事。我找不出字眼，並且有種羞愧把我牽住，使我不能滔滔地發表主張和宣言，如這次的會場所期望的。因此我的忸怩令我說出一些話，甚至現在我想起來，還感到難過的：「別忘記我寫信給我！」

當火車開行的時候，有一句話我在車站上會經常聽過的……牠一定已經不知不覺地印在我的腦經裏……我把牠作為我的臨別贈言給蒲提洛府的工人們，當我把那些話說出來了的時候，我是抖顫得那樣利害，因此我立刻坐了下來。那是一件多好的事體，他們全是那麼注意個人的，不把我看作我自己，而看作一個他們希望結為兄弟的西方工人的象徵。所以，即使我曾經說出了任何一種愚笨的話，也沒有甚麼妨害的。

當我最後一次把我的機器擦乾淨了而且注了油，並且和所有那些髒污和粗糙的手握過了的時候，我便永遠離開了我們的工廠。在出入道裏我拿出我的綠色的作工簿子，來代替我平常交出來的通行證。

機器的轉聲在我的後面逐漸地低微下來，當我來到罷工街的時候。那是一個有風的秋天的早晨。在我走回去公共住宅之前，我在那間外國人商店買了一些臘腸，火腿和酪餅。

我進到家裏的時候，我在廚房裏洗了手。剛剛在我的手洗乾淨了之後，我看見上面的裂痕和微傷，我纔注意到牠們是粗笨而且僵硬的。我記起那首歌『火磚』，牠描寫一個年輕的女工在她未去愛人那兒之前，怎樣洗她的雙手。是的，在一個女工的生活裏，洗手的事是佔據一大部份的，並且那在她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瓦利亞五點鐘來了。我已經把那張棹子安放在我們房間裏，所以我烹茶給她吃。但她除了一些糖菓和餅乾之外，甚麼東西都不肯吃；只要我給她一些別的東西，她就再三說道，『如果你以為那是一樣的話，就包牠起來吧，我要帶牠回家給我的年輕孩子哩。』隨後她就從一張小心地包好了的紙裏而抽出那條紅束髮帶。牠的邊沿上有一種白色的花樣……不是花朵，而是直劃同圓圈，看來像是槓桿和車輪似的。她那麼小心地包起那件絲襪衫，似乎牠是一種無價之寶。隨後忽然地她的臉沉下來了。

「甚麼事，瓦利烏沙？」我問她。隨後就看見眼淚在她的眼框裏等着：「我們甚麼時候纔會再見面。」

雖說我從我自己的經驗知道了眼淚並不常常是一種悲慟的表示，然而牠們深深地感動了我。我對於說離別的話是那樣的受過訓練的，自然我能够把目前的一盤話非常輕快地說出來。「當你的腦袋掉了的時候，你不會爲你的頭髮發愁了，」俄羅斯的老古話是這樣說，和維克多的分離已經從他一切的分離那兒把痛苦提出去了。

我答應回來，並且問她在她回來的時候她想要我給她帶點甚麼樣的衣服和內衣等等，想藉此來安慰瓦利亞。在我這邊，那是一盤可怕的大話，因爲我知道我永不會有這許多錢來買我答應了她的一切東西，不過我只是想分分她的心罷了。

她搖搖她的頭。「不，不，我甚麼都不要，但是你一定要快點回來。」隨後她便把她那溫暖的圍巾重復包裹了她自己，我便跟她一道走到電車站，因爲我想去看看馬利亞·彼得羅夫娜。有一會兒我們挽着手站在停車的地方，循着非普羅列塔利亞的路線電車終於跑來了，瓦利亞便預備分

手。『那麼再會！』她說，那些眼淚塞住了她的聲音。『你回到了那邊的時候，要幫助我們，即使我們有錯處，那只是因為我們仍然很窮……可是要想我們要做甚麼來補救牠……而你會想到牠的，我知道……並且隨後你會為我們而工作……並且告訴其餘的人……並且很快地你們那些在外面的人們就會建造像我們一樣的工廠……』

我們靜默地擁抱着。

第二個早晨我在一架德國的飛機裏離開了蘇維埃聯邦。那位不會講一點俄國話的機師痛罵蘇聯。

一般強烈的風從芬蘭海灣吹起來。在我們下面，躺着北部的平原和牠的散漫的村莊，在我們後面，尼瓦河的金屬長帶奔流着穿過列寧城。我們的發動機的吼聲，在我聽來像是對我們的工廠的臨別致意。

幾天前我在一張舊壁報裏面找到一首詩，那顯然是鍛冶廠的作品。也許那就是出於那位嘲笑我的尼古拉的手筆吧。也許是米沙寫的。但是，牠總是我們三萬二千的蒲提洛府工人中的某一

個寫的。

「那兒許多鎔爐發亮，

那兒許多電機發吼，

那兒紅的，鎔了的金屬發光，

所有的殘廢的思想，

所有的傷人的憂愁，

讓我們把牠們一古腦兒火葬。

那拍聲和閃光，

那生鐵和純鋼

都是聯絡我們勞働的連索；

那麼，我的心靈像清風一樣，

我感到勇氣加強
爲我們的目的而勞作。

那號笛的尖銳的高歌
最後給我一個信號；

現在喧嚷和拍聲都已沈寂，

這兒 那兒

都看見我們的同志走出了口道
他們分散，走向各自的家室。

但明天又是新生

——我的境遇是多麼幸福——

女記者日記

我將用全力勞作。

我不再悲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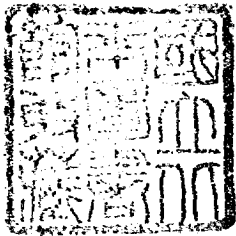
因為創造的快活

永遠消除了我的憂作。」

中華民國九年五月九日

商務呈繳

三三八



廿六年三月三日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三月初版

(34044.1)

☆ 世界文學名著女記者日記一冊

Life in A Soviet Factory

每冊實價國幣壹元貳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Lili Körber

譯述者 韓羅 起西

發行人 王雲 五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日五四三

必

87
100227

重慶市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
發給審查證圖字第一〇二四號

